

当代中国口述史
Oral History in Contemporary China

我为 少奇 同志 说 些 话

邓力群
著

WOWEI SHAOQI
TONGZHI
SHUOXIEHUA

当代中国出版社
Contemporary China Publishing House



我为少奇同志说些话

少奇同志可以说是我革命引路人之一。我在他身上学到的太多了。他的言行教导，使我得益良多。他对我有许多批评，更使我终身受用。这使我常常要想起他，不能忘怀，不能自己。

他在《论共产党员的修养》中，要求共产党员能够经得起各种打击，在受到大多数人的反对和指责而暂时孤立，甚至因此而牺牲生命的时候，也能够逆流而拥护真理，绝不随波逐流。他默默地死去，把对共产党员的期望，变成了自己忠贞实践的诺言。

——邓力群

微信扫描 (ID: ddzgcbs)



关注当代 阅读中国

建议上架：人物·口述历史

ISBN 978-7-5154-0658-9



9 787515 406589 >

定价：35.00元

当代中国口述史
Oral History in Contemporary China

我为少奇同志
说这些话

邓力群 著
WOWEI SHAOQI
TONGZHI
SHUOXIEHUA

当代中国出版社
Contemporary China Publishing House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我为少奇同志说些话 / 邓力群著. -- 北京 : 当代
中国出版社, 2016. 1

ISBN 978-7-5154-0658-9

I. ①我… II. ①邓… III. ①刘少奇(1898~1969)
—生平事迹 IV. ①K827=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5)第 303945 号

本书图片选自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新华通讯社编《刘少奇》画册。
因时间仓促,不能确定摄影者姓名,故未署名,特向摄影者致歉;并请
相关著作权人见到本书后,与我们联系,以便再版时准确署名及付酬。
联系电话:010-66572131

出版人 曹宏举
责任编辑 陈立旭
责任校对 康莹
封面设计 古涧文化
出版发行 当代中国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地安门西大街旌勇里 8 号
网 址 <http://www.ddzg.net> 邮箱: ddzgcbs@sina.com
邮政编码 100009
编辑部 (010)66572264 66572154 66572132
市场部 (010)66572281 或 66572155/56/57/58/59 转
印 刷 北京润田金辉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680 毫米×1020 毫米 1/16
印 张 13.25 印张 2 插页 插图 9 幅 108 千字
版 次 2016 年 1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6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35.00 元

版权所有,翻版必究;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拨打(010)66572159 转出版部。

出版说明

现代史学越来越不满足于文献资料，而求索于人们的记忆。于是，口述史于20世纪40年代在西方勃然兴起，20世纪80—90年代引起中国史学界的关注。口述史让历史的参与者直接对“历史”说话，不仅可以弥补文献资料的不足，而且使历史更加鲜活、生动。口述方法更是当代史研究的重要方法之一，因为许多事件的当事人健在，他们能从不同方面、不同角度生动地诉说自己参与的那段历史。

新中国诞生五十多年，它谱写了中华民族五千年文明史中最为壮丽辉煌的篇章，对当代中国史的研究是一项应大力加强的工作。毫无疑问，参与共和国重大事件决策的老同志的记忆对于国史研究具有特别重大的意义，他们年事已高，自己动手困难，访谈并整理他们的口述，成为十分紧迫而带有抢救性的工作。作为国史研究专门机构的当代中国研究所建立伊始，就十分重视口述史料的搜集和整理，并由《当代中国史研究》杂

志陆续发表了一些口述史方面的成果。我们意在将这些成果汇集出版，并由此进一步萌发出版《当代中国口述史》丛书的想法，以此汇集和整理亲历者记述当代中国史的资料。在酝酿这套丛书过程中，我们发现：有些亲历者可以自己动手撰写，有些亲历者生前对其亲人讲述过自己所亲历的事件或与一些要人交往的情形，其亲人以回忆的形式述出。很显然，这些记述都是十分宝贵的当代中国史资料，因此，我们也将它们收入这套丛书中。

《当代中国口述史》丛书的首要宗旨是存史，为当代中国史研究者提供可信的史料。而史料的生命在于真实性。因此，丛书所收以亲历者的叙述为主体，无论是口述、自述，还是回忆录，都必须是亲历者作为事件的当事人、决策者或参与者对事件的叙述。而且必须是以严肃、认真、实事求是的态度来叙述。当然，完全避免情感的因素不仅不可能，而且会使之失去鲜活性。但情感的倾诉应限制在合理的范围。如果是对口述的整理，整理者应对事件背景有必要的了解，要对关键的情节、关键的人物以及时间、地点作必要的查证。同时，要理顺叙事逻辑。文采不求飞扬，但必须成诵。

这项工作既已开始，就要扎扎实实做下去。亲历的内容十分丰富，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军事、外交及个人生活史、家族史都可涵盖；亲历者可以是党政各级领导干部和工作人员，也可以是普通老百姓，总之，工、农、兵、学、商都可以成为本丛书的作者。他们从不同层次、不同角度叙述当代中国的历史，可以记录下一个比较真实的当代，对于

丰富国史内容，弄清历史真相，总结历史经验，资政育人，都是大有裨益的。

我们希望本丛书能够成为当代中国史研究者的资料库，成为各级领导干部增益智慧的智囊团，成为关心共和国成长和命运的中国公民的图书馆。

当代中国出版社编辑部

编者前言

刘少奇同志是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理论家，曾任中共中央副主席、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主席，为中国革命的胜利和中国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发展做出过重大贡献。“文化大革命”中被迫害含冤去世。

本书作者邓力群曾经在刘少奇同志身边工作，对少奇同志有着许多了解。力群同志说：“少奇同志可以说是我革命引路人之一。我在他身上学到的太多了。他的言行教导，使我得益良多。他对我有许多批评，更使我终身受用。这使我常常要想起他，不能忘怀，不能自己。”

1998年，刘少奇同志100周年诞辰之际，邓力群将本书交当代中国出版社出版，作为对少奇同志的缅怀和纪念。2015年2月，邓力群同志逝世。2015年11月，适逢力群同志100周年诞辰，我社报经中央文献研究室审定，重新出版《我为少奇同志说些话》，以此纪念力群同志和少奇同志。

此次再版，我们修改了初版排录中的个别错字，修订了个别误漏之处，补加了引文注释，并在目录中列出了文稿中的二级目，其余未做改动，保持初版原貌。特此说明。

当代中国出版社编辑部

2015年11月

官油香齋

自序

今年11月24日是刘少奇诞辰100周年纪念日。到今年11月里，刘少奇逝世也有29个年头了。

我见到少奇同志，最早是在1939年夏，我去请他到马列学院讲党建理论。刘少奇的《论共产党员的修养》就是这样问世的。十年后，也是在一个夏天里，我随他秘密出访苏联。中间突然要我去新疆，推进和平解放事业，临行他千叮万嘱。后来我调到北京，在中央办公厅第一办公室工作。少奇同志要我为他做秘书性的工作，但没有给秘书名义。这样，我有机会与他一起参加一些重要会议，出去做调查研究，参加起草一些文件，听到他的各种指示和讲话。一直到“文化大革命”发生，大家都遭磨难，再未见面。

少奇同志可以说是我革命引路人之一。我在他身上学到的太多了。他的言行教导，使我得益良多。他对我有许多批评，更使我终身受用。这使我常常要想起他，不能忘怀，不能自己。

正好中央文献研究室和中央电视台，为纪念刘少奇 100 周年诞辰，要联合摄制一部刘少奇的大型文献纪录片，他们来访问我，要我谈谈刘少奇。于是我同他们谈了四次，每次三个多小时，我把这些谈话整理了一下，分为几篇。再加上以前为少奇同志而写的文章和所作的讲话，归起来有九篇，想因此出一个小册子，作为一束鲜花，奉献给没有墓碑的刘少奇的灵前。我此时的心情，就是要为少奇同志多说些话。

1986 年 11 月，我到炭子冲，曾为少奇同志故居纪念馆题词：“共产主义道德品质，身体力行，生死以之。”他的高风亮节，不就是我们共产党人应该学习的榜样吗？

邓力群

1998 年 10 月

目录

001

答中央电视台记者问

康生要我们去找一下刘少奇，请他讲讲党建问题。/ 少奇同志说，他可以讲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关于共产党员的修养问题。/ 他讲这个课，不仅马列学院的学生听，中宣部、中组部等中央机关的许多同志都来听。

少奇同志要组织一个代表团秘密出访苏联，代表团要用几个秘书，我算是其中之一。/ 会谈过程中，少奇同志处理得最好的一着是，同斯大林之间的谈话很有水平，说话很得体，很讲究艺术，恰到好处。/ 斯大林建议我们提前解放新疆。少奇同志立刻向中央作了报告。我们原来准备1950年解放新疆，为了使美国企图把新疆独立出去的阴谋落空，中共中央接受了斯大林的意见。

1948年8月间，张闻天交给我一个他所起草的文件《关于东北经济构成及经济建设基本方针的提纲》，要我好好看一看。/ 张闻天写的这个东西，经刘少奇修改后送到毛主席那里，对毛主席形成七届二中全会的讲话，起到了重要的诱因作用。如果当时不是刘少奇重视，这个文件很可能被搁置起来。

白区工作正确路线代表再认识

刘少奇一生曾经有两段时间在国民党统治区做秘密工作：一段，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到他1932年冬进入中央苏区之前；一段，1936年3月他去北方局工作，直到抗日战争爆发。/这两段要说有什么不同和区别，前一段是“犯上”的，顶着干的，刘少奇在“左”倾错误路线的领导下工作动辄得咎；后一段是贯彻执行党中央、毛主席的正确路线的，从而刘少奇的创造性工作也得到了党中央和毛主席的完全支持，工作得心应手。

为给党员和干部加强革命策略和群众工作方法的具体教育，刘少奇抓了一个典型事件。/改组北方局是刻不容缓的事，刘少奇抓紧做了。当时派到北平市委书记的是李葆华，派到天津任市委书记的是李铁夫，派到济南任山东省委书记的是黎玉。/刘少奇向中央请示并作积极建议后，在北平竭力营救被捕坐牢的同志出狱。薄一波、刘澜涛、安子文、杨献珍等“六十一人”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分成几批被营救出来的。实际上还不止，王若飞也是这时候出来的，还有其他一些人。/毛泽东在《论持久战》里所讲的三个包围和三个反包围的局面，这是中外历史上空前未有的奇观，这个奇观，就有少奇同志的不朽功劳在内。

在延安整风中，毛泽东把刘少奇的《论共产党员的修养》《论党内斗争》，都列入整风文献。所有这些，都不是随意的决定。

《三论》是党建学说的代表作

刘少奇1941年7月在华中局党校作《论党内斗争》的报告，其中提出的在党内斗争中要保护、尊重少数的观点，

当时特别受到毛泽东的赞许。/我原来记得《论党内斗争》中有保护、尊重少数这个话，最近我查了一下选入《刘少奇选集》中的这篇报告，结果没有。但这个意思可以找得到。

刘少奇一路走，一路听汇报，一路发表意见。给我印象最深的，是他那个关于减租减息的指示。/他讲，搞减租减息不能只靠行政命令，要做群众工作，首先要解决谁养活谁的问题，说明是农民养活了地主，不是地主养活农民，把这个千百年来案子翻过来。

刘少奇到了延安，与毛泽东密切配合。刘少奇在七大所作的修改党章的报告，一直到今天，是最高水平的报告。/把毛泽东思想加以定义、概括和规范，这是刘少奇在七大的这个报告中所作出的贡献。

党的第八次代表大会前后

我谈一点同《论十大关系》、中共八大有关的历史事实。这些事实在党内知道的人不多。/全党这么重视召开八大的问题，怎么谈得上召开八大事先没有同毛泽东打招呼？整个事情的酝酿都是在毛主席的领导下进行的嘛！

1955年12月5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中南海西楼召开座谈会，布置召开八大的筹备事宜。会议由刘少奇主持。/毛主席听一波同志讲起刘少奇正在召集中央各部委逐个听取汇报的事，说这个方法很好啊，请一波同志也来组织这样的汇报。

1956年一二月间，少奇同志对我们说，中央准备召开八大，要为八大准备一个政治报告。少奇同志指定陈伯达为他起草。/乔木认真地看了，向少奇同志汇报说，陈伯达起草的报告不像一个党中央向八次代表大会所作的政治

报告，倒像一个学术报告。/少奇同志说，他刚刚从毛主席那里开会回来，毛主席讲了很好的意见，同我们起草八大的报告关系密切。起草八大的报告要以毛主席讲的这个十大关系为纲，这样把八大报告和十大关系就连为一体了。/一波同志说，这个报告里只反右倾保守，不反急躁冒进，是片面的。/报告里加上了反急躁冒进，毛主席没讲话，没有反对。到了1957年，周总理、胡乔木、彭真到杭州去，毛主席对他们讲，1956年反急躁冒进，他的心情受到压抑，整个一年心情不舒畅。

1957年2月，毛主席在一次会议上讲了人民内部矛盾问题。少奇同志根据毛主席讲话的精神，在湖南和上海也讲了现在人民内部矛盾已成为主要矛盾的问题。

073

从“反冒进”到庐山会议

在“反冒进”问题上，刘少奇支持了周恩来 / 074

周总理搞了一些调查，提出1956年的计划要调整，过多的基本建设项目要压下来。但是毛主席持相反的意见，认为不但不能压，还要增加。少奇是支持总理意见的。/毛主席要增加基本建设的意见，在多数人中间通不过。这种情况，作为党内生活来讲，本来是很正常的现象。但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以后，毛主席的意见成为少数一方的意见，在多数人中间通不过，这是罕见的。/要中宣部就我国经济发展要实行既反保守又反冒进、坚持在综合平衡中稳步前进的方针，代《人民日报》写一篇社论的建议，是少奇同志提出来的。/把社论送给毛主席审阅，毛主席批了三个字——“不看了”。

1957年9月，在北京召开八届三中全会。在这个会上，

毛主席虽然没有点名，但是第一次公开地、尖锐地批评了“反冒进”问题。/ 南宁会议期间，毛主席还在一个晚上约了周恩来、刘少奇两人谈话，时间很长，谈到深夜。在会上毛主席点名批评了周恩来和陈云，没有点名批评刘少奇。

对毛泽东的“正处”讲话，刘少奇由衷喜悦 / 078

毛主席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问题的讲话，在根据录音整理出来的稿子上，谈到社会主义改造完成以后的社会矛盾时，确实讲过阶级问题、阶级矛盾问题已经基本解决了。这段话，同后来正式发表的大不一样。/ 少奇同志说，合作化以后，集体内部，集体和集体之间，集体和上级之间，群众和领导之间，人民内部有矛盾，从你们的反映中间就可以看出来。/ 少奇同志认为，人民内部矛盾，现在大量地是表现在人民群众同领导之间的矛盾问题上，更确切地讲，是表现在领导上的官僚主义与人民群众的矛盾这个问题上。

南宁会议后，刘少奇比较谨慎了 / 087

1958年1月举行的南宁会议，开得相当紧张。毛主席对周总理的批评非常尖锐。毛主席虽然没有点少奇的名，但无论如何，少奇同志也是感到了很大压力的。/ 从1月的南宁会议到4月下旬的广州会议，少奇同志采取了谨慎的态度，说话不多。/ 作为八大二次会议的报告人，少奇同志与毛主席的合作是很好的。

八大二次会议开完以后，中央书记处召集有大区负责人参加的会议。会上，非常突出的是柯庆施，他点名将李富春的军。/ 真正讲困难时期，从北戴河会议以后就开始了。/ 少奇同志在北戴河会议以后不久，也往南走。这次调查，也把我带去了。/ 少奇同志只是看，没有说话，听

张国忠在那里说就是了，跟着张国忠走就是了。/看了这些，少奇同志没有大加称赞。但是也没有批评。不说话，就是说明他心里是有考虑的。

少奇同志生怕打断纠“左”的进程，提出了庐山会议反右倾的情况要不要向下传达的问题，他要胡乔木去向毛主席说。乔木不敢，没有传话。如果当时传了，不知还会发生什么样的情况！

099

七千人大会到西楼会议

刘少奇没有心思编他的选集 / 100

毛主席说：过去说过多次了，要出刘少奇的文选，可是一直没有出。现在，《毛泽东选集》第四卷出来了，应该把出刘少奇的文选列上日程。/北戴河会议以后，在一次书记处会议上正式决定要编辑出版《刘少奇选集》。指定负责人是康生、陈伯达。/康生说：你把这些人都抽走了，我这个《刘选》的编辑工作怎么办？陈伯达说：现在我得听毛主席调动，他调我去，不能没有人帮我忙啊。

在我和许立群被抽调去搞农村调查的这一段时间里，康生组织熊复、姚溱、王力、范若愚，还有他们那个理论组李鑫等几个工作人员，收集、查阅刘少奇的档案。/康生说，选的不选的，都要让少奇同志认可，好做下一步的工作。/这时少奇同志在湖南。康生带着选目去了长沙。少奇同志听了汇报说，你们先搞着吧，现在我回不去，在这里看过去的文章，心情转不过弯来。/少奇同志后来对我们说，他到湖南农村后，农民对他说，这几年共产党睡觉了嘛！一直等你们快点醒来，你们就是不醒。你们再不醒，我们就要拿起扁担上街了。

1961年11月中旬到12月中旬，少奇同志在广东疗养。康生提议趁着少奇在广州，把《刘选》编辑组一起搬到广州去。没想到编辑组一到广州，少奇同志接到要在北京召开七千人大会的通知。他一听就说，得回北京。

刘少奇对陈云说：我对你支持到底 / 113

七千人大会后不久，少奇同志听财政部的汇报，得知财政收支不平衡，还有50亿元的赤字。/在西楼会议的讨论中，陈云同志对当时的经济形势和克服困难的办法作了一个重要的讲话。少奇同志听后大为赞成。/有同志说，七千人大会对全国的形势作了估计，没过多久，我们对形势又作不同估计，好吗？/少奇同志从武汉回来，给我打电话，说：“主席都同意了。”

我们这些在钓鱼台写东西的工作人员一起议论，经济工作最好还是由陈云同志来挂帅；富春同志是个好同志，但是由他担任中央财经小组的组长，远不如陈云。大家七嘴八舌，一致要我向少奇同志去反映，建议由陈云同志出任中央财经小组组长。我对少奇同志一说，少奇同志同意。/开始陈云同志表示不愿接受。后来周总理告诉我，少奇同志力劝陈云当组长，并对他说：我对你支持到底。

全会讨论阶级斗争问题不传达，全党继续进行经济调整 / 124

毛主席要田家英带一个调查组去农村了解整社整风情况。这些地方的农民都讲：“分田到户”。/田家英带着这些意见回到北京，先向少奇同志作了汇报。少奇同志同意田家英的意见。/毛主席回到北京，田家英在中南海游泳池边向毛主席作了汇报。毛主席找刘少奇去，责备少奇同志没有顶住。还说，要是他不在世了，“你怎么办？”

少奇同志真了不起。在当时大家谁都不再提调整工作的情况下，他提出：“鉴于第一次庐山会议的经验，要有个限制，要搞个具体规定，传达的范围、方法、方式要考虑”。/毛主席也真高明，他说：阶级斗争的讨论到全会为止，不往下传达。

129

政法部门要正确处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

关于人民法院、检察院、公安机关的性质和任务问题 / 131

少奇同志认为，法院、检察院、公安局，这三个机关对敌人是专政机关，对人民来说是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机关。这三个机关要让敌人怕，不应让人民怕，而要让人民喜欢。/当时这三个机关中普遍流行的说法是：它们是专政机关，专政队伍，处理的是专政问题，做的是专政工作，管的是专政对象。

湖南郴县鲤鱼江发电厂女工刘桂阳，回家看到本地的公社工作搞得太不像样，提了意见，当地领导又不接受，她就跑到北京来，在国务院接待室贴了“打倒人民公社”的标语，并告诉警卫这是她贴的。后来被捕，以反革命论处。少奇同志发现了，责令平反。

关于处理两类矛盾的方法问题 / 136

三个机关处理两类矛盾的方法的特点是用法律制裁手段。无产阶级法制，就是人民的法制，也就是社会主义的法制。法制不一定是指专政方面的，人民内部也要有法制，国家工作人员和群众也要受公共章程的约束。

三个机关如何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 / 138

少奇同志说，不能使人民对公安机关有一种阴森森的

感觉，要使人民有热烘烘的感觉。所以，三个机关要坚持对敌狠、对己和的原则。向反革命、向敌人、向违法乱纪作斗争，是为了保护人民权利、人民生活、人民民主制度，不是为了制裁而制裁。

三个机关要有自己的规章制度 / 140

历史上任何一个高明的统治者，他都知道要依靠法律、运用法律，因此他自己也不可能不受法律的约束。“尧置敢谏之鼓，舜立诽谤之木”，这“鼓”和“木”一定意义上也就是法。至高无上，生杀予夺，一个人说了算，只能行于一时，不能维持长久。

关于政策与法律的关系问题 / 142

政策和法律，有一致和不一致两种情况。政策以法律形式固定下来，则一致，必须遵守，对谁都无例外。如果没有用法律形式固定下来，这就要凭觉悟了，不执行这个政策的话，不能说是违法。

无产阶级专政和党的领导问题 / 142

无产阶级专政不是党专政，不能使党领导变成党专政。党也要在法律范围内来行事，受法律的约束。

143

真理的声音是窒息不了的

——驳《〈修养〉的要害是背叛无产阶级专政》

《论共产党员的修养》这部著作和它的作者一道受难，遭到恶毒的攻击、谩骂和诬陷。经过十年的内乱，人们从切身的体验中进一步认识到它的价值和意义。它的真理性，在我们党同林彪、“四人帮”的严酷斗争中，继续得到证明。

逝者和生者的欣慰

——记《刘少奇选集》(上卷)的编辑出版

1960年《毛泽东选集》第四卷编定以后，毛泽东同志建议编辑出版刘少奇同志的选集。/ 这年冬天，中央书记处采纳这一建议并为此专门作了决定。少奇同志尊重党中央的决定，表示同意了。

编辑小组几个人专门到长沙向他汇报。他耐心听取编辑小组的意见，提出还可以删去一些什么篇目、增加一些什么篇目，反复表示：现在党、国家和人民正处在困难时期，工作这么紧张，自己的思想和精力不能不集中于研究当前情况和解决当前问题，实在没有心情回过头去看多少年前的文章……

少奇同志讲到一个很重要的思想：过去公开发表的一些东西，经过这么多年了，现在党内外、国内外人们还记得起、愿意看、能看得下去，觉得对自己还有帮助的，主要是《论共产党员的修养》。

《论共产党员的修养》重新发表后，编辑小组同志把其他稿子陆续整理出来请他审阅，他总是说，放下吧，有空一定看。/ “文化大革命”，选集编辑出版工作非但不可能继续进行下去，反而成为林彪、江青强加的一条罪状了。

从1960年开始着手编辑，到1982年正式出版《刘少奇选集》(上卷)，经过了22年。其间变故迭起，曲曲折折。文稿和它的作者以及参加编辑小组的人，都经历了一次一次的考验。

邓力群著：
我为少奇同志说些话

答中央电视台 记者问

中央电视台记者：您曾在延安马列学院学习过，请您讲讲刘少奇去马列学院讲共产党员修养的情况好吗？

邓力群：可以。

延安马列学院第一期，大概有 50 名学员，多数是在延安做宣传、理论工作的同志。当时规定学习的期限为六个月，分两个阶段。前三个月的课程，主要学马列主义基本理论、政治经济学、党建的基本理论。讲马列主义课的是吴亮平，讲政治经济学的是王学文，讲党建理论的是康生。后三个月的课程，主要开了中国近代史、西洋革命史、哲学和党建问题。前三个月康生讲完党建的基本理论以后，说他工作如何如何忙，下面的党建的问题，没有时间教了。他推荐少奇同志来讲。说，少奇是我们党的老干部，很有经验，现任北方局书记，最近来延安汇报工作。康生要我们去找一下刘少奇，请他讲讲党建问题。当时我在第一班学习了三个月之后，被任命为院部的教育科长。有了双重身份，既是马列学院的学生，又是马列学院的工作人员，需要一边学习，一边

工作。我以马列学院工作人员的身份去找了少奇同志。在张闻天住的地方找到少奇同志，说明来意。记得那天，张闻天同志也跟他说了，要请他到马列学院讲课。少奇同志回答说，党建的问题很多，都让他来讲，他承担不了，他耽在延安的时间不长，还要出去的，但是他可以讲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关于共产党员的修养问题。这样说好以后，刘少奇到马列学院前后大约讲了三四次，每次都有三四个钟头，引人入胜，很有说服力。许多道理是从来没有听到过的，的确令人一辈子受用。他讲这个课，不仅马列学院的学生听，中宣部、中组部等中央机关的许多同志都来听。后来是闻风而来，听课的人越来越多，马列学院的课堂里容纳不下了。最后一两次，移到了中央大礼堂去讲，在那里讲完这门课。这是1939年7月间的事。

刘少奇的这个讲话，经过他修改整理，后来在延安的《解放》杂志上发表了。除了他所讲的组织和纪律方面的问题没有发表外，都发表了。这个讲话后来经毛主席选进延安整风文件。

他为什么要讲这个问题？这个问题至关重要，是怎样成为共产党人的问题，共产党人应该是什么样子的的问题，是保证我们的革命事业、我们的共产主义事业，一定要成功的问题。刘少奇在这方面有长期的准备，积累了很多经验，体会也多，有他的独到之处。刘少奇的《论共产党员的修养》，不仅在中国共产党人中，而且在世界各国的共产党人中，被阅读，被学习，它不是偶然的。

中央电视台记者：刘少奇在七大之前对毛泽东思想有过

什么提法？

邓力群：没有。第一次提出毛泽东思想的是王稼祥。

中央电视台记者：我们今天想着重了解一下刘少奇同志在七千人大会到西楼会议这一段的情况，他在恢复国民经济中所做的一些努力，所起的一些作用，一些具体的事实。

邓力群：这个问题，根据文献研究室刘少奇组所提的要求，我准备了。今天，刘少奇组的黄峥他们没有来，还是以后专门来讲一次吧。今天你们先提提别的。

中央电视台记者：那么关于刘少奇秘密访苏的事，您能否给我们谈谈。

邓力群：要说么，这个问题也很重要。当时我在东北，突然中央来电报调我，不知道是怎么回事。1949年5月到了北平，才知道少奇同志要组织一个代表团秘密出访苏联，代表团要用几个秘书，我算其中一个。另外还有戈宝权、黄韦文、翻译师哲等。访苏前的准备工作有两项。一项，要起草一份聘请苏联专家帮助新中国建设的文件。王稼祥分配我起草，我抓紧起草出来交给了他。后来他作了什么修改，我不清楚，他没给我看。另一项，是少奇同志抓的，他找中央的有关部门来汇报工作，以了解我们党的情况，做到心中有数，到苏联去应该寻求解决哪些问题。组织部门、宣传部门、统战部门等，都来作了汇报。听了这些部门的汇报以后，又听东北局的汇报，高岗的汇报。所有这些汇报会，我都参加了。

我记得六月二十几号，代表团乘专车离开北平，到了沈

阳，再坐火车到大连，在大连坐苏联的飞机去苏联。当时我们国内的解放战争还在进行，为了安全起见，飞机绕道飞行，沿着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的海岸线上空飞向伯力。也由于当时南北朝鲜正相对峙，所以飞机仍然很小心翼翼，采取了忽高忽低的飞行方式，直到安全到达伯力。这样，飞机经过赤塔，转新西伯利亚，到达莫斯科。刘少奇他们同苏共中央会谈，我们三个秘书都没有去，只有翻译师哲参加。会谈的情况，他们没有给我们讲。这方面的情况，现在已有不少文章介绍。我看了些档案，回过头来也作了些了解。当时会谈完了以后，按照原来的计划，也就是在同苏共会谈前商定了的，因为我们在新中国建立以后也要开始搞建设，需要学习苏联的建设经验，确定他们由十来个部向我们作介绍，在刘少奇的率领下，我们先后访问了苏联的国家计委、财政部、国家银行、商业部、外贸部、化工部等。这些活动我们都参加了，每次介绍，我们几个秘书都作记录，末了整理出来作为向苏联学习的材料。还做了些参观活动，看了些工厂、大学、博物馆、图书馆等。

会谈过程中，从现在披露出来的材料看，少奇同志处理得最好的一着是，同斯大林之间的谈话很有水平，说话很得体，很讲究艺术，恰到好处。例如，斯大林说，革命的中心现在已经从西方转到东方，转到中国，后来居上啊，学生要超过先生，这是普遍规律。斯大林为此祝酒干杯。刘少奇非常持重，始终说：我们是以苏联为师，苏联是我们的老大哥。没有喝这杯酒。



1949年刘少奇访问苏联期间在莫斯科宾馆办公室

作为我来讲，本来的安排是，等到代表团的工作完了以后，要留在莫斯科，帮助王稼祥同志筹备驻苏使馆。但是，中间突然提出，要我去新疆。在这个问题上，也表现出苏联的确是愿意同我们要搞好关系的，表现了他的诚意、好意。中国国内解放战争的胜利开展，美国帝国主义者很不甘心，他们在西北策划了一个阴谋，要把西北的“五马”（马鸿宾、马鸿逵等）撤到新疆，跟新疆的“大伊斯兰主义者”、“大土耳其主义者”共同配合，使新疆宣布独立，成为伊斯兰共和国。一旦独立，美国立刻宣布承认。斯大林因此讲，如果他们的阴谋实现，那

你们解放新疆的问题就会成为国际问题。他建议我们提前解放新疆。少奇同志立刻向中央做了报告。我们原来准备1950年解放新疆，为了使美国企图把新疆独立出去的阴谋落空，中共中央接受了斯大林的意见，争取在1949年当年解放新疆，提前了一年。

围绕解放新疆的问题，斯大林还建议我们立即派人与伊犁三区的地方政权取得联系。说这个政权是反对国民党的，这样人民解放军就可和新疆西面的武装力量形成东西夹击的态势，促进新疆问题的解决。在这种情况下，少奇同志和中央商量，认为从北平派人去来不及，就从莫斯科派我去伊犁，有苏联的帮助，从苏联的边境进入新疆，那是十分方便快捷的。临走时，少奇同志同我谈了一次话，叮嘱我说，外事工作无大小，事事都要请示中央。一定要注意，一定要慎重。

当时，苏联对中国革命是采取了帮助的态度。他们也怕美国搞的阴谋得逞以后会对苏联造成很大麻烦，有个中国党和新中国的政府和苏联挨着，事情会好得多。

中央电视台记者：现在专家们对刘少奇同志对经济合作社问题有两种看法，一种说刘少奇在西柏坡时的思路和建国后的经济思想关联不太大，另一种则认为是一贯的。您是怎么看的？

邓力群：我想讲一件与此有关的重要事情，可以明白的。在东北解放战争快结束之前，辽沈战役还正在进行，1948年8月间，张闻天交给我一个他所起草的文件《关于东北经济构成及经济建设基本方针的提纲》，要我好好看一看。我原在吉

林的榆树县工作，是后来调到东北局的。张闻天在给我看了以后，对我说，他起草的这个东西，讲的是在东北解放以后，建设的任务成了首要的任务。在这种情况下，整个东北地区的经济关系将是怎样的关系，针对这些关系应该采取什么样的方针，已经是很迫切的问题了。这个文件经东北局同意上报了中央，大概是在八九月间报到西柏坡的。少奇同志首先看了这个文件。他非常重视，亲自动手，进行了很多重要的修改。报送毛主席，毛主席也在上面作了修改。然后回电东北局，说这是一个很好的文件，并指示其他中央局要参考仿效，加以学习。这是解放以前，七届二中全会以前，刘少奇同志所做的一件十分重要的事情。可以说，这是毛主席在七届二中全会上讲话的先导。当然，毛主席在七届二中全会讲的，比张闻天起草、刘少奇修改的要更集中，更有理论深度。但确实可以说，张闻天写的这个东西，经刘少奇修改后送到毛主席那里，对毛主席形成七届二中全会的讲话，起到了重要的诱因作用。如果当时不是刘少奇重视，这个文件很可能被搁置起来。

许多事情，电视纪录片里不可能讲得那么详细。但作为研究的同志就有必要对照一下张闻天的稿子是怎么写的，少奇同志删掉了些什么，增加了些什么，哪些地方毛主席又作了修改，哪些东西送到毛主席那里就肯定了。然后结合后来的实践，刘少奇同志的这些补充意见对还是不对。实践已经证明这是我们制定建设新中国的方针的一个重要步骤，少奇同志对此作出了重要贡献。

中央电视台记者：邓老，您跟少奇同志多年，您对少奇同志的性格可不可以谈一谈？

邓力群：这个得想一想。他这个人从来不把个人的地位和生活中的事情放在心里。对待同志的缺点，不管熟人还是生人，只要他看到了的，就毫不客气地进行批评。

中央电视台记者：可否举个例子？

邓力群：拿我亲身经历过的事情说一下。1943年他从华东新四军回延安参加整风，正是审查干部的时候。我那时在中央政治研究室。“抢救运动”以前，总学委说，给我们一个反面教员，要我们学委去审查，这个人有历史问题，政治问题，把它搞清楚。这是个女同志，她是在河南加入中国共产党的。河南有个复兴社，是国民党的特务机构，它搞外围组织，叫忠义社。这个女同志在入党以后，搞不清楚怎么回事也加入了忠义社。加入忠义社之前没有向组织报告，加入以后也没有向组织报告。到了延安整风她在表上填写了这个事情。发现这个问题，可是个大问题！入党以后事先不请示不报告，加入了国民党特务的外围组织，这还能算是个小问题？我们看了材料，没作什么调查，就同她谈话，要她回答问题，攻了她一个星期。问她这个问题她回答不了，问她那个问题她回答不了，逼到最后她说她的问题只能跟少奇同志讲，不能跟我们讲。因为少奇在华中局开辟过河南的工作，这个女同志在河南的问题要找少奇同志谈，也事在理中。我们听她这么一说，心里倒也很高兴，你现在愿意坦白交代了，不愿意向我们交代，向少奇同志交代不一样吗！我向少奇同

志汇报了，说有这么一回事。少奇说，好，那就找她来谈吧。结果一谈，她说我们对她搞逼供信。后来少奇同志找我去，说你们除了现有的材料以外，还作过什么调查没有？还有什么别的材料吗？我说没有啊。少奇同志说：“这个人有问题，不是没有问题，可是她有问题还不能肯定她是一个坏人。在这样的情况底下，你们采取这样的办法向她进攻，这是‘左’倾冒险主义。”少奇同志批评得非常尖锐，一直到现在我还记得清清楚楚，印象很深。少奇同志认为她是一个有问题的党员，但还没有确证足以肯定她是坏人。两方面都还有问题，需要作调查，还不能作结论。这次谈话，使我终生难忘。审查人得有证据，才能作结论。这时候，应该说我跟少奇同志只是一面之交，只是我曾请他到马列学院讲过课，谈不到熟，也谈不到是生的。反正，少奇同志是不管你生熟，只从党的利益的角度看待每一件事，只要见到你有缺点，他就毫不客气地尖锐批评。

中央电视台记者：少奇同志有没有因为工作人员做错事而拍桌子的事？

邓力群：我的印象中没有，也没有听说过。但是少奇同志要求工作人员同他之间要随便一点，这倒是有的。我从新疆调到北京以后，到中办第一办公室工作。这个办公室是杨尚昆直接管的，实际上是一个专门为少奇等其他中央领导服务的机构。有一次少奇同志召集我们办公室的人开会，说：“你们和我的关系是帮助我做工作，做的工作是秘书性的工作。但是不给你们这些人以什么名义。”很多人说邓力群是

刘少奇的政治秘书，这是不对的。我一直讲，我为少奇同志做过秘书工作，但我不是他的秘书。后来少奇同志又让我和李波人两个，到他那里，称为甲楼的那个地方办公。他交代，我们每天晚上都去，把收到的文件先看一遍，认为有必要让他看的，挑出来送给他。哪些认为可以转发，哪些他看看就行了，叫我们写在上面。再有，我们觉得看了这个文件，看了那个文件，听了这个事，听了那个事，需要找他谈，随时可以去同他谈。他说，楼上楼下嘛，随时都可上来。到他房间里，他不从椅子上站起来，我们也不一定坐下，他不迎接我们，也不送我们，谈完了，要走就走，大家随便一点，不要管那个礼貌，什么来了以后打个招呼，站起来，走的时候拉拉手啊，送出门哪，这些都免了。这是少奇同志说的，实际就是这样。

少奇同志为了党的事业，心地光明磊落。大量的事情反映出，少奇同志对他的家属的要求，特别是对自己子女的管教是非常严的，包括对他自己的生活的要求，是近于苛刻的。他抽的烟，一直是大前门。他对自己身边的工作人员的要求，一句话，休想在他那里沾光。我亲自听他说过会让一些人感到很不好听的话，要得罪人的话，但他不顾。他说机关里头管行政工作的有些人员，把这个好处、那个好处给我们，不想要的给了，不想享受的给了，经营这个经营那个，把我们搞好了，他们乘机把自己也搞好了，这些人有私心。你说，这样的语言，这样的说法，不是很得罪人的吗？把你服侍好了，还说我们有私心！可是，他确实表明了他的一个态度，不要因为他是国

家主席、党和国家的领袖，他就可以享受额外的待遇。底下的人，行政人员，他们搞这些额外的东西都是不对的。老实说，确有这样的人，把上头搞好，是为了自己搞好，这种情况现在更厉害了，厉害得多了。

1957年春，我们几个人同他一起出去考察人民内部矛盾问题。一路都坐火车，吃、住、开会、找人谈话都在火车上。也下去找人谈话，谈完了还是回到火车上。同他几次出去，都是这样的生活习惯、生活秩序。到各个地方都不要送往迎来那一套。这样可以了解比较真实的情况，直接找工人、农民谈话，直接找基层组织谈话。

还有一件事，也值得讲。那也是1957年，我们跟少奇同志坐火车，从北京一路往南走，在河北了解到煤矿井下工人的工资待遇，好的每月能有四百多元。他听了笑起来，笑得好高兴。说煤矿井下工人的月工资超过我们的国家主席了，这可是个好事。应该这样办。又说，井上工人和井下工人要有区别，井下工人干得好的和干得差的也要有区别。为了井下工人的月工资超过国家主席的待遇，他如此高兴，认为这是社会主义国家的一件好事，这种感情跟我们现在大不一样。少奇同志的那种感情是值得怀念的。他的一生言行，都牢牢地牵连着普通劳动人民的最高利益。他坚持一心为人民，同人民采取平等的态度，不愿意把自己比人民高出一头，事事特殊。今天就说到这里吧。

（访谈日期：1998年3月18日。

吕玉生、王凤环记录，朱元石整理）

邓力群著：
我为少奇同志说些话

白区工作正确路线代表再认识

少奇同志在中国共产党和中国革命的历史发展的几个重要阶段，所建立的功勋、体现的品德、留下的著作，应该列入我们的党史、国史的重要篇章。恩格斯曾经说过：文艺复兴的时代是群星灿烂的时代。但那是资产阶级的时代。对中国来讲，新民主主义阶段开始以后，从1919年以后，也是中国历史上群星灿烂的时代。在群星灿烂之中，毛、刘、周、朱这个集体星座，必将受到中国工农群众、全国各族人民的万世敬仰。可是要把他们的功、德、言、行能够很好地整理出来，传下去，这件事情很不容易。相对地，整理刘少奇的功、德、言、行，同毛泽东、周恩来、朱德来讲，难度更大一些。就眼前要编辑的电视片来说，要搞好，很不容易。我作为帮助少奇同志工作过一段的人员，有责任把我直接听到的、看到的，以及间接了解到的，尽可能地讲出来，给同志们提供必要的材料。其中重要的事情，多年来反复想，反复理解。细节可能忘了不少，但基本的事实在现在还可以回忆起来。接到你们的通知以后，我一直在想这个事。想到一件事、一个问题，就列一个问题，写下

来，没有什么次序，想到什么就写什么，还只是题目。从何说起呢？还是从1936年刘少奇同志任北方局书记说起吧。

1945年4月20日中共六届七中全会通过的《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中有一段话，对刘少奇作了很高的评价：“刘少奇同志在白区工作中的策略思想，同样是一个模范。刘少奇同志正确地估计到一九二七年革命失败后白区特别是城市敌我力量的悬殊，所以主张有系统地组织退却和防御，‘在形势与条件不利于我们的时候，暂时避免和敌人决斗’，以‘准备将来革命的进攻和决斗’；主张有计划地把一九二四年和一九二七年革命时期的党的公开组织严格地转变为秘密组织，而在群众工作中则‘尽可能利用公开合法手段’，以便党的秘密组织能够在这种群众工作中长期地荫蔽力量，深入群众，‘聚积与加强群众的力量，提高群众的觉悟。对于群众斗争的领导，刘少奇同志认为应当‘根据当时当地的环境和条件，根据群众觉悟的程度，提出群众可能接受的部分的口号、要求和斗争的方式，去发动群众的斗争，并根据斗争过程中各种条件的变化，把群众的斗争逐渐提高到更高的阶段，或者适可而止地暂时结束战斗，以准备下一次更高阶段和更大范围的战斗’。在利用敌人内部矛盾和争取暂时的同盟者的问题上，他认为应该‘推动这些矛盾的爆发，与敌人营垒中可能和我们合作的成分，或者与今天还不是我们主要的敌人，建立暂时的联盟，去反对主要的敌人’；应该‘向那些愿意同我们合作的同盟者作必要的让步，吸引他们同我们联合，参加共同的行动，再去影响他们争取，他们下层的群众’。一二·九运动的成功，证明了

白区工作中这些策略原则的正确性。”^①

刘少奇是白区工作正确路线的代表，是不是包括“一二·九”以后到抗战以前这一年？决议里只是说了“一二·九运动的成功，证明了白区工作中这些策略原则的正确性。”过去一般的理解，所谓白区工作正确路线的代表，主要地是指在“左”倾宗派主义和教条主义统治我们党的时期，刘少奇在白区（即国民党统治区）所做的工作。

现在，经过研究，我要说，刘少奇是白区工作正确路线的代表，不光是这一段。

刘少奇的一生曾经有两段时间在国民党统治区做秘密工作。一段，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到他1932年冬进入中央苏区之前；一段，1936年3月他去北方局工作，直到抗日战争爆发。

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到1932年这一段，刘少奇在国民党统治区的工作很不顺利，可以说完全是在逆境中工作的。这不仅有敌人的白色恐怖，而且还要受党内的高压。刘少奇开始在国民党统治区做秘密工作，并不是没有根底，并不陌生。他在大革命中一直做工人运动工作，积累了许多如何做秘密工作的经验，有成套工作经验，是一位有丰富实践的杰出工运领袖。正因为这样，他在大革命失败之后，不仅能正确地估计形势，而且能提出许多对应的正确主张。他比那些只是从书本来到书本去的教条主义者要高明百倍。但是这些脱离实际又自以为是“左”倾教条主义者，在党内居领导地位。在他们的“左”倾路线的统治下，刘少奇的言论主张、实践行动，都被认为是

^①《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979—980页。

右倾机会主义的，受过批判，受过打击，受过排斥，受过处分。这些压力，不仅来之于国内，而且来之于国际。刘少奇的“右倾机会主义”是在赤色职工国际中挂了号的。刘少奇从实际情况出发，坚持马克思主义理论和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主张和做法，得不到支持。结果呢，国民党区的共产党的组织和革命力量，几乎百分之百的被搞掉了。实践证明，刘少奇的那些意见并非右倾机会主义，而是马克思主义的。但是，这个结论是直到好久以后才得到的。

第二段，1936年3月到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这一段，刘少奇在国民党统治区进行秘密工作的情况就大不一样了，好比是如鱼得水。刘少奇大展雄才。何以能如此？因为条件不同了，天造地设，今非昔比，刘少奇得到了正确的领导。刘少奇从1932年冬离开上海到江西中央革命根据地，后来经过长征到陕北，在这一过程中，经过1935年的遵义会议，“左”倾军事路线得到克服，毛泽东的领导地位在党中央和红军中得到确立，长征的胜利使毛泽东的正确路线得到进一步地确认和发展。正是在这种情况下，根据形势的发展，根据工作的需要，刘少奇接受党中央的指派而到北方局去的。

所以，这两段要说有什么不同和区别，前一段是“犯上”的，顶着干的，刘少奇在“左”倾错误路线的领导下工作动辄得咎；后一段是贯彻执行党中央、毛主席的正确路线的，从而刘少奇的创造性工作也得到了党中央和毛主席的完全支持，工作得心应手，毛泽东的正确路线的指导和刘少奇在实际工作中的发挥相得益彰。



1928年3月，刘少奇受中共中央委派参加中共顺直省委的领导工作。图为中共顺直省委旧址



1929年6月4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决定刘少奇任中共满洲省委书记。图为中共满洲省委旧址

为此，要特别说一下这第二段。刘少奇在白区的工作，不仅应该包括 1927 年大革命失败后到 1932 年冬他进入中央苏区之前的这一段，还应该包括“一二·九”运动以后到抗战爆发这一年多的工作在内，因为这也是在白区，也是在国民党统治区里所进行的工作；而且刘少奇的所谓白区工作正确路线的代表，前面一段是从反方面来证明的，后面一段是从正方面来证明的，前面是从失败之中得到的教训，后面是从成功之中得到的事实。刘少奇是白区工作正确路线的代表，是完全由革命的辩证法来帮助进行和实现的。

是不是这样？我们来看。

刘少奇经过长征到陕北，参加了 1935 年 12 月中旬召开的瓦窑堡会议。会议中间，从国民党统治区传来振奋人心、要求“停止内战，一致对外”的北平学生“一二·九”反日游行示威的消息，它表明一个抗日救亡运动的新高潮正在全国掀起。会议作出决议，确定抗日统一战线策略，将“抗日反蒋”作为基本方针。它指出，目前时局的基本特点是日本帝国主义要单独吞并中国，引起了帝国主义内部矛盾的空前紧张，引起了中国各阶级、阶层关系的剧烈变化，不仅工人、农民、广大的小资产阶级群众和革命的知识分子，就是一部分民族资产阶级与地方军阀，也有直接参加反日战线的可能，包括在地主买办阶级营垒中也可能发生分化。因此，不论什么人，什么派别，什么武装队伍，什么阶级，只要是反日反蒋的，都应该联合起来。我们的任务，不但要团结一切可能的、反日革命力量，而且要团结一切可能的反日同盟者，不使一个爱国的中国人不参加到

反日的战线上去。“这就是党的最广泛的民族统一战线策略的总路线。”

会议后，毛泽东作了《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的著名报告，传达瓦窑堡会议决议，系统而精辟地阐述了抗日统一战线的策略。毛泽东指出，目前形势的基本特点，就是日本帝国主义要变中国为它的殖民地。当革命的形势已经改变的时候，革命的策略、革命的领导方式也必须跟着改变。目前的时局要求我们勇敢地抛弃关门主义，采取广泛的统一战线，防止冒险主义。统一战线的策略和关门主义的策略，是相反的两个不同的策略。只有统一战线的策略才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策略。关门主义的策略则是孤家寡人的策略。关门主义“为渊驱鱼，为丛驱雀”，把“千千万万”和“浩浩荡荡”都赶到敌人那一边去，只博得敌人的喝彩。关门主义在实际上是日本帝国主义和汉奸卖国贼的忠顺奴仆，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向之掌嘴，而日本帝国主义和汉奸卖国贼则向之嘉奖的东西。我们一定不要关门主义，我们要的是制日本帝国主义和汉奸卖国贼的致命的民族革命统一战线。毛泽东特别强调，日本帝国主义要把整个中国从几个帝国主义国家都有份的半殖民地状态改变为日本独占的殖民地状态，给中国一切阶级和一切政治派别提出了怎么办的问题，因而就必然也要促使我们的敌对营垒发生破裂。并由于中国政治的不平衡，以及由此而生的革命发展的不平衡，增大了这种破裂的可能性。我们要把敌人营垒中间的一切争斗、缺口、矛盾统统收集起来，作为反对当前主要敌人之用。

刘少奇对中央的这些意见完全赞同。

在新形势下，12月29日的一次政治局常委会议，着重而具体地讨论了抗日运动高涨之地北方局的工作方针和加强组织领导的问题。从遵义会议后已经心悦诚服站到毛泽东正确路线一边来的张闻天，在会上指出，北方局所管理的范围很大，与满洲、太原、热河、察哈尔都有关系。为加强对北方局的领导，需要派出得力的同志前去。他说他在会前已同刘少奇商量，刘少奇也同意了。会议决定派刘少奇去北方局，名义是中央驻北方局代表，代表党中央在那里领导，任务是贯彻瓦窑堡会议的精神，使“党的新的路线在实际环境中具体运用”起来，大胆地运用党的策略，同时巩固党的秘密组织，把秘密工作与公开工作联系起来做好。

这样，刘少奇就在中央的指派下，化名胡服，半个月后即由瓦窑堡出发去华北。

1936年三四月间，他到了天津，以中共中央代表的身份主持工作，成为北方局的负责人，并很快改组了北方局。从那时起，一直到抗日战争爆发，这一年多的时间里，他所执行的路线不折不扣，是瓦窑堡的路线，是正确的路线。这一年多的时间，由于贯彻了党中央瓦窑堡会议的路线、方针、政策，取得了前所未有的成绩，为抗日战争做了很好的准备。在刘少奇的领导下，主要是华北，同时也影响到国民党其他地方，把党的工作大大开展了，在国民党地区形成了一个比较强大的爱国民主进步力量。到抗日战争爆发以后，中国共产党和国民党实现第二次重新合作，我们原来的苏区改名陕甘宁边区政府，红军改成八路军，南方游击队改成新四军，这是我抗日的主力。我

们的部队经过东征，东渡黄河进入华北，便立即实现了两个力量的汇合，即民主革命根据地的力量（主要是红军的力量）和国民党地区刘少奇领导之下形成的爱国民主进步力量的汇合。这两个力量一汇合，便不是一加一的力量，发挥出无比威力来，很快取得了在抗日战争中建立十几个敌后根据地的空前未有的胜利。

因此应该这样说，刘少奇不仅是“左”倾路线统治时期在国民党地区进行秘密工作的正确路线代表，也是毛泽东正确路线领导时期在国民党地区通过北方局进行秘密工作的正确路线代表。应该包括这两段。而成绩之大，莫过于他在北方局的这一年，事业更加辉煌。他纠正冒险主义与关门主义，深入指导和发展白区工作，不失时机地努力扩大统一战线，广泛开展抗日救亡运动，与中共中央积极密切配合，能动地为中央提供实践中提出的最可宝贵的思考问题的材料、实例、经验和方向，在政治上掌握主动权，这些作用都是非同小可的。这一年多的工作，对以后的抗日战争前途的发展、抗战力量的发展、敌后抗日民主革命根据地的建立和发展，意义不可估量。

刘少奇到北方局这一年多里，究竟做了哪些方面的具体工作？

尽管北方局党组织在事实的严酷教训下指导思想和工作方法都开始转变，但毕竟对以前的“左”倾路线还没有做过系统的批评和清算，还有着残余的影响，甚至在有的问题上表现得还相当严重，这也是情理之中的事。刘少奇以中共中央代表的身份，主持中共中央北方局的工作以后，首先为肃清党内

的“左”倾关门主义和冒险主义的影响而进行了努力，实现他所主张的，在目前形势下，我们党要成为群众的党，领导群众、组织群众，去进行反日斗争，很好地把秘密工作和公开工作结合起来。为此，他在中共河北省委的内部刊物《火线》以及其他刊物上发表了许多重要的文章，进行党内外的教育，有的署名 K.V.，有的署名陶尚行，有的署名莫文华，有的署名吕文。例如，《肃清立三路线的残余——关门主义冒险主义》一文，列举关门主义和冒险主义的表现及危害，分析其根源和在党内长期存在的原因之后，严重指出，这是目前党内的主要危险，因此必须给这种“左”倾错误以致命的打击，把它彻底肃清。《人民阵线与关门主义》一文，主要论述了建立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必要性和可能性。刘少奇于此不仅指出民族统一战线是我们战胜侵略者的中心关键，所以阻碍和破坏民族统一战线的关门观点就是主要的危险，还说明抛开统一战线来谈领导权实际上就是放弃领导权。在《论合作抗敌的一封信》中，刘少奇重申中国共产党“团结全民，抗日救国”的主张，强调我们号召停止一切内战，组织全国的统一国防政府和抗日联军，这是四万万同胞所了解的共同口号，所一致要求的行动。为着能够最后地战胜日本侵略者，红军和其他抗日军队就愈需要长期的合作，就应共同采取“一切为着抗日战争”的态度。在《肃清空谈的领导》一文中，刘少奇严肃指出了在北方局的党的组织中存在着严重的空谈主义，因而要求必须改变空谈的工作作风和空洞的领导方式，不要把“准备抗日”和“统一战线”当“圣经”来念，而应从当时当地的实际出发来进行“准

备抗日”和统一战线的工作。《关于白区职工运动工作的提纲》一文，刘少奇在总结了历史经验之后，也着重地指出，必须彻底肃清实际工作中的关门主义与冒险主义，更加改善党的秘密工作。强调为着争取群众，创立和积蓄工人阶级的力量，必须特别注意领导工人群众经济的、政治的日常斗争。对于没有胜利把握的斗争应该停止，在斗争延长对于工人不利时应该适可而止，要利用一切方法、一切公开的可能来广泛联系与组织工人群众。刘少奇在该文中还主张，我们的同志和革命的工人要打入黄色工会中去，利用黄色工会来组织工人群众和斗争。经过我们的工作即使其群众和领导机关都已到了我们的领导之下，也不要急于把黄色工会转变为赤色工会，只有到了革命爆发时，我们不需要黄色工会的外表来掩护了，才能做这种公开的转变。对于公开工作和秘密工作问题，刘少奇还专门写了一篇《公开工作与秘密工作的区别及其联系》的文章，作为党内教育的材料。刘少奇说，公开工作和秘密工作的区别及其联系的问题是白区工作方法上的中心问题，过去的错误一是没有尽量去利用一切公开的机会与可能来进行活动，使工作束缚在狭小的秘密工作范围内；二是许多本可以公开进行的工作也拿到秘密机关和秘密组织中采取秘密的方法来进行，致使我们的秘密工作和秘密组织扩大，妨害秘密性而帮助了敌人的侦探；三是一些冒险的做法因受到打击和脱离群众而使本来可能公开的组织也不必要地变成了秘密组织。这些做法都要加以改正，否则我们的组织就无法巩固，我们的力量就无法积聚。刘少奇辩证地指出，公开工作与秘密工作是有区别的，不能混淆。让公

开的更公开，秘密的更秘密。但两者也必须有机地联系起来，配合起来，要做到公开工作不脱离正确指导，而得到党的支持，秘密工作不脱离广大群众，而能够得到群众的掩护。

为给党员和干部加强革命策略和群众工作方法的具体教育，刘少奇还抓了一个典型事件。刘少奇来到天津时，开启“一二·九”运动的平津学生运动正处于困境之中。在蒋介石“严厉制裁”的指令下，平津的不少大中学校遭到了反动军警的武装镇压，许多进步师生被捕，有一个叫郭清的学生甚至惨死狱中。愤怒的北平学生因此于3月31日举行了抬棺游行，被称之为“三三一”事件。这一事件，表明了爱国学生的可贵激情，但在策略上的确考虑不周，同样表露出了关门主义与冒险主义在其中的残余影响。在当局高压政策下，有些学校的骨干几乎都暴露，“三三一”游行中被逮捕去42人，其中有学联主席黄华，我上学的汇文中学中也有人被捕。后来经过多方营救，逐渐释放。当时刘少奇在了解情况后，认为首先要解决的是华北党的路线问题、指导思想问题。学生运动发展到这一步，并处于孤军作战状态，主要是因为领导运动的中共北平市委和北方局还是有“左”倾错误路线的残余影响。不坚决肃清党内的这种错误路线的残余影响，党内生活和工作作风的改善就不可能，党的统一战线新政策的执行就不可能。为此，在中共河北省委内部刊物《火线》第55期上发表《肃清立三路线的残余——关门主义冒险主义》一文的同时，刘少奇还在这期上发表了一篇针对“三三一”事件的问题所在而写的《论北平学生纪念郭清烈士的行动》的一封信。

刘少奇总结北平学生在“三三一”抬棺游行中，与校方发生严重对抗，并遭受军警突然袭击，许多学生骨干被捕的教训，指出它是少数先进分子的冒险行动，足以陷自己于孤立的“左”的倾向。“这样的行动，如果再有一次以至几次的话，在敌人严重进攻之下，会使一切民众的爱国组织完全不能公开，会使你们完全脱离广大群众，使许多组织塌台，使许多同志和先进的爱国志士被捕被杀，使汉奸法西斯蒂夺到‘爱国运动’的领导地位来窒息爱国运动。”信中指出，当敌人想尽一切办法来进攻爱国人民的时候，处于防御地位的爱国阵线，应该采取的正确策略是：更加巩固与扩大人民的统一战线，保存、巩固与加强自己的组织和阵地，暂时避免和敌人进行决定胜负的战斗，以准备击退敌人对于人民的进攻。郭清是应该追悼的，应该利用这件事来更加激发群众抗日反汉奸的情绪。但是应该讲究方式。可以设置灵堂，由各界人士自由去致祭、送挽。要开追悼会，可以与学校当局商议，可以请学校当局、教授讲演，也可以举行较盛大的葬仪，完全公开地进行纪念。如果某些事像开会、举行盛大葬仪等这样的举动也不允许，那么少做一两件事也不是什么可耻的事，这样做，相信会得到成功的，不会失掉群众和社会的同情，也不会引起敌人的严重压迫。他恳切地要求北平的同志，“以后再不要重复这种错误，并以这一具体事实，在党内开展反对关门主义的斗争。”人们听到这样高明的指点，不少人佩服。有些人开始想不通，事后也在实际进程中慢慢想通了。

对刘少奇的批评，也有的同志当时就不同意。但是无论如

何，刘少奇纠正学生运动中“左”的偏向，中共北平市委立即根据刘少奇的指示并因此而努力做好这件事情的善后工作，就很快消除了学校当局和教授中与学生对立的情绪，很快打破了学生的“孤军苦斗状态”。这一起步非常重要。

这一起步表明了转变策略的实际运用，在这个基础上便进一步开展对地方实力派的爱国统一战线的工作。起先我们反对宋哲元，骂他卖国贼，因为他是华北自治委员会即冀察政务委员会的首脑。少奇同志来了以后，认为在全国救亡运动高涨的情势下，这些人还是会发生动摇、不甘当汉奸的，有转向抗日的可能。因此转换策略，改“打倒卖国贼宋哲元，打倒冀察政务委员会”的口号，为“拥护宋委员长抗日”、“拥护二十九军抗日”的口号，并派人打入宋的部队里去做中上层军官的联络和争取工作。平津学联根据这一新精神，也积极开展了对华北军政当局的工作，组织学生参加二十九军的军事集训，同中下层的军官交朋友发展关系，指派民先队员和爱国学生去讲时事、教唱爱国歌曲、做球类教练等。北平学联还曾写了《致宋哲元将军的一封公开信》。那时候北平的宪兵团是东北军，留在华北的还有一部分东北军的力量，里边原来就有我们党的工作，我们就更加强了对他们的工作。与他们搞座谈、联欢等活动，给他们演出《打回老家去》《放下你的鞭子》等救亡短剧，甚至还把许多公开半公开的进步刊物弄到部队中去，热烈宣传抗日救国的思想。这一段时间很短，但战线拉得很长，成绩非常突出。学生运动游行示威的时候，明显地看出来，东北的部队、东北的宪兵，对我们比较客气。后来宋哲元还派了刘子青

来同我们党联络。为此中共中央派了张经武到宋那里做联络代表，工作逐渐完全做到上层。群众的抗日救国运动，在国民党统治区一步一步走向完全合法化，因而更加风起云涌。

刘少奇的第二件重要工作是改组北方局，重建党的各级组织。原来北方局的书记是高文华，组织部长是柯庆施，宣传部长是李大章。1931年四中全会以后，强调工人同志挂帅。高文华是工人出身，本身是个好同志，但是水平有限，执行的又是那套“左”倾路线。要推行新的路线，不从组织上给予保证是不可能的。改组北方局是刻不容缓的事，刘少奇抓紧做了。在重建党的各级组织中主要重建了华北几个省、市委的组织，有河北省委（中共河北省委和北方局当时是一套人马，两块牌子）、山东省委、山西省工委、河南省工委、北平市委和天津市委，以及这些省委之下的区委、县委。其中包括把在国民党时期被破坏了的组织（如省委、地委或县委主要领导人被抓了，但还有些残余的人）、失掉组织关系的党员重新建立起联系。还根据中共中央交给的任务，派了少数干部到香港、广州、上海、武汉等地，恢复和建立起党的组织。当时派到北平市委任书记的是李葆华，派到天津任市委书记的是李铁夫，派到济南任山东省委书记的是黎玉。这样一来，中国共产党在国民党统治区的地下组织便又重整旗鼓，而且更严密坚强了。这是最根本的问题。鸟无头不飞，哪个地方有中国共产党作为核心，哪个地方就好办事了。

三是在向中央请示并作积极建议后，在北平竭力营救被捕坐牢的同志出狱。薄一波、刘澜涛、安子文、杨献珍等

“六十一人”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分成几批被营救出来的。实际上还不止，王若飞也是这时候出来的，还有其他一些人。这些同志出来以后，成了各级党组织的领导骨干，在各个方面、各条战线上演出了生动的活剧。例如，1936年10月，在刘少奇的主持下，北方局就派了薄一波、杨献珍等，组成中共山西省公开工作委员会，专门做阎锡山及其上层军政人员的工作。在薄一波走之前，刘少奇还授予机宜，要他踏踏实实做上层统战工作，踏踏实实做群众工作，注意积聚力量，争取中国共产党在抗日爱国统一战线中的领导权等。正是在刘少奇的有力指导下，薄一波等得以大胆自如地、以公开合法的身份，或积极接过阎锡山那里可为我利用的方面，或慎重提出为阎锡山所能接受的口号和工作方式，特别通过接办阎锡山所建立的“山西牺牲救国同盟会”（简称“牺盟会”），同阎锡山建立起了特殊方式的又不受阎锡山的框框限制的统战关系。接着又在阎锡山的名义下搞起了实际为中国共产党所领导的新军。正是在这样的基础上，也才使中共中央在1936年底有可能公开而正式地在太原成立专做阎锡山统战工作的机构，派出彭雪枫作为驻太原的中共代表。

四是发展新的组织、新的党员。我们党在自己所领导的群众组织里发展新的党员，这个工作主要是在民先组织内。我是1936年入党的，后来成为北平东城区委的干事。当时东城区委书记要我在所管的那些民先分队里发展表现好的同志入党。我先后管的民先分队有七八个，有一个后来转出去了。我在每个民先分队部首先介绍一个人，再经过他，在他的民先分队部里

介绍其他人。所以，这样的发展党员不是成倍的发展，而是成几何级数几十倍的发展。这是我们党发展的一个重要来源。

民先队也进行过一次重要的改组。民先总队部是刘少奇来北方局以前，1936年2月间在保定第一次宣布成立的。那时只有北平、天津有总队部。刘少奇来了以后，在1937年三四月，民先队改组为全国的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总队，下属有北平的地方分队、天津的地方分队，同时在其他地方也成立地方分队。李昌原来是北平的总队部的队长，到1937年以后他成为全国的中华民族先锋队的总队长，这时民先队的组织，不仅在天津、北平、华北几省，还在全国其他的地方，有多有少陆续地成立。我是1937年4月去的延安，那时候北平的民先队员有两千多人，天津的民先队员也是一两千人，合起来大概四千多（据刘少奇在1936年11月给中共中央的一个报告中说，其时“北平民先队，已发展到四五千人”）。全国的民先队，到抗日战争爆发以前，少说也有近万人，可能还不止。刘少奇当时讲，这个民先组织，是我们党单独领导的青年群众组织，不能让其他的党派来同我们党分享领导。共青团组织已经于1936年6月取消，当时中央有个指示，所有共青团员都转为共产党员，团龄作党龄计算。这样，地区民先队部受当地地方党委的领导，同时也受全国总队部的领导。抗战以后，大部分人到了华北抗日根据地。不少人往南走，流亡各地。流亡的过程中，走到哪里，就在哪里发展。这个青年组织，只有共产党领导，不同其他党派分享领导的结果，成为我们在青年中积蓄力量、生长力量的支柱。

“一二·九”以后，救亡运动普及全国。做学生工作的，还有学生会、学生联合会，校的、市的、省的、全国的学生联合会。“双十二”事变后，蒋介石回南京，北平发生了一个新旧学联的斗争。我们这些人是旧学联，跟着国民党走的是所谓“新学联”，两方面斗得非常厉害。可是他们没有优势，优势在我们这一方面。我们做青年学生的工作，主要通过民先，但不只是民先。民先在青年学生中的工作，使那个“新学联”望尘莫及。

接着，就是做各界联合会的工作，以至成立全国的爱国联合会，包括沈钧儒等这些人都联合了进来。推动这个联合进程的力量是北方，是刘少奇领导的北方局，是刘少奇派了人到上海去发动和组织起来的。这都是属于群众工作的各个方面、各个阶层的爱国群众工作。

这些工作主要是在华北，同时也影响到华中、华南以至上海、南京等地。当然从党委来讲，那里有那里的党委，但实际上对工作发生着巨大影响的是北方局。有的时候是北方局派人去，有的时候是他们自己派人到北方局来争取领导，建立起联系。开展了这么多方面的工作以后，等到1937年7月抗日战争一爆发，我们在国民党地区就有了力量的准备。在我们根据地，经过西安事变，力量也更强大起来，而且建立了同国民党的合作，举兵东渡黄河。北平、天津失守以后，大批的共产党员、民族解放先锋队员，还有其他组织，凡是不愿当亡国奴的青年，都先后进入敌人后方，同八路军在一起。两个力量的汇合，使我们在敌后根据地的建立，有了成套的队伍、成套的干部。做军事工作的是八路军，做地方政府、党的组织工作的，

主要是北方局领导的这些同志。那时国民党一败涂地，敌人进展很快，在敌人的后方留下了广大的空间。一个县，我们只要有那么几个战士，加上北平、天津撤出去的党员，就把县的架子成立了，县的大队成立了，各级组织成立了。少奇同志在这个问题上功不可没。如果只是红军东征，地方干部没有，政府工作、群众工作没有人做，我们根据地的建立就不可能那么神速，面也不可能有那么宽，建立了起来也不可能这样巩固。可以数一数那时敌后抗日根据地的排名。各个根据地做地方工作的，大部分是原在国民党区工作的老党员和新党员。最有名的冀察晋，司令员是聂荣臻。中央局书记是彭真，彭真是北方局的。晋西北司令员是贺龙，书记是林枫，林枫是北方局的。冀中司令员是吕正操，党委书记是黄敬，黄敬是北方局的。去冀察晋的，年龄大一点的还有刘澜涛、安子文、杨献珍等，年纪轻一点的有姚依林、陆平、董毓华等。去晋西北的还有张稼夫、康世恩等。去晋东南的还有杨秀峰、朱穆之等。去河南的还有袁宝华、刘玉柱等。山东分局书记是郭洪涛，宣传部长是孙陶林，与专员范筑先一起的，是东北大学的学生。跟我们一起搞南下宣传团的东北大学的学生宋黎，“双十二”前到了张学良那里，组织学兵队。

还不能忽略的是，经过这些人的影响，全国各地学生到延安，到根据地，我估计，前后大约至少也有两三万人。

当时，作为领导机构，在天津失陷以后，1937年8月，北方局在太原重新组建后，书记就是刘少奇了，副书记是杨尚昆，代表党中央管军事工作、统战工作的是周恩来。保卫武汉

前，周恩来主要在华北。临汾撤退前，中央分管白区工作的是张闻天，1936年4月，中央决定张闻天兼管北方局工作。1938年以后，周恩来去武汉了。1938年六中全会以后实际是完全是由毛泽东来指导刘少奇的工作了。少奇是帮助毛泽东整个管理华北的工作，包括敌占区工作。刘少奇在延安耽搁了一段时间，来来往往，有的时候在延安，有的时候去北方局。一段时间里，毛泽东要刘少奇与他一起管白区工作，一直管到刘少奇去华中。六中全会以后，白区工作统一归毛泽东领导，一直到1942年底，刘少奇重新回到延安。

华中也是两股力量，开辟新的根据地也是靠这两股力量。南方的新四军，南京、上海的党员，南京、上海的民先队员，都为建立华中、华东的抗日根据地作出了贡献。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两支爱国民主进步力量汇合的结果，形成了一个什么局面？这就是毛泽东1938年5月写的《论持久战》里所讲的三个包围和三个反包围的局面。毛泽东说得非常精彩。他在《论持久战》的第54节中写道：“包围和反包围——从整个战争来看，由于敌之战略进攻和外线作战，我处战略防御和内线作战地位，无疑我是在敌之战略包围中。这是敌对于我之第一种包围。由于我以数量上优势的兵力，对于从战略上的外线分数路向我前进之敌，采取战役和战斗上的外线作战方针，就可以把各路分进之敌的一路或几路放在我之包围中。这是我对于敌之第一种反包围。再从敌后游击战争的根据地看来，每一孤立的根据地都处于敌之四面或三面包围中，前者例如五台山，后者例如晋西北。这是敌对于我之第二种包

围。但若将各个游击根据地联系起来看，并将各个游击根据地和正规军的阵地也联系起来看，我又把许多敌人都包围起来，例如在山西，我已三面包围了同蒲路（路之东西两侧及南端），四面包围了太原城；河北、山东等省也有许多这样的包围。这又是我对于敌之第二种反包围。这样，敌我各有加于对方的两种包围，大体上好似下围棋一样，敌对于我我对于敌之战役和战斗的作战，好似吃子，敌的据点（例如太原）和我之游击根据地（例如五台山），好似做眼。如果把世界性的围棋也算在内，那就还有第三种敌我包围，这就是侵略阵线与和平阵线的关系。敌以前者来包围中、苏、法、捷等国，我以后者反包围德、日、意。但是我之包围好似如来佛的手掌，它将化成一座横亘宇宙的五行山，把这几个新式孙悟空——法西斯侵略主义者，最后压倒在山底下，永世也不得翻身。”^①这是中外历史上空前未有的奇观，这个奇观，就有少奇同志的不朽功劳在内。

无疑，毛泽东看到了刘少奇在其中的重大作用。中央对刘少奇的工作赞许有加。毛泽东逐渐起用这位曾在安源时为他所直接领导过的刘少奇，刘少奇也逐渐成为毛泽东的得力助手。他们在许多重大问题上都有共识，毫无保留地互相支持。

1936年8月5日，中央就表扬说：“我们认为北方党的工作，自胡服同志到后，有了基本上的转变”。^②转变主要表现在哪里呢？加强了政治的领导，纠正了关门主义的倾向，采取了

^①《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472页。

^②《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一九二一——一九四九）》第13册，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第215页。

适当的方式把党的刊物办成能直接影响全国统一战线的权威刊物，不仅能努力在华北建立起各界的救国联合，而且能顾及全国，不仅能围绕河北各省建立党的组织，而且能顾及上海、西南、武汉等地。对这些转变，中央高度评价说：“是已奠定了胜利的基础，开展着光明灿烂的伟大前途。”^①正是在这种情况下面，一直只由张闻天和通过张闻天对刘少奇做指导的情况开始变化。1936年8月14日，毛泽东在写给当时被中央派往华北地区做统一战线工作的代表王世英并转刘少奇的信中，就开始直接指示刘少奇说：张金吾（即张经武）同志为向宋哲元接洽之代表，不论此次宋处接洽成否，必须向宋及二十九军继续工作。韩复榘、傅作义、阎锡山、张自忠、刘汝明、商震六处，一有机会，即须接洽，“统一战线以各派军队为第一位，千万注意”。^②不久，10月1日，毛泽东又直接致电刘少奇指示：“争取与刘湘建立联系，并力求迅速。刘湘代表如在津，应留他等候中央代表一同赴川，如该代表要求离津，应从他取得介绍信及各种关系。”^③三个星期后，10月22日，毛泽东再次向刘少奇发信指示：北方统一战线非常要紧，特别着重于军队方面。加紧二十九军工作之外，晋绥应放在第一位。为这一事情，12月2日这天，毛泽东又两次致电刘少奇，说明“急需同晋绥当局成立友好关系，以便利红军行动”，要求“速从民族

^①《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一九二一——一九四九）》第13册，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第215页。

^②《刘少奇年谱（一九二八——一九六九）》上卷，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年版，第157—158页。

^③《刘少奇年谱（一九二八——一九六九）》上卷，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年版，第160页。

解放同盟或其他关系与晋阎、绥傅接洽”，“立即向晋绥当局提出如下条件：（一）晋绥容许红军参加抗日战线，划定一定防地，帮助解决给养、弹药。（二）红军愿意服从阎氏之统一指挥，并不干涉晋绥行政。（三）红军派出代表驻在晋阎、绥傅处，以资联络。”^①总之，中央对刘少奇的工作指示，从这时起，已不仅通过张闻天，毛泽东同刘少奇之间的直接联系也正在加强起来。

1937年5月间，在延安召开了中共白区工作会议，刘少奇作了《关于白区的党和群众工作》的报告。这中间对刘少奇的报告也就是对过去“左”倾时期白区工作的估价问题上表现出分歧和争论，并且为此提交到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来讨论。那么正是毛泽东明确地支持了刘少奇。毛泽东做了长篇的发言。说刘少奇的报告基本上是正确的，少奇对这个问题有丰富的经验，他一生在实际工作中领导群众斗争和处理党内关系，都是基本正确的，他懂得实际工作的辩证法。他系统地指出党过去在这个问题上所害过的病症，他是一针见血的医生。毛泽东的这个发言起了举足轻重的定音作用。毛泽东和刘少奇之间的关系进一步加深。

1937年12月中旬，在延安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这时王明刚从共产国际回来，以钦差大臣自居，下车伊始就哇里哇啦，在会上一副颐指气使样子，批评中央过分强调独立自主和民主、民生问题，提出了以“一切经过抗日统一战线”为主

^①《刘少奇年谱（一八九八——一九六九）》上卷，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年版，第169页。

要论调的一套比较系统的右倾机会主义的观点和主张。他反对在统一战线中坚持无产阶级的领导权，教训说：要承认国民党是领导的优势的力量，“空喊无产阶级领导是不行的。空喊只有吓走同盟军”，等等。他在发言中还借了共产国际和斯大林的名义。这使一些人因此迷惑起来。毛泽东是一步不让。刘少奇呢，在会上竟三次出来发言，结合自己在华北工作的情况，有力地阐明了在统一战线中坚持独立自主原则的重要性，就是强调要充分发动群众，以共产党为领导来团结一切抗日的势力与阶层，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权，坚持敌后的抗战。刘少奇批评王明的“一切经过统一战线”、“一切服从统一战线”，说如果是这样，我们在华北就是要一切经过阎锡山，一切服从阎锡山，他不同意你，怎么办？坚持统一战线的独立自主，用实践来批评王明的，第一个是刘少奇。刘少奇在这种情况下的表现，使毛泽东越来越看到，刘少奇是可以依靠的。

1938年3月的一次政治局常委会议上，毛泽东建议刘少奇留在中央指导华北工作。根据毛泽东的建议，中共中央书记处正式作出决定，为了适应目前特殊情况及各方面工作起见，“北方局负责人胡服暂时住延安，在中央指导下，仍旧担负华北党的领导工作”。自此之后，向下发出的一些文电，除了他单独的以外，常常是毛泽东、刘少奇两人联名或张闻天、刘少奇两人联名和毛泽东、张闻天、刘少奇三人联名了。

1938年9月29日到11月6日，中共扩大的六届六中全会召开。这次会议，根据当时形势决定撤销长江局，设立中原局和南方局，东南分局改为东南局。并明确决定要发展华中。这

样，便根据需要，中央决定刘少奇兼中原局书记，所有长江以北河南、湖北、安徽、江苏地区党的工作概归中原局指导。刘少奇接着就到河南竹沟布置中原局工作。从此刘少奇又肩负起了开拓华中抗日根据地的重任。中央认为，这个地方是我党发展武装力量的主要地域，并在战略上也是联系华北华南的枢纽，关系抗战前途甚大。刘少奇在1939年3月底又回到延安，因为中央这时还考虑要准备召开七大的事宜等，还要刘少奇参与这些事，所以还舍不得完全放刘少奇出去。真是这里也需要他，那里也需要他，说句笑话，有分身术就好了。直到9月，第二次世界大战全面爆发，日军在中国也已无继续向国民党作战略进攻的趋势之后，形势的发展使我发展华中的问题更变得迫切，毛泽东才不得不让刘少奇去中原局做全力的指挥者。刘少奇不负所望，仅半年多时间，就在华中敌后建立起了第一块人口约220万、新四军武装力量约26000人的抗日民主根据地，神速地取得了发展华中的立足点和实现发展苏北的坚实前进基地。再过半年，到1940年10月，当使得津浦路东西直到海边各根据地打成一片，打开在苏皖广大敌后地区建立抗日民主根据地的局面的时候，华中的工作便取得了决定性胜利，开辟华中的战略任务得到完成。刘少奇后来兼新四军政委。到1941年4月间，中原局与东南局合并为华中局，刘少奇任书记，受命领导整个华中的敌后斗争。最后使华中敌后形成了以苏北为中心的，包括苏南、苏中、淮北、淮南、皖中、鄂豫和浙东等根据地在内的、强大的抗战局面。刘少奇在这里一直工作到1942年春中央通知调他回延安，参加整风。

在回来的路上，毛泽东还要他沿路检查每个地区的工作。

在延安整风中，毛泽东把刘少奇的《论共产党员的修养》《论党内斗争》，都列入整风文献。所有这些，都不是随意的决定。

刘少奇的非凡毅力、出色的工作才能和不可替代的作用，受到了毛泽东的深深器重。然后才有我党历史上毛刘最相得的时期，共同挥写出建国前最辉煌的一章。

（访谈日期：1998年4月22日。

吕小蓓、王玉强、宋毅军记录，朱元石整理）

邓力群著：
我为少奇同志说些话

《三论》是党建学说的代表作

《论共产党员的修养》《论党内斗争》《论党》(以下简称《三论》),是党建学说的代表作;是刘少奇同志的,也是我们全党的。

《三论》是对毛泽东思想的发展,是毛泽东思想宝库中的重要组成部分。

《三论》的思想,教育了我们党几代人,又对兄弟党发生过重要的作用。

刘少奇同志在1961年6月说过:过去的文章他最近没有看,听党内外的反映,《修养》受欢迎,还翻译了各种文字,兄弟党一些同志也说好。为什么1939年的文章现在还能读者所接受呢?恐怕主要是因为马克思主义的经典著作,主要是从党的思想路线、政治路线、组织路线,党的建设的总体来讲的,而《修养》是从思想路线、政治路线、组织路线确定之后,每个党员应该怎样锻炼自己、修养自己这方面来讲的。这样讲,有自己的特色,能使读者得到帮助。

刘少奇1941年7月在华中局党校所作的《论党内斗争》的

报告，我记得当时特别受毛泽东赞许的是，其中刘少奇所提出的在党内生活中要保护、尊重少数的论点。毛泽东由此引申，说我们党的历史多次证明，真理往往是首先由少数人掌握，而这些人又往往受压。刘少奇提出的这个问题，从党的历史来讲，证明是我们党内生活中的一个重大问题。我们听了毛泽东讲话的传达，留下的印象很深。毛泽东讲这个话是在整风运动期间，估计是在印发《论党内斗争》的前后，当时刘少奇好像还没有回到延安。我原来记得《论党内斗争》中有保护、尊重少数这个话，最近我查看了一下选入《刘少奇选集》（以下简称《刘选》）中的这篇报告，结果没有。但这个意思可以找得到。

例如在《刘选》上卷第213页上说：

第五，必须给被批评被处罚的同志以一切可能的申诉的机会。在给同志做鉴定和组织结论的时候，通常均应通知本人，当面做结论。如果他不服，在经过辩论之后，应向上级申诉（一切在处罚后表示不服者，即使他本人不愿上诉，党的组织亦应代他上诉）。任何党的组织，不能禁止任何同志在被处罚后向上级上诉。党员的上诉权不能剥夺。一切的上诉书，任何党的组织不能扣压，关于思想原则问题，党员并可越级直接向高级党委或中央申诉。当然，上诉的同志应该在下面充分说明自己的主张和理由、分歧的意见何在，弄清楚之后，才去上诉，不能在下面不说，到上面又乱说，蒙混上级，企图取巧。一切案件上诉之后，决定权即在上级，上级党委可取消，或减轻、或加

重下级党委对同志的处罚。

在思想原则问题上，经过争论之后，如果还未在党内最后取得一致，是可以通过多数决定的。在多数决定之后，少数同志如果还有不同的意见，在组织行动上绝对服从多数的条件之下，是有权利保留自己意见的。

在《刘选》第 215 页上又说：

（七）各级党委应尊重每个党员提出的意见，应经常召集会议，讨论问题，检讨工作，给党员以充分发表意见的机会。

这个问题确实是个大问题。少奇同志的经验，毛主席的经验，其他所有同志的经验，包括后来的“大跃进”、庐山会议等，无不反复证明，如何正确对待少数人的意见是党内生活一个极端重要的问题。一直到今天，还是这个问题。在我们的党内生活中，因为坚持个人意见而被打击、排挤以至受处分等，这样的事屡见不鲜，因而到一定时候又得到平反的事也多得很多。这无论如何是应该吸取教训的，否则损伤太大。

任何一件事情都要做好群众的思想工作，这是刘少奇给我的又一个重大印象。1942 年春，刘少奇接到中央的指示，要他回延安，并要他沿路检查每个地区的工作。他就一路走，一路听汇报，一路发表意见。给我印象最深的，是他那个关于减租减息的指示。减租减息，是抗日战争时期我们党在根据地实

行的一项重要政策。但是在各地的执行中，不少是用行政的方法，发个通知，开个会便完了，没有把实行减租减息和动员群众结合起来。刘少奇与众不同，说：只是行政命令，颁布一个法令，发一个通知，或者开一个会，这种办法不可能真正实行减租减息。要真正实行减租减息，按照党的政策办事，一定要做好群众工作，而其中最重要的，是做好群众的思想工作。当时他讲了一个要解决谁养活谁的问题，是地主养活了农民，还是农民养活了地主，这个问题不弄清楚，搞减租减息也好，将来搞土地改革也好，千百年来受惯了封建剥削的农民，就总觉得没有理，不能成为自觉自愿的行动。农民长期受到欺骗愚弄，一直认为，种的是人家的地，当然得向人家交租子，人家的地，我们没收过来，良心上过不去。所以刘少奇一路总是讲，搞减租减息不能只靠行政命令，要做群众工作，首先要解决谁养活谁的问题，说明是农民养活了地主，不是地主养活农民，把这个千百年来案子翻过来。我们确实也有这个经验，劳动创造世界，谁养活谁这个问题不解决，搞减租减息可以明减暗不减，土地改革可以明分暗不分。解决了这个问题以后，农民的头脑眼界、思想观念豁然开朗，理所当然地认为应该减租减息，应该把土地分给农民，理亏的不是我们，理亏的是地主。你们千百年来，剥削者几辈子压在我们头上，如果没有我们劳动，他们不可能生活。这个问题的解决，据我深切的印象，是提高群众思想觉悟，依靠群众、发动群众正确贯彻实行党的路线的重要基础，是后来实行土改的重要法宝。

刘少奇到了延安，与毛泽东密切配合。刘少奇在七大所

作的修改党章的报告，一直到今天，是最高水平的报告。最突出的一点是关于毛泽东思想的阐述。经过刘少奇修改党章的报告，经过七大的决议，毛泽东思想成为我们党的指导思想，从而确立了毛泽东在我们党内的地位。更可贵的是回答：什么叫毛泽东思想？马克思列宁主义普遍真理与中国革命具体实践之统一的思想，就是毛泽东思想。这个定理得到全党的公认，不仅是个历史的总结，重要的还在于解决后来，去掉教条主义的束缚，去掉主观主义的思想方法，实现思想解放。中国革命很快获得胜利，这是最重要的原因、最重要的条件。

马克思列宁主义普遍真理要与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要与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统一起来，这个话，首先也是毛泽东讲的。他在《〈共产党人〉发刊词》一文中就讲了这样的意思，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同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结合得好，我们就取得成绩，结合得不好，我们就遭受挫折。在七大，经过刘少奇整理，加以公式化，在这一点上超过了王稼祥。王稼祥是第一个提出毛泽东思想这个概念的，但是把毛泽东思想概括集中加以科学地公式化，这个功劳是刘少奇的。马克思主义的普遍原理要同本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源于毛泽东自己的说法，经过刘少奇用党章报告的形式加以确立，这个影响一直到现在还是不可移易的，是任何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革命国家都必须遵守的原则。“文化大革命”期间，有那么一些人想把毛泽东思想作为各国党的指导思想，毛主席反对，还是那一条，普遍真理要和具体实践相结合。这也是毛主席参加的那次



1945年5月，刘少奇在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作《关于修改党章的报告》，在报告中对毛泽东思想加以定义、概括和规范

莫斯科会议上确定的。我们又怎么可以把毛泽东思想强加于他国呢！别国有别国的具体实际、具体情况。

把毛泽东思想加以定义、概括和规范，这是刘少奇在七大的这个报告中所作出的贡献。至于当时之所以能够作出这一贡献，当然不是由于一个人的经验，而是许多人的经验，得之于历史实践的反复证明。延安整风时，高级干部对党的历史进行两条路线的学习，很多文件摆在每个人的面前，清清楚楚。历史的检验证明，王明也好，博古也好，张闻天也好，其他人也好，在一些重大关键问题上，都不行，只有毛泽东行。当时按我的思想来讲，经过整风学习，认为中国党正确的历史，应该从井冈山算起。学习中又进一步听说，应该从大革命算起，我当时思想不通。不久发下毛泽东 1927 年 3 月写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读后疑问顿消。心想这样的报告，20 世纪 20 年代谁能写出，只有毛泽东写得出来；到了三四十年代，也还只有毛泽东才能写出更多的续篇。经过延安整风，经过对历史的学习，通过党内思想的辩论，到了这样一个时候，需要这样一个人来进行这样的概括，指明毛泽东思想是党的唯一正确的指导思想。正是刘少奇出来，适时地科学地进行了这样的概括。这也说明，刘少奇的思想感情，和党内的多数同志的思想感情是休戚与共、息息相通的，能够体会到党内的希望，能够顺理成章地做出这么一个概括，合乎党心，合乎人心。因而行之有效，经久不衰。

在这一段时期，谁也不能代替刘少奇的作用。

阐明群众路线是党的根本路线，是确立党的思想路线、政

治路线、组织路线的根本路线，这是刘少奇七大修改党章报告的另一个重要贡献。

在这个报告中，关于民主集中制问题有这样一个表述：民主基础上的集中，集中指导下的民主。以后一直沿袭下来。“文革”以后，起草关于党内生活若干准则时，胡乔木对这个问题提出异议。他认为“民主基础上的集中”是对的，对“集中指导下的民主”则表示了怀疑。后来，在胡乔木起草的文件中就没有这种提法了。“民主基础上的集中”这个提法，同毛泽东七千人大会上的提法没有什么不同。“集中指导下的民主”，他在七千人大会讲话中没提。这个说法，在现实生活中，有时被认为只按领导意见办事，这就谈不上民主了。至今，对刘少奇的党章修改报告所涉及的各种问题的表述，除“集中指导下的民主”这个表述外，还没有发生什么异议。刘少奇的这个报告，是经得起历史考验的。

（访谈日期：1998年4月22日。

吕小蓓、王玉强、宋毅军记录，朱元石整理）

邓力群著：
我为少奇同志说些话

党的第八次代表大会前后

我谈一点同《论十大关系》、中共八大有关的历史事实。这些事实在党内知道的人不多，你们可能也都不大知道。我把我知道的这些事情同你们谈一谈，有利于我们对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的研究。特别是对那些在国内外胡说八道的东西，可以有个澄清。有的人在国外的胡说八道，完全是为了向洋人乞食。嗟来之食怎么能吃？吃了就要为他人所用，就要为他人的需要胡说八道一通。这样就把自己的灵魂也出卖了，把中国人的良心都泯灭了。

不知道你们看过没有？在美国情报局的策划下，有一个跑到美国去的人，写了一本很厚的书，通篇是肮脏的谣言，对毛泽东进行了恶毒的诽谤。

这本书是这个人寓居在国外写的，在国外出版的。帝国主义反动分子把它作为宝贝，同时用英文和中文出版，西方的传媒对它大肆渲染，一炒再炒，一时搞得沸沸扬扬，以为这样就可以欺骗全世界，愚弄各国人民。这是帝国主义者对社会主义国家惯用的手法。它们瓦解苏联的手段之一，就是中伤、诬

蔑、诋毁这个国家的人民领袖。从斯大林开始，一直否定到列宁。这个国家的领袖站不住了，这个国家也就站不住了。帝国主义者要对我国实行西化和分化的图谋，他们便惯伎重演，把污水往毛主席身上泼，在中国人民和世界人民中毁损他的形象。收买这个人来做这件坏事，是他们最近精心策划的一个行动。这个人呢，他接触过的事情他造谣污蔑，他根本接触不到的事情他也无中生有，真是极尽诽谤之能事。这个人可真不知人间还有“羞耻”二字。

这个人造谣的重要内容之一，就是说我党的八次代表大会是背着毛主席开的，是违背毛主席的意见开的，是同毛主席的思想互相对立的。由此开始，到发生“文化大革命”，这个人都把它说成是毛主席与少奇同志、小平同志之间的所谓“权力斗争”。

这个人在他胡编乱造的书中像煞有介事地说：“后来毛在文化大革命期间告诉我多次——刘少奇的政治报告（指八大的政治报告）事先没有送交毛过目。那时即将任新职（党中央总书记）的邓小平要毛休息，不参加会议。”“毛说：‘我提出辞去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可是我仍然是党的主席啊。召开八大为什么事先不同我打招呼，八大的政治报告起草讨论，我没有参加，事先稿子也不给我看，说是来不及了。我又没有离开中国，有什么道理说来不及，不让我看一看呢？’”“我随同毛出席了开幕和闭幕会，并在后台听了刘少奇的政治报告。我一听到刘、邓两人的报告，就知道毛一定会大为震怒。我也非常惊骇。毛的确有理由觉得中央在压制他。刘的政治报告和邓修改

党章的报告中，赞扬集体领导路线，反对个人崇拜。邓小平进一步向党代表保证，中国绝对不会出现个人崇拜。邓修改的新党章中，不但删掉‘毛泽东思想作为党的一切工作指针’这句话，并为毛设立了荣誉主席的职位——这些都显示毛的党主席职位并非终身职，党领导要他交出权力。”“我在‘八大’会议中首次发现，毛和他的指定接班人刘少奇之间，存在着如此重大的歧异。‘八大’是毛与刘、邓两人关系的转折点。毛觉得中央领导是有意排挤他，并且想削减他的权力。”“毛往后所有的政治行动——共产党整风、大跃进和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文化大革命——全是为了推翻‘八大’所制定的总路线而做的出击。”

这个人扯出这样的弥天大谎，真是连最起码的常识都不讲了。他的书除了胡编乱造，就是连常识也不讲的胡编乱造。最近，曾经长时期在毛主席身边工作过的三个人一起写了一本书^①。这本书，是针对这个人的一派谎言写的。这本书写得很好。我认为，这本书提供的真实的历史，可以把这个人的谣言、诽谤完全澄清。书中涉及八大的问题也引用了很多材料，其中包括毛主席的许多批示，除了引用中央文献研究室所编辑的《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上的以外，还有其他很多更为丰富的东西，一看就可以把这个人的谎言戳穿。你们没有看过的话，应该找这本书来看看。不怕不识货，就怕货比货。两本书放在那里，一比较，就知道哪个是真货，哪个是假货。

关于八大问题，在他们三人写的书里面已经有的，我今天

^① 林克、徐涛、吴旭君：《历史的真实》，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版。

就不去说它了，说些他们的书里没有写的事情。这些事情也足以粉碎这个人捏造的谎言。

根据我们党的七大党章的规定，党的全国代表大会在通常情况下每三年召开一次。七大是在1945年召开的。但是七大召开后的整个形势大家都知道，很难按通常情况来三年开一次党的全国代表大会。1945年到1949年，正是我们党领导人民争取民主革命胜利的决胜阶段，“宜将剩勇追穷寇，不可沽名学霸王”，是无产阶级夺取全国政权的时刻，决不能让敌人有喘一口气的时机，犯下历史性的错误，在1948年或1949年里召开党的八大是不可想象的。1950年到1952年，新中国刚刚成立，百废待兴，百业待举，我们需要全力进行民主改革，在蒋介石国民党留下来的烂摊子上，恢复国民经济，制止通货膨胀，稳定物价，恢复和发展生产，保障人民生活。我们需要全力来捍卫这个新生的政权，要进行还未完了的局部地区的人民解放战争，要镇压反革命，镇压一切仇视这个新生政权并继续作反抗的阶级敌人，巩固人民民主专政。我们还需要全力来进行美帝国主义者强加给我们的抗美援朝的战争。所以，在这个时期，我们也没有时间来召开党的八大。但在1952年底，中央还是考虑过关于要开八大的事情，当时决定先召开一次党的全国代表会议。1953年，我们国家开始了第一个五年计划的建设工作。以后又出来一个高饶问题，中央不得不花精力来处理这个中央所极不愿意看到的有碍党的团结的问题。1954年就这样过去了。1955年3月21日到31日，在北京开了原定的党的全国代表会议，毛主席致开幕词，又作了会议的结论。在

31日作结论的讲话中，毛主席说了中央决定于1956年下半年召开党的八大的事。这是第一次说得这么具体。1955年10月，党的七届六中全会正式通过了《关于召开党的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决议》，决定要在1956年下半年召开党的八大。在下半年哪一个月开，这个决定没有作具体规定，但说了由中央政治局来定。在这个会上，除了通过《关于召开党的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决议》，还通过了《关于党的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名额和选举办法的规定》。邓小平还代表中央政治局作了《关于召开党的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决议草案的说明》。

全党这么重视召开八大的问题，怎么谈得上这个人所说，召开八大事先没有同毛泽东打招呼？整个事情的酝酿都是在毛主席的领导下进行的嘛！这个人编的是“天方夜谭”，是“一千零一夜”。相信不得！他那个时候还根本不是毛主席身边的工作人员，根本谈不上可以随便接触毛主席，可以随便同毛主席谈话，毛主席怎么可能向他大谈这么一些重大的问题？这个在那个三人写的书里作了揭露，说得很清楚。

要召开八大的问题提上了日程，怎样筹备八大的工作自然就成为中央领导层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等考虑的主要问题。七届六中全会后不到两个月，1955年12月5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中南海西楼召开座谈会，西楼会议室里济济一堂。出席者包括在京的中共中央委员、中央党政军各部门和各省市的负责人，共一百二十多人。这个会议就是布置召开八大的筹备事宜。会议由刘少奇主持。他首先传达了毛主席关于要召开八大的指示。他说，毛主席讲，我们要利用目前国际休

战时间，利用这个国际和平时期，再加上我们的努力，加快我们的发展，提早完成社会主义工业化和社会主义改造。他说，毛主席指出，八大的准备工作，中心思想是要讲反对右倾思想、反对保守主义。可以设想，如果不加快建设，农业和私营工商业未改造，工业未发展，将来一旦打起仗来，我们的困难就会更大，等等。

在传达了毛主席的重要指示之后，少奇同志接着提出要求，也就是号召吧，要全党准备八大，迎接八大，使八大开好，要使八大的准备工作和各地各部门的工作结合起来。因为根据分工，少奇同志要负责准备中央委员会向党的八大的政治报告，所以在这个会上，少奇同志也打了招呼，为起草这个报告，他准备在最近要找各部门的一些负责同志做个别谈话，请各部门的同志预先做好准备。

少奇同志抓得很紧，只隔了一天，从12月7日开始，就陆续找国家机关、中央各部委的负责同志到他那里去汇报，一个部一个部地听，每次汇报中间，少奇同志都讲了很好的意见。他是边听边记，时而插话、提问，画龙点睛地讲一些话。一个部一个部的汇报会，我和胡绳都列席了。少奇同志的这些意见，我们俩都做了记录。后来我还在人民日报社从头到尾进行过详细传达。可惜的是，在“文化大革命”前我离开北京的时候，把这些记录都销毁了，现在脑子里能记得起来的东西很少了。

少奇同志的这个调查研究，是跨年度的，从1955年的12月7日开始，一直进行到1956年3月上旬。少奇同志是下了决心的，一个部门一个部门地听汇报、讨论，连续听了三十几

一个部门负责同志的汇报。这些部门有国家建委、城建总局、一机部、二机部、三机部、农村工作部、煤炭部、电力部、地质部、石油部、建筑工程部、重工业部、国家计委、地方工业部、纺织工业部、轻工业部、手工业管理局、财政部、粮食部、商业部、全国供销合作总社、外贸部、农产品采购部、劳动部、全国总工会、铁道部、交通部、邮电部、民航局、高等教育部、教育部、卫生部、文化部和国家体委等。座谈会基本上是一个部门谈一天，个别部门也有谈上两天的，经常从白天一直开到过午夜。这样一天连着一天谈，进行七八十来天，算一个段落，然后间隔个把星期的样子，再谈七八个部门。总之，少奇同志是集中心思来进行这项调查研究工作，安排得很紧凑，搞得相当紧张。我记得第一次开始谈的是薄一波和万里，薄一波当时是国家建委主任，万里是城建总局的局长。

少奇同志的这个听汇报将近完成的时候，毛主席从外地视察回到北京。毛主席听一波同志讲起刘少奇正在召集中央各部委逐个听取汇报的事，说这个方法很好啊，请一波同志帮助他也来组织这样的汇报。于是，毛主席也一连听了三十多个单位的汇报。开始比少奇同志晚一点，结束也比少奇同志晚一点，是从1956年的2月中旬（14日）听起，一直听到4月下旬（22日）。在毛主席听汇报的过程中，有一些次，少奇同志也一块去听了，如林业部、国家气象局、中共中央财贸工作部、商业部、财政部、中国人民银行等单位负责人的汇报，就是少奇同志到毛主席那边一起听的。这充分说明毛主席、少奇同志他们的工作是很协调的。少奇同志是认真贯彻执行毛主席的交代和

指示的，毛主席也是认真吸取少奇同志的工作方法的，目的都是要调查清楚中国的实际情况，探求一条符合中国实际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写出一个好的八大的政治报告来。

其间，具体的月份我记不准了，可能就是1956年一二月间的事，少奇同志对我们说，中央要准备召开八大，要为八大准备一个政治报告。少奇同志指定陈伯达为他起草。同时找了几个助手，帮助陈伯达收集意见，准备材料。我算其中一个。

我们的工作便加紧进行起来。应该说，陈伯达在起草报告中间是用了心思的，花了一个多月时间，搞出了一个初稿，马上送给少奇同志审阅。少奇同志看了以后不满意，他把这个稿子送给胡乔木看，问乔木同志对这个稿子有什么意见。乔木认真地看了，回头向少奇同志汇报，说陈伯达起草的报告不像一个党中央向八次代表大会所做的政治报告，倒像一个学术报告。陈伯达听了当然不是味，很生气。少奇同志与乔木有同感，认为乔木同志的评价是正确的。少奇同志就说：“那好啊，他写的不行，你来搞一个。”少奇同志就转过来要胡乔木负责起草，而且说他历来的方法就是这样，他自己写文章总是找大家来提意见，各种反对的意见、不赞成的意见都可以讲，他叫人帮助他起草的东西，总是七改八改，改到大家没有意见为止。

乔木接受了任务，确实认真地起草起来了。在起草的过程中，有这么一件事，我认为特别重要。有一天晚上，少奇同志找我们几个，包括陈伯达在内，到他住的甲楼去。当时恐怕已快10点钟了。去了以后，看得出来，少奇同志非常兴奋。

他说他刚刚从毛主席那里开会回来，毛主席讲了很好的意见，同我们起草八大的报告关系密切，所以把你们找来。毛主席讲了什么呢，他听了三十几个部门的汇报、作了两个多月调查以后，归纳起来，提出了十个问题，就是十个关系。刘少奇一一地给我们作了介绍。他说，有了毛主席的这个讲话，我们这个报告的主调就有了。起草八大的报告要以毛主席讲的这个十大关系为纲，这样把八大报告和十大关系就连为一体了。这点，给我的印象特别深刻，看少奇同志当时是显得那样的高兴，那样的兴奋，因为可以说是这一下子找到了门道，找到了起草八大的政治报告的路子了。原来正发愁，要陈伯达起草，陈伯达写了个像学术报告那样的报告，再要胡乔木起草，胡乔木的还没有搞出来，搞出来成不成也不知道，怎么办？少奇同志心里还不踏实。现在有了毛主席的这个讲话，一下子豁然开朗，给我们找到路子了，事情好办了。所以那些谣言讲，八大和毛主席想的完全是两回事，是什么对着干的，那毫无根据，完全是在胡说八道。

少奇同志讲的毛主席关于十大关系的谈话，是毛主席在他们几个常委中间的谈话。后来不是开了个政治局扩大会，正式讲十大关系吗？少奇同志给我们讲的这次是在毛主席正式讲十大关系之前，早多少天，具体的日子我也记不住了，大概在4月份里吧。毛主席正式做《论十大关系》的讲话，那次政治局扩大会是在4月25日开的。《论十大关系》是我做的笔记。毛主席的这个讲话，以苏联在各方面的经验作为鉴戒，初步总结了我国那几年社会主义建设的经验，提出了探索适合我国国情

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任务。他说，特别值得注意的是，最近苏联方面暴露了他们在建设社会主义过程中的一些缺点和错误，他们走过的弯路，你还想走？过去我们就是鉴于他们的经验教训，少走了一些弯路，现在当然更要引以为戒。我们的方针是，一切民族、一切国家的长处都要学，无论政治、经济、科学、技术、文学、艺术，一切真正好的东西都可以学，但是必须有分析有批判地学，不能盲目地学，不能一切照抄，机械搬运。人家的短处、缺点当然不能去学。对苏联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经验，都应采取这样的态度。他批评说，过去我们有些人把人家的短处也去学。他举了一个那种机械搬用、照抄到家的例子，过去有人因为苏联是设电影部、文化局的，我们则是设文化部、电影局的，就说我们犯了原则错误。但是他们没有料到，苏联不久也改设文化部，和我们一样了。所以毛主席批评他们是风派，毫无主见。毛主席审时度势、独具匠心地指出，要正确地处理重工业与农业、轻工业的关系，沿海工业和内地工业的关系，经济建设和国防建设的关系，国家、生产单位和生产者个人的关系，中央和地方的关系，汉族和少数民族的关系，党和非党的关系，革命和反革命的关系，是非关系，中国和外国关系。毛主席提出这十大关系的问题，其主旨都是围绕着一个基本方针，就是要把国内外一切积极因素调动起来，为社会主义事业服务，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强大的社会主义国家。

毛主席的这个讲话当然非常高明，无怪刘少奇那样心悦诚服，那样兴高采烈，要求胡乔木要以这个讲话为纲来起草八大

的政治报告。

八大的报告要以毛主席讲的十大关系为纲，这个主意定了以后，胡乔木的起草就容易多了，好办多了。当然起草和修改八大政治报告绝不是乔木一个人的事，是全党的事，是全党在进行的事。

据知，1956年4月21日，小平同志草拟了两个起草班子的名单，即起草八大政治报告和起草修改党章报告的名单，经周恩来、朱德、彭德怀、彭真、康生等审阅后，少奇同志在这两个名单上批示：如政治局同意，即照此办理，交邓小平处理。5月12日，中央政治局会议批准了这两个起草班子的名单。政治报告起草班子的成员正式定下来的有王稼祥、刘少奇、陈云、陈伯达、胡乔木、陆定一、邓小平。反正，胡乔木一直负责这个八大政治报告的起草工作。最难办的是十大关系的排列，哪个在前，哪个在后，怎么样调整。毛主席讲的，有他自己的思路，先讲经济关系。完全用主席的思路来写政治报告也不一定恰当，所以哪个在前，哪个在后，讲完哪个矛盾再讲哪个矛盾，胡乔木很费周折。

不少人说毛主席早就要把刘少奇搞倒，或者刘少奇早就对毛主席有这个意见、那个意见。事实完全不是这样。从我经历的这些事情看，他们两个之间，整个中央集体之间，可以说是互相学习，互相尊重的。毛主席看到了少奇同志做调查就跟着做调查，还说这个办法好，我也学嘛。毛主席讲了十大关系以后，少奇同志又觉得毛主席讲得好，尊重毛主席的意见，要按主席的意见来写报告。他们之间的关系非常和谐，非常密切，

整个中央领导集体在八大开会之前、之后，都是紧密团结的。当然这并不是说，就没有不同意见的讨论。

接下来到了1956年6月间，少奇同志主持政治局会议，讨论中宣部陆定一同志要宣传处王宗一同志起草的一篇《人民日报》社论，那次会议我没参加。这个社论批评了冒进。在社论中间，片断引用了《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序言的一段话。那个序言里有这么一个比较完整的思想：人们的思想必须适应已经变化了的情况。当然，任何人不可以无根据地胡思乱想，不可以超越客观情况所许可的条件去计划自己的行动，不要勉强地去做那些实在做不到的事情。但是现在的问题，还是右倾保守思想在许多方面作怪，使许多方面的工作不能适应客观情况的发展。现在的问题是经过努力本来可以做到的事情，却有很多人认为做不到。因此，不断地批判那些确实存在的右倾保守思想，就有完全的必要了。序言中这段话两方面都照顾到了。毛主席的序言中还讲，现在农村反右倾保守的问题解决了，接下来要解决工业建设中间如何反右倾保守。而这个社论呢，没引毛主席序言中反对右倾保守的话，只引了“反冒进”意思的话。在这个问题上看来少奇同志和毛主席之间没有很好地商量。少奇同志主持这个会议，把社论定稿了送给毛主席看，毛主席大概知道了这个社论的内容，说不看了。这样就在6月20日的《人民日报》上发表了。毛主席很不满意。据吴冷西同志回忆，1958年1月开南宁会议，吴冷西的名字放在列席会议的人的第一位。会议一开始就把这篇社论当作靶子，系统地批，严厉地批，一段一段地批，而且毛主席讲，引用他的

话，片面地各取所需。

我说一下这件事，因为同下面的事还有一些关系，对这些事情的关系应该有个正确的判断，比较合乎实际的判断。

1956年7月，八大政治报告的第一稿起草出来了。7月下旬、8月中旬中央领导去北戴河后，毛主席亲自找有关的同志谈了一次对乔木稿子的意见。具体讲了一些什么，我现在实在记不清了。隔了几天，少奇同志又找起草的人到他别墅去开会，说一波同志对报告有一个意见，请他来讲讲，然后你们考虑怎么吸收他的意见，把报告修改好。一波同志来了以后，说这个报告里只反右倾保守，不反急躁冒进，是片面的，应该加上既反右倾保守，又反急躁冒进。我们吸取一波同志的意见加上了，通过的时候也是这两方面都照顾到了。这一次报告里面加了反急躁冒进，毛主席没讲话，没有反对。

到了1957年，周总理、胡乔木、彭真到杭州去，毛主席对他们讲，1956年反急躁冒进，他的心情受到压抑，整个一年心情不舒畅。到了1957年，毛主席把他的意见说出来了，他不赞成反冒进。这个时候要去莫斯科参加第一次莫斯科会议（莫斯科会议召开于1957年11月中旬），恰好《人民日报》起草了一篇社论，题目是《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这个提法在写农业“四十条”的时候就提出来了。毛主席把稿子带到了莫斯科，修改时在题目上加了四个字。原来他加的是“鼓起干劲”四个字。周谷城认为“鼓起干劲”不响亮，建议把“起”字改成“足”字。从莫斯科回来后，《人民日报》发表了这篇社论：《鼓足干劲，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发表时已是

1958年初。后来召开的南宁会议，就把1956年6月间“反冒进”那篇社论批了一通。听说当时没点少奇同志的名，被批评得最尖锐的一个是周总理，一个是陈云。

对于这件事情，我也好一阵子想不明白，为什么1956年6月间提出“反冒进”，他心情不舒畅；八大的政治报告既反右倾又“反冒进”，加进“反冒进”的内容，他没有表示不同意，而到了南宁会议时候，专门就“反冒进”提出尖锐的批评。这样一件事情，究竟怎样理解？想来想去，我想作为政治报告来讲，它是要管一个历史时期的，你不能只讲反右倾，从头到尾一直反到底。整个历史时期中间，可能有这样的毛病、那样的毛病，作为一个总报告，应该全面都考虑到。实现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的过程中，总的来讲，两种倾向都要反对，所以总的政治报告反右、反左都应该说到。至于哪个时候主要是反什么，和总报告应加以区别。情况在变，党内的思想认识也在变，两种倾向总的都要反，一个时候主要反什么，重点反什么，应该是不同的，要根据一个时候的主要倾向是什么来决定。我想这样想，比较可以想得通。

批评“反冒进”是八大召开以后的事了。回过头来讲，八大的政治报告几经修改，才最后定稿。在修改的过程中，毛主席书面的批示就有十几、二十来个，口头的，我知道的重要意见就有两次。一次是责成外交部专门就政治报告的国际问题和外交政策、路线认真地做研究，提出积极的意见。后来外交部就这个部分做了很详细的研究，由张闻天同志负责，提出了他们的批评和修改意见，谈了两三个钟头。还有一次就是要统战

部把党内外的关系研究一下，包括统一战线中间的政策、路线、方针，后来李维汉同志也就这个部分提了很好的意见。这样，根据毛主席的批示，根据外交部、统战部及其他部委的意见，反复修改，一直到八大开会前夕才最后定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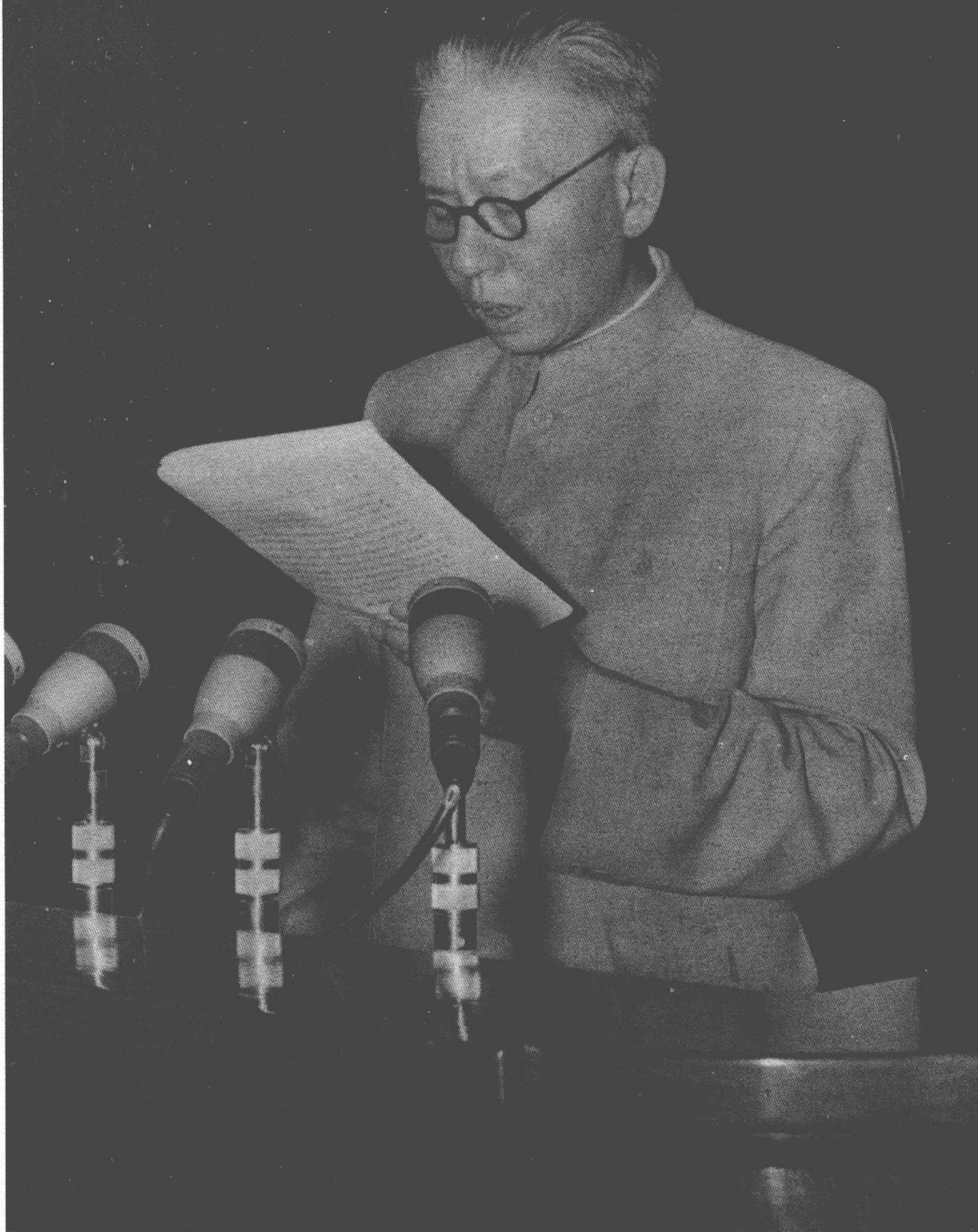
起草小组的人日夜加班，就在中南海的西楼。到最后阶段，改一段送给少奇同志一段。

记得一天晚上，11点钟左右，少奇同志找起草小组的同志到他住的地方去谈，这时他已经进到卧室去了。他说，对党的领导部分加了一段意见，就是讲毛主席的正确在大革命时候就证明了。对蒋介石搞的中山舰事件、整理党务案，毛主席一开始就主张进行抵制和反抗，同国民党作斗争。陈独秀不赞成，使蒋介石的阴谋一步步得逞，实现了他对国民党的直接控制，把共产党从蒋直属的部队中排挤出去。到后来秋收起义，井冈山上插红旗，中央苏区的建立，都证明毛主席的正确。可是尽管毛主席是正确的，如果党内的多数不认识他的正确，不选择他作为我们党的领袖，还是不行。毛主席的路线是对的，临时中央没去苏区以前，第一、二、三次反“围剿”，军队干部、地方干部都在毛主席的领导下，执行他的路线取得了胜利。临时中央在上海站不住脚，到了中央苏区，在第四次反“围剿”时，把毛主席从领导中排挤出去了，但执行的军事战略战术还是他的路线，所以第四次反“围剿”还是取得了胜利。第五次反“围剿”就一反毛主席的路线，执行的完全是博古、李德的那一套，结果失败了。经过失败的比较，不但原来跟着毛主席一起干的人更进一步认识了毛主席的正确，连反对过毛主席的

人也认识到毛主席正确了，这才开成遵义会议。由此证明有毛主席，有毛主席的正确还不够，还得要有全党的正确选择。少奇同志说他在政治报告的党的领导中，把这个意思加了一段文字，要有全党的觉悟，特别是全党重要干部的觉悟，到了遵义会议才解决这个问题。由这一点也足以证明少奇同志在整个八大期间是信服毛主席的，是衷心地拥护毛主席的。他和毛主席在感情上、思想上不存在什么分歧。他这段话后来经过起草小组文字上的提炼，写定在八大的政治报告中：“从我们党的历史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党的经验多少和党的领导人选对于党是否犯错误有重要的关系，但是关系更重要的，是各个时期广大党员首先是党的高级干部是否善于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去总结斗争中的经验，坚持真理，修正错误。这是考验党的干部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觉悟水平高低的主要标志。”^①这是少奇同志特意加上去的。他说他一直在想这个问题，这个问题没想好，想睡也睡不着。这个问题想好了，写出稿子来了，就可以睡觉了。少奇同志加上的这段话，可以说是毛主席、刘少奇之间关系的实际情况的文字证明。整个八大的政治报告和十大关系证明了中央领导集体的关系是团结一致的，互相尊重，互相学习，紧密团结的。

党的八大在1956年9月15日至27日在北京召开。会议接近结束的时候，要通过政治报告，同时要通过一个决议。起草小组仍然集中在中南海西楼，分工负责，连夜加班，政治部

^①《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一九四九——一九六五）》第9册，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第91页。



1956年9月，刘少奇在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上作政治报告

分由胡乔木负责，经济部分由陈伯达负责。胡乔木的稿子出来了，然后由陈伯达统管，一边看一边改，一边读一边改。胡乔木起草的部分有这样一个提法：我们的生产关系经过三大改造是先进的，可是我们的生产力还是落后的。先进的生产关系和落后的生产力之间存在着矛盾，因此要发展生产力。对于胡乔木的这个表述，大家觉得很好，陈伯达也认为好，而且说这个提法和列宁一篇文章的提法是完全一致的。列宁有篇文章中有个提法，叫“先进的亚洲，落后的欧洲”。稿子定了以后，还没来得及打印，就由陈伯达、胡乔木把修改稿送到毛主席那里，请他审阅。他那时正好在游泳池，还没有睡觉。毛主席看后表示同意，这样就在第二天的会上通过了。我最近看到一个材料，大意是：好像过了两个星期，毛主席表示这个提法恐怕不妥当吧。陈伯达讲列宁的文章中有这样一个说法。毛主席说，你们讲列宁的文章和我们讲中国的情况不是一回事。俄国同西欧来比，生产关系先进，生产力落后，这是个实际情况。你们按照这个说法来说我们国内的矛盾是先进的生产关系和落后的生产力之间的矛盾，同列宁的原意就不一致了嘛。

大概到了1957年的二三月间，受到波匈事件的影响，国内城乡发生了闹事的乱子。毛主席提出三大改造完成以后，阶级的矛盾并没有完全消灭，仍然有阶级矛盾的问题。同时他说到在三大改造的高潮中，资本家是敲锣打鼓拥护公私合营，在这样的情况下，阶级的关系、阶级的矛盾在我们头脑中的反映，认为已经解决了。这也是可以理解的，主观决定于客观嘛。到了1957年2月召开的一次会议上毛主席讲了人民内部

矛盾问题。1957年6月公开发表的时候，根据反右斗争的经验，做了重大原则的修正。

毛主席这次讲话以后的第二天，少奇同志要到南方去视察，我们几个人随行。在火车上，他把毛主席的讲话记录给我们传阅。我的印象是说经过三大改造，阶级问题解决了，阶级矛盾解决了，突出的问题是人民内部矛盾。可以说，不但大家都认为当时的阶级关系问题解决了，就连毛主席关于人民内部矛盾的讲话里面，也认为阶级问题基本解决了。少奇同志根据毛主席讲话的精神，在湖南和上海也讲了现在人民内部矛盾已成为主要矛盾的问题。对人民内部矛盾大量地表现在什么问题上，如何来正确处理这些人民内部矛盾，少奇同志也有很多阐发。这也表明少奇同志是紧随毛主席的思想的。

以上是有关八大本身的一些历史事实，就这个机会向你们把我所知道的、经历过的说一说。了解了这些情况，你们研究这个题目，就可以放在更准确的历史事实基础上来评论。

现在一般的说法：八大会议对国内主要矛盾的分析是正确的，后来毛主席离开了八大的决议，重新认为阶级矛盾是主要的。仅仅用这一句话没有反映历史的真实情况，我认为这个问题需要细致地进行研究，最重要的就是把这个历史的情况搞得清楚一些、准确一些。这里面很多的事情需要从头到尾一件件地理清楚。理清楚了以后，对于1958年、1959年以至1962年这中间的许多问题才能说得合乎实际，正确地加以表述。因为我现在没有重新看这些材料，我也说不准，但作为研究这个问题来讲，我看还需要下功夫，用一句话不能把问题说清楚。

再补充一个情况。这个人还有其他的人所制造的八大会议上刘少奇、邓小平反毛泽东这样一些谎言，除了刚才说的外，还有一条，说八大不提毛泽东思想是一个标志，是因为刘、邓反对毛泽东思想、反对毛泽东。

在三个同志所写的书里面就这个问题也提供了很丰富的材料、证明，雄辩地驳斥了李这个人的谎言，给了它一个兜底翻。

就我所记得的，解放初期，具体哪一年我记不准了，是毛主席自己首先提出不用毛泽东思想，改为学习毛泽东著作，这是在八大以前好几年就提出来的。这里面有一个什么样的背景呢？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我们陆陆续续出去参加国际和平运动，回来的人反映：到了欧洲，到了东欧，特别是到了苏联，听到这么一种议论说中国革命的胜利是铁托式的胜利。实际上这些问题产生在解放前。毛主席到1956年在《论十大关系》时再次谈到这件事，说斯大林对中国做了一些错事：“解放战争时期，先是不准革命，说是如果打内战，中华民族有毁灭的危险。仗打起来，对我们半信半疑。仗打胜了，又怀疑我们是铁托式的胜利。”

听了从东欧、苏联回来的人的反映以后，（毛泽东）感到有必要适应当时的情况，对这个问题做若干修改。我们知道，斯大林一直到了抗美援朝，他才相信中国的胜利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胜利，中国党不是铁托式的党，毛泽东不是铁托。考虑到整个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全局，毛主席在当时主动提出这样一种改变是有他客观的历史根据的。由此我还想起1956年1月知识分子会议上，毛主席再一次不赞成把毛泽东思想改为毛

泽东主义，他说：“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总店在苏联，我们是分店；主干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我们只是枝叶。”把毛泽东思想的提法哪一年有什么文件通知及什么样的要求，在《历史的真实》里头都列举了很多。不知同志们看了这本书没有？要尽可能想办法把这本书找来看一下，搞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的人，这本书不能不读。

（访谈时间：1996年10月。朱元石记录、整理）

邓力群著：
我为少奇同志说些话

从“反冒进”到庐山会议

在“反冒进”问题上，刘少奇支持了周恩来

1956年和1957年，作为国家第一个五年计划的后两年，是很重要的两年。1956年计划的大多数指标完成或超额完成，实际上是五年计划四年完成。到1957年，超额完成五年计划。1957年的总量比1956年高，但经过调整，速度比1956年低一点，总的说五年实现的平均增长速度在20%以上。这是很了不起的，相当喜人的。但一般不了解，当时我们也不知道，那时在中央内部、政治局内部，也可以说常委内部，曾发生过一场争论。

1956年执行过程中发现，基本建设搞得太多了。周总理搞了一些调查，提出1956年的计划要调整，过多的基本建设项目要压下来。这是一个方面的意见。但是毛主席持相反意见，认为不但不能压，还要增加。在1956年4月下旬召开的颐年堂政治局会议上，争论相当激烈。

据我后来所知，少奇是支持总理意见的。毛主席要增加基

本建设的意见，在多数人中间通不过。这种情况，作为党内生活来讲，本来是很正常的现象。但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毛主席的意见成为少数一方的意见，在多数人中间通不过，这是罕见的。这对个性特别强的毛主席来说，不仅因为认为自己的意见是对的，要引起不快，而且对这种场面的出现要受不了。这样毛主席生气了，宣布散会。散会以后，一转头就到南方去了。现在来看，平心而论，周总理、少奇同志当时考虑也有所不周，应该多做一点缓和的工作。作为少奇来讲，从中多做一点转圜工作不是不可能的。周总理当时倒是亲自去找过毛主席，但周总理直话直说：“我作为总理，从良心上不能同意这个意见”（指毛泽东提出的要追加1956年基建预算的意见）。毛主席很生气，但是在总理面前当时大概还没有表现出来。周恩来和刘少奇，都没有及时觉察到毛主席为什么在会后不久就离开了北京。

1956年6月10日，国务院把经过调整以后的1956年的年度计划提交政治局讨论。这个报告的全称是《关于一九五五年国家决算和一九五六年预算的报告（初稿）》。这个会我列席参加了。同时提交会上的还附有一个由中央宣传部起草的《人民日报》社论，是中宣部宣传处的王宗一起草的，也经过刘少奇、周恩来、胡乔木等修改。意思是：过去几个月来一直反右，现在已经出现冒进，因此在反右的同时也要反冒进。而最初，要中宣部就我国经济发展要实行既反保守又反冒进、坚持在综合平衡中稳步前进的方针，代《人民日报》写一篇社论的建议，是少奇同志提出来的。

后来也是听说，把社论送给毛主席审阅。现在知道，社论是刘少奇在审阅修改后送毛主席的，并写了“主席审阅后交乔木办”。毛主席批了三个字——“不看了”。联系起来，可知道毛主席当时是怎样的一种情绪。

6月10日的政治局会议在少奇同志的主持下，基本通过了报告，也通过了社论。并指定胡乔木根据会议讨论中的意见对报告加以修改。修改后的报告，加重了“反冒进”的分量。它提出：“在执行一九五六年国家预算过程中，必须在反对保守主义的时候，同时反对急躁冒进倾向。”这些都非常明显地表明，少奇同志是完全支持总理意见的。当时参加政治局会议的，还有周恩来、陈云、彭德怀、彭真、林伯渠、董必武、张闻天、康生、邓小平等。

报告在6月15日至30日召开的一届三次全国人代会上获得通过。在人代会召开期间，6月20日，《人民日报》社论发表。

随后，7月中旬到8月吧，到北戴河去开会，我们这些帮助起草八大文件的人也一起到了北戴河。接受薄一波同志的意见，写上了不但要反右也要反“左”，要反保守也要“反冒进”。对八大报告的这个修改，表明少奇同志又一次积极地支持了总理的意见。

八大会议在1956年9月里开过，少奇同志在10月主持召开的一次人大常委会上，在高教的招生问题上，他又讲了既不要右倾保守，也不要急躁冒进。认为，训练干部，一个要看可能，一个要看需要，数量和质量要结合起来，增加招生人数一定要有限度，要逐步增加。从这点上也可看出，少奇同志支持

总理的意见，是看到了各方面的问题的，并在各方面认真加以贯彻的。

接着就开八大。大家以为对总理的不同意见，或者毛主席的坚持增加基本建设投资的意见，都成为过去的事了。当时都是这样子看。事实上，八大的准备和召开，中央领导层中间是紧密配合的，刘少奇和毛主席在八大报告的起草修改中合作得非常好。

1957年9月，在北京召开八届三中全会，我也列席参加了。在这个会上，毛主席虽然没有点名，但是第一次公开地、尖锐地批评了“反冒进”问题。他在会议最后一天所作的《做革命的促进派》讲话中，认为“反冒进”“扫掉了多、快、好、省”，“扫掉了农业发展纲要四十条”，“扫掉了促进委员会”。表示了他对“反冒进”的不满。尽管如此，与会的大多数人还是不清楚和没有意识到毛泽东提出问题的严重性。

这年11月，毛主席到莫斯科参加十月社会主义革命40周年庆典，参加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受会议和苏联人造卫星上天的鼓舞，毛主席提出东风压倒西风、超英赶美口号，认为只要依靠群众、发动群众，国内的生产一定会出现大跃进形势。他还没有回国，从莫斯科捎回信息，明确说“反冒进”不要提了。毛主席回国后，在1958年初召开了杭州会议，紧接着在1月中旬召开了南宁会议，都开得非常紧张。据说南宁会议期间，毛主席还在一个晚上约了周恩来、刘少奇两人谈话，时间很长，谈到深夜。在会上毛主席点名批评了周恩来和陈云，没有点名批评刘少奇。

会下面，有人打听消息，找到毛主席的秘书田家英，问：我们党中央是不是有人反对毛主席的个人崇拜？田家英回答得好，他说：没有听到这种说法。也没有感到有哪个人要反对什么毛主席的个人崇拜。

对毛泽东的“正处”讲话，刘少奇由衷喜悦

1957年2月，毛主席在一次会议上讲了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2月18日，少奇同志通知我和有关的同志，乘火车，随他去南方做调查研究。随行的有五个人：中央办公厅研究室我一个，农村工作部两个，团中央一个，全国总工会一个。

那天晚上，吃过晚饭上了火车。不一会儿，少奇同志来了，拿来一个根据毛主席讲话记录整理的摘要，复写的，大概有十几页的样子。少奇同志坐下来后，非常兴奋。他说：为什么找你们来呀？毛主席做了个报告，可重要呢。毛主席讲：我们国内阶级斗争解决了没有？已经基本解决了。阶级矛盾解决了没有？已经基本解决了。那么现在还有没有矛盾？有矛盾，在我们面前还存在着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敌我之间的矛盾和人民内部的矛盾，但大量存在的是人民内部的矛盾。这次叫你们来，就是去调查研究这个问题。这是毛主席出的大题目，大量存在的人民内部矛盾的情况怎么样？有些什么问题？群众是什么意见？应该怎样解决？

据我接触，少奇同志对毛主席就重大问题所发表的意见，

一直很重视，很拥护。过去我说过的，毛主席提出“十大关系”问题，少奇同志非常高兴。毛主席提出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问题，他也是抱着同样的感情，同样的心情，由衷喜悦。我看到，好像毛主席讲了这个问题以后，开了脑筋。他要好好领会，好好研究执行。作为一个新的课题应该好好地调查研究。

毛主席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问题的讲话，在根据录音整理出来的稿子上，在谈到社会主义改造完成以后的社会矛盾时，确实讲过阶级问题、阶级矛盾问题已经基本解决了。这段话，同后来正式发表的大不一样。

少奇同志外出调查第一站到保定。进行了分工，我和几个同志了解农村情况。少奇同志领几个人，在市里召开工人的座谈会、职工的座谈会、学生的座谈会、青年的座谈会，当然首先都听了当地党委的汇报。

我和农村工作部的同志到满城一个村一个村地看，进行实地调查。那时候，正兴小社并大社。老百姓反映：社太大了，去社主任那里还得买火车票，走一两站路呢。最不满意的，后来叫平调，当时叫统一分配，大队范围内，好多个生产队，统一分配。一个大队里，有的地好，有的地赖；有的有灌溉条件，有的没灌溉条件；有的地多，有的地少，反正各种各样的差别很多。因此，各个生产队的亩产高低不一样，收获多少就很不一样。但一年下来以后是大队统一分配，把好的生产队的粮食一车一车往差的队拉。农民跟我们讲，每拉一车就揪心，但又不敢反对，心里难受得没法忍受。在这里我们了解到了这样一种矛盾，大队内部分配的矛盾。

我们到县里做调查，同县里的同志开座谈会。他们给我们讲了一个意见：过去单干，自己干自己的，也要有民主，但即使民主少一点，对农民的生产、生活影响不大；现在搞集体了，每家每户的事情与集体密切相关，领导干部如果不注意民主，事情非坏不可。在这里我们了解到了又一种矛盾，集体事业发展了，领导与群众之间的矛盾也随着发展了，发扬民主的问题更重要了。

回来向少奇同志汇报，他非常重视这些意见。说：这就叫人民内部矛盾啊。合作化以后，集体内部，集体和集体之间，集体和上级之间，群众和领导之间，人民内部有矛盾，从你们的反映中间就可以看出来。这些问题需要我们认真地对待，很好地解决。

我们又去石家庄，组织工人、学生座谈。下火车去开会，去调查，回来在火车上吃饭、睡觉，不打搅地方。这是毛主席的办法，也是少奇同志的办法。

原来石家庄没有纺织厂，建了纺织厂后，从天津、上海抽调了一些纺织女工作为骨干来带班。有一次调查回来在车上聊天，少奇同志说：现在确实是新社会了，三大改造完成了，工人农民自己做主了。你看座谈会里边，这些上海来的、天津来的纺织姑娘提了个意见，她们说：让我们到石家庄来带班，我们赞成，但是石家庄的裁缝给我们做衣服不合身，能不能也从上海调些裁缝来？还有些人讲，石家庄地方偏僻，这个球队看不到，那个球队看不到，能不能组织一些著名球队轮流到全国的重要城市比赛？生产发展了，人民的生活好了，他们的生活

质量和文化生活也应有相应的提高，人们开始关心自己的生活质量，包括衣装服式和文化生活，而感到了这方面的不足，这也是一个矛盾啊。从大城市到小城市，这里边自然也存在这种生活的差别。这些都是人民内部矛盾的反映。少奇同志听到这些要求，不仅认为应当给予关心和解决，而且非常高兴，说这是新社会的工人，新社会的妇女啊！

还听到煤矿工人的反映。有个煤矿实行井上、井下工人差别工资，井下工人的工资也根据劳动好坏而有所差别，干得最棒的井下工人的工资一个月能超过400元。少奇同志听到这个情况，特别高兴。为什么？一、这种承认合理差别的分配方式，同我们在保定农村生产大队实行的那种统一分配的方式，就是完全不一样的了。二、少奇同志想到了巴黎公社的原则，他特别动感情地说：真是新社会了，真是工人当家做主呀，井下工人工资超过了国家主席呀！这是一件值得大书特书的大事，它是新社会的标志。

到了新乡，听地委汇报。这个地方有山区、半山区、平原，生产条件差别很大。一个大队内情况不一样，他们试着实行生产队包产，条件好的包产高一点，条件差的包产低一点。收获了，交给大队应该交的部分，其余都由生产队自己做主解决分配问题。少奇同志听了认为是不错的，说：这是分级管理的办法，好。一个大社不能用一个办法，情况不一，应该用多种的办法才对。

到了郑州、开封，少奇同志吩咐我，不要再去农村了解情况了，跟他一起参加学生、职工座谈会。

在保定、石家庄的座谈会上，了解到一个问题，办学情况跟不上人民要求。就是小学生毕业升不了初中，初中生毕业升不了高中。县里有初中就算好的了，乡里还没有初中。大家很有意见。这反映了学生和农民对子女的升学愿望。在郑州、开封，也都反映这个情况。学生座谈会，教员座谈会，对升学的问题众口一词。因此，这个问题在少奇同志的脑子里就突出出来了。要求满足升学的愿望，这本来也是合理的。但当时的财力还不可能办那么多初中、高中，解决这个人民内部矛盾还力不从心，现在还没有条件实行普及中学教育，不可能完全满足人们的升学愿望。怎么办？应该还要考虑矛盾的主要方面，要从实际出发。一方面固然要想方设法扩大办学。一方面，刘少奇就提出，要说服那些毕业升不了学的学生参加劳动，不能只往升学的一条道路上引。从郑州到武汉，他一直在研究着如何解决这个问题，翻来覆去地说。当时，小学生、中学生的思想状况，普遍看不起劳动，认为劳动没有出息，特别是农业劳动，希望离开土地，离开乡村。这是受了旧社会遗留下来的思想的影响。在座谈会上，少奇同志发言，循循善诱，启发别人思考，也跟别人商量。他认为，要解决好这个问题，首先要解决好怎样看待劳动的问题，要说服升不了学的小学生、中学生转变观念，自愿地参加劳动生产。而在当时，主要是参加农业生产劳动，农村中有着广阔的劳动天地。在新社会里，不应该看不起劳动，应该尊重劳动，要把参加劳动看成是自己应尽的义务，认为是光荣的。

到了武汉，也开了这样的一些座谈会，讨论这方面的问

题，发表这方面的意见。他前后讲了两三次后，叫我把它整理成一篇东西，作为《人民日报》社论发表。

发表前，还有几次修改。在武汉的东湖住了一个星期，稿子写出来了。在东湖，征求省、市委同志的意见，做了一次修改。到了长沙，继续开座谈会，听了少奇同志再一次讲话，又做了一次大的修改。到广州，把稿子给少奇同志看过，并也征求了省、市委同志的意见，又做了些修改，寄到北京，在4月8日的《人民日报》上作为一个全国性的教育问题发表了。题目是《关于中小学毕业生参加农业生产问题》。

这篇关于中小学生学习参加劳动生产的社论，的确是根据当时的情况、提出的问题，发表了有的放矢的意见，反映了刘少奇经过深思熟虑的真知灼见。它首先说明解放以后我国的教育事业有了很大的发展，但是由于我国各种条件的限制，现在还没有可能实行普及中学教育。不能说因为今年有许多中小学毕业生不能升学，就说教育工作方面犯了什么错误，就责备政府今年的教育计划订得过低。今年高中毕业生大部分升学、小部分不升学，初中和高小毕业生小部分升学、大部分不升学的情况是正常的现象。情况的变化表明我国的教育事业已经开始转入比较正常的状态。我们今后的任务是首先逐步普及小学教育，使学龄儿童全部入学。所以，应届的毕业生、教师、家长，都应当有升学和不能升学的两种打算。不要把不能升学看作是什么“不得了”、“不能见人”的事情。对于不能升学的学生，不应当有任何歧视，而应当积极安排他们的出路。采用城乡人民集体办学等办法，再办一些小学、中学，或者采用自学小组和

实习班等办法，组织学生自学为日后参加生产劳动或升学准备条件，这是一种安排。但是这究竟只能解决少数人的问题，因此最主要的办法还是就业。而就国家机关、事业机关和企业单位现在都在精简机构、调整人员等情况，就全国说来，最能容纳人的地方是农村，从事农业是今后安排中小学毕业生的主要方向、主要途径。然后就说明劳动光荣，劳动并非“丢人”、“没出息”，不能把劳动和劳动者分成等级，不能认为脑力劳动比体力劳动高一等，什么是吃亏和不吃亏，什么是“傻子”和“聪明人”等的种种道理。少奇同志的这篇讲话，对当时解决全国普遍存在的升学矛盾是起了很好的作用的，也是及时的。也可以说，他在运用毛主席的“正处”理论方面的立竿见影的一次成功的实践。这篇社论，受到了毛主席的表扬。毛主席说，少奇同志那个中小学生学习劳动生产的东西写得很好，人家都说长文章不愿意看，这篇文章很长，可是还愿意看。这是毛主席在广州修改定稿八大二次会议报告的会议上讲的。那次会议少奇去了，我也去了。

要求转变小学生、中学生以至于所有学生的观念，这是对的。但是还应看到，少奇同志在这个问题上的想法比一般人想得更深一些，更远一些。应该乐于参加劳动，可是劳动人民终究也有一个要学习、增长知识的问题。作为社会主义国家的劳动人民，他们要求升学是合理的，因此国家和党有责任找到一种办法，逐步地使劳动人民在劳动过程中间进行学习，提高自己的知识水平、科技水平。少奇同志还提出，在农村，除了正规的中小学以外，可不可以办别的一种形式的学校？

后来在江苏，发现办农业中学的形式，一边参加劳动，一边学习。少奇同志认为很好，对他是一个启发。他感到，农村劳动力多，都到城市里去不可能，总干活不学习提高也不是个办法。所以，他提出了两种劳动制度、两种教育制度的想法。在这个问题上，他一直在探索，其中包括劳动制度的改革，分固定工、合同工等。他不满足于说服青年去参加农业劳动生产，同时也探讨一种办法，使劳动人民在劳动中也能够学习、提高，学文化、学科学、学技术。应该说，在“文革”以前，农村、工厂中业余学校的创办是有很大成绩的。少奇同志曾让胡绳同志把他的意思写过文章。他自己也向中央写过报告。1957年5月5日作为《中国青年报》社论发表的《提倡勤工俭学，开展课余劳动》这篇，就是根据他在这次调查中的几次讲话整理的。刘少奇认为，勤工俭学，有可能成为解决学生学习费用困难和普及教育的一个重要途径。后来1958年7月份，他在山东视察时，就说得更加清楚和理想化了。他说，应该使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设法逐步做到一个工厂就是一个学校，半工半读，学生是工人，工人也是学生。农村也可以这样做，拨出几亩地，办一个学校，让他们包产，学生一面生产一面学习，既是学生又是农民。用这个办法，不要很久，全国人民都能上学。

这次下去，他关注的问题不止这些。对不少问题进行了调研，写成了文章，《刘少奇选集》里就收入了其中三篇。两篇是上面说的那两篇。还有一篇是他4月27日在中共上海市委召开的党员干部会上的讲话，题目是《如何正确处理人民内

部矛盾》。少奇同志认为，人民内部的矛盾，现在是大量地表现在人民群众同领导者之间的矛盾问题上，更确切地讲，是表现在领导上的官僚主义与人民群众的矛盾这个问题上。克服了官僚主义，问题就可以解决，矛盾就可以缓和。人民内部矛盾还表现在分配问题上，解决这个问题就要坚持按劳分配的原则。少奇同志指出我们有些地方已经有等级制度的萌芽，他看到一些工厂，那里的厂长、总工程师或者党委书记住的房子是新盖的一幢幢公馆，处长又是一幢房子，科长又是一幢房子，其他干部又是一幢房子，工人宿舍是另外一幢房子，等级分得很清楚。他说，等级制度是一种封建制度，如果有这种制度开始萌芽，我看应该废除。他说，人民内部之间的矛盾激化起来就可能闹事，研究了一些地方的闹事，几乎全部是为了经济性质的切身问题。少奇同志还认为，闹事，往往是由于官僚主义。他说：“大体上都不是突然闹起来，往往是经过了好几个月，经过了半年，采取了各种办法，官僚主义者不理，解决不了问题，最后才来请愿、闹事、罢工、罢课。大部分闹事，开始只是群众讲闲话。所以劝告同志们要听闲话，群众的闲话不可不听。刚刚有了闲话，你听了，感到有问题，就去处理，这就比较好，解决了问题就可以不闹事。因此，应该允许群众提意见，提要求，派代表交涉，开会，向北京告状，出墙报，向《人民日报》写信。要允许这些事，要听闲话，就是说允许小民主。不允许小民主，势必要来个大民主。”少奇同志认为，“因为我们是全民所有制，东西是大家有份的，群众敢于讲话，有权利讲话，有权利对分配问题提出意见。这就是社会主义民

主的物质基础。”他认为领导者在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时，一定要去掉站在人民之上的错误态度，要把自己看作是人民的一分子，我们所有的领导人都是为人民服务的，是人民的公仆，是人民的勤务员，没有权利当老爷。

少奇同志从外地调查回到北京，那时中央开始准备整党。后来作了个整党的决定。整党的内容是：反对官僚主义，反对主观主义，反对宗派主义。整党的问题是毛主席提出的，它得到了少奇同志等其他中央同志的一致赞同，并且决定公开整党，希望党外人士帮助我们整党。毛主席也好，刘少奇也好，都赞成公开整党。当时，据我了解，都是从好的方面去想的，想动员党内外一起来整掉包括官僚主义在内的三个错误倾向。的确是开诚布公的，合作这么多年了，希望朋友提意见，帮助我们整掉那些毛病。当时是否预计到右派进攻？我看毛主席没这么想，少奇同志更没有这么想。

后来由于形势的变化，毛泽东关于“正处”的讲话，公开发表时有了很大的修改。

南宁会议后，刘少奇比较谨慎了

1958年1月举行的南宁会议，开得相当紧张。毛主席对周总理的批评非常尖锐，甚至说：“右派的进攻，把一些同志抛到和右派差不多的边缘，只剩了五十米。”少奇同志支持总理，主持通过的《人民日报》社论成了批判对象。毛主席虽然没有点少奇的名，但无论如何，少奇同志也是感到了很大压力

的。从1月的南宁会议到4月下旬的广州会议，据我参加会议所了解的情况来说，少奇同志采取了谨慎的态度，说话不多。1月23日南宁会议一结束，当天下午，少奇和周总理一起回了北京。会后，一些地区和部门开始提出一些不切实际的“大跃进”计划。

5月5日至23日，在北京中南海怀仁堂召开经过充分酝酿和准备的八大二次会议。

会议前，5月2日，毛泽东召集刘少奇、周恩来、陈云、邓小平、彭真、董必武、杨尚昆、胡乔木等开会商讨了有关八大二次会议的问题。然后5月3日，由刘少奇主持召开八届四中全会，讨论了中央委员会准备向八大二次会议提交的各项报告。

八大二次会议开幕是毛主席主持的。会议听取了刘少奇代表中央委员会作的工作报告。这个报告，在党的全国代表大会强调党的工作重点要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向全党正式提出由毛泽东倡议的“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后来的大会发言，都是敢想敢说的呼声。

这一段，我觉得，作为八大二次会议的报告人，少奇同志与毛主席的合作，是很好的。毛主席对少奇同志的意见很尊重，少奇同志对毛主席也很信服。报告的文字表达，当然主要是通过胡乔木、陈伯达。在制定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这个问题上，我没有感觉到毛主席同少奇同志有什么争论，有什么隔阂。少奇同志照顾了大局。

少奇同志是这样，周总理更是这样。比如说，毛主席在八大二次会议上讲了这样的话，要防止闹分裂。这引起了周总理

的警惕，在会议结束后，便提出请中央考虑他当总理适宜不适宜的问题。政治局常委开会时，大家都挽留他。毛泽东没有说挽留，也没有说不挽留。邓小平同志做的记录，写下改换总理“没有必要”。

这一段，毛主席后来说：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有个大发展，辩证法的对立统一有个大发展。其中就包括从南宁会议到成都会议再到八大二次会议，制定“两条腿走路”的总路线。不是看到片面，而是看到全面。在这个大发展的问题上，中央领导同志是合作得很好的，毛主席同少奇同志之间，毛主席同周总理之间都是这样。

从八大一次会议，到八大二次会议，一年半左右的时间，解决了什么问题？就是解决了一个制定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的问题，也就是毛主席讲的“两条腿走路”的社会主义建设的总路线，不是一条腿走路，也不是一条半腿走路，它不同于苏联搞社会主义建设，偏于重工业，轻视农业、轻工业。1956年三大改造完成以后，只是提了多快好省，没有后来这样丰富的内容。在不到两年的时间里，完成了这样一件工作。所以毛主席才说：这是马克思主义的大发展，对立统一规律的大发展。

后来的实践证明，只有“两条腿走路”的一套方针，还没有解决社会主义建设中间的一系列问题。毛主席讲：光有总路线还不够，还要有总路线所需要的具体工作路线。这就是后来搞的“工业七十条”、“高教六十条”等。1962年七千人大会以后，又证明：有了各部门的具体工作路线还不够，还要有总体的、全面的、宏观的具体工作路线。

在八大二次会议以前，南宁会议对实际工作的影响，只影响到了地方工业，中央工业还没有大的影响。我记得很清楚，在南宁会议期间，梅行的夫人聂眉初在《人民日报》上发表了一篇专论《应该发展地方工业》。这篇专论受到毛主席的高度称赞，说：所有到会的地方同志都要重视这篇专论，应该发展你们需要的、可能的地方工业。这对所谓“五小工业”的发展，确实是个很大的推动。但是对中央工业，对大中型工业，没有发生大的影响。地方上加码，加指标，加项目，没有影响到国家管的大中型企业、中央的企业。对中央工业，对大中型工业发生影响的，是八大二次会议以后的北戴河会议。

我记得八大二次会议开完以后，中央书记处召集有大区负责人参加的会议。会上，非常突出的是柯庆施，他点名将李富春的军，说：八大二次会议开了，路线已经定了，我们国家计划的指标，我们大中型工业的指标，老这样下去还行吗？你们都要按照这个精神重新部署呀！他说话的口气，我还记得很清楚，颐指气使。他这样说：“在这种事情上，你李富春如果没有新的计划，新的提法，我们没有办法向毛主席交代。”似乎他成了毛主席的代言人。

在这种气氛底下，华东提出了华东地区范围内，1958年要增产800万吨钢。

柯庆施的这种做法，刺激了李富春，刺激了薄一波，刺激了王鹤寿。这样所谓“翻一番”就出来了。为了达到“翻一番”，降低了一些质量指标，如含硫量，原来是多少，现在不要这样严格了。实际上，这样炼出来的钢是不合格的。北戴河

会议之前，所谓“翻一番”，就是这样炒起来的。计委不好不跟上，薄一波同志也不好不同意翻一番的计划。在这样的气氛下，这年夏天开了北戴河会议。可以说，北戴河会议之前，在制定总路线的过程中，还没有往下全面贯彻的时候，我们的经济发展还比较正常。北戴河会议以后，情况发生大变了。真正讲困难时期，应该讲，从北戴河会议以后就开始了。

拿农业来讲，1958年的夏收是好的，秋收也是好的。但是，几千万人上山，红薯等粮食都没有来得及收。加上大办食堂，敞开肚子吃饭，粮食丰收，但是前方吃了后方的粮。主要的毛病是两个“急”：一个急于求成，一个急于过渡。

毛主席说：再有五六年或者三四年，就可以过渡到全民所有制了。对此，他后来又讲过：有的时候想，五六年、三四年是不是时间短了？有的时候又想，五六年是不是说得时间太长了？更多的情况，他想的是：五六年、三四年说得太少了，五六年、三四年怕实现不了。思想里反反复复。

又一个情况，当时全国都在搞人民公社化，人民公社在几天之内就在全国普及。当时，最著名的有几个地区。在河北就是徐水，实行全面供给制。

后来我听传达，也看到过记录。毛主席从北戴河出来，走不多远，到了杨村，找徐水的县委书记张国忠汇报。张国忠自称实现了“全面供给制”。

毛主席在听汇报中间问了他，说：同样两个家庭，都是两个劳动力。可是人口有多有少，有的家庭六七口人，有的家庭四五口人。按照你的全面供给制，很明显，人口多的得到的就

多，人口少的得到的就少。毛主席提出了怀疑。说：这样一种全面供给制，对于有劳动力的人的积极性，是有好的作用，还是有不好的作用？

同样，一个时间，放“卫星”，影响到了波兰。波兰政府特意派了个代表来中国“取经”，其中有军队同志。到了北京，由叶帅接待，然后毛主席接见。大概这是九十月间的事了。波兰同志讲：听说你们的农业高产了，很有成绩，你们的办法好，我们现在就是来向你们学习把我们的农业搞好，把产量提高。毛主席说：不要相信这些，这些都是假的。这是我当时听陈伯达讲的。

随后，毛主席继续向南走。到了修水县，田家英下去调查。修水的县委书记讲：农民实行工资制，他很担心，灾年收入减少，工资发不出去怎么办？毛主席听了田家英的汇报说：这个书记是懂事的。他不像别的人冒冒失失地在农村实行工资制，他知道灾年发不了工资，他这个县委书记就难当。

后来11月上旬开了第一次郑州会议，毛主席针对“共产风”等“左”的错误，提出必须划清集体所有制和全民所有制、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两种界限，必须发展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指出废除商品生产对农民实行调拨是对农民的剥夺。警告高指标问题，毛泽东开始纠“左”了。

少奇同志在北戴河会议以后不久，也往南走。这次调查，也把我带去了。

他到了徐水县，在车上听汇报。还是那个县委书记张国忠来了。少奇同志问他：我们这次来参观，来学习。听说你们的

工作搞得很好，怎么样啊？张国忠说：有的是新经验，有的是好成绩。你们想看什么都可以。

少奇同志说：一个一个看吧，离车站不远的地方有什么好的典型？张国忠说：有共产主义新村。少奇同志说：那我们一起去看一看。

到了“共产主义新村”，什么新东西都没有。看到的，一套房子挂了个牌子是食堂，另一套旧房子挂了个牌子是俱乐部，还有一个房子是养老院，再有个房子是托儿所，仅此而已。新的房子没有不要说，就是连必要的设备都没有。这就叫“共产主义新村”？

我当时没有敢说什么。心里想：“共产主义新村”就是这个样子，还有什么奔头！

少奇同志只是看，没有说话，听张国忠在那里说就是了，跟着张国忠走就是了。

然后，又到他县里看“高产”棉花。只见田里的棉花疯长，长得比人还高，上面没有结几个棉桃。又去看深翻土地，真是掘地三尺。他们介绍说，深翻土地以后，要种白菜，每颗可以长到200斤、300斤。等到收了以后，向中南海献礼。还有什么人造梯田。在平地上，堆起一个山坡，说这样可以按照不同层次的梯田种不同的品种，同样的一亩地可以增产多少多少。

看了这些，少奇同志没有大加称赞。但是也没有批评。不说话，就是说明他心里是有考虑的。

到安国看垦荒。这个地方搞得不错。原来的田地有歪有斜，现在搞成一方一方的，平平整整，种得也很好，让人感到

了新面貌。

到了郑州，到了开封。晚上在路上，只见隔不远就是一座小高炉，人来人往，炉火熊熊，让人感到有一种新气象。少奇同志看了，情绪兴奋起来，确实高兴，说：群众真的发动起来了！少奇同志总以为，只要群众真的发动起来，我们的事情都好办。这是他一生革命中多次体验了的。然而问题还在于是怎么干的，干的是否实际。

以后又沿着苏北一路走下去。这时，少奇同志特别关注农业中学问题。陪同他的是江苏省委管文教的一位副书记，叫陈光。一路上，他向陈光了解情况，非常用心。到了苏北，又到苏南，然后到了南京。少奇同志在南京讲了一篇话。我的印象，他讲了共产主义过渡可以提前。这个看法，和当时的普遍看法没有什么大差别，只是论证稳妥一些。1958年八九月间，这篇讲话发表在南京的报纸上。

回到北京，少奇同志不久又同胡绳出去一次，要胡绳写了一篇关于两种教育制度和两种劳动制度的文章。

总之，北戴河会议以后不久，毛主席开始发觉工作中间的问题。1958年底有第一次郑州会议，1959年初有第二次郑州会议，中间有武昌会议，这中间我没有听到少奇和中央有什么不同意见。

这期间，也就是北戴河会议前后，还有一个同赫鲁晓夫斗争的问题。本来，莫斯科会议以后，中苏两党的关系趋于好转。但到了1958年五六月间，苏联提出要搞“长波电台”、“联合舰队”，两党的矛盾重新激化。开始是经过尤金，后来是赫



1958年9月，刘少奇在江苏省常熟县农村考察

鲁晓夫亲自来了。这个问题上，中央领导同志是完全一致的。有的时候，是少奇同志和他们接触，有的时候是少奇同志和毛主席等一起接触。

1959年第二次武昌会议，粮食要增加到1万亿斤，钢产量要增加到2800多万吨。陈云同志觉得这个数字太高，不托底，他跟胡乔木讲，要胡乔木向毛主席反映，这个数字不要公开发表，不发新闻。乔木同志不敢去说。可是到了上海会议，指标降下来了，钢产量降到1500万吨。这个时候毛主席还是不放心。要陈云核定，看这1500万吨究竟能不能实现。陈云同志用了两个月时间，调查分析，提出计划，必成的钢是1300万

吨，原先的1500万吨指标也不改，放在那里。后来实际完成的数字，就是1300万吨。这次会议是少奇同志主持，陈云同志讲，核定的指标通过以后报毛主席批准的。

1959年4月中下旬召开的第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刘少奇被选举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

到了7月庐山会议，发生了一个很大的转折。

庐山会议前期，纠“左”。彭德怀意见书印发以后，纠“左”中断了。来了个反对“右倾机会主义”。本来的困难没有克服，经过这么一搞，更加困难了。

庐山会议的转折是多种因素造成的。彭德怀信印发头一两天，据王任重同志回忆，他同主席一起去游泳，对毛主席说：他把彭德怀的信看了，看来彭有一些不同意见。毛主席这时讲：彭是政治局委员，给党中央的主席写信，那是正常现象嘛。有不同意见，可以讨论。说明毛主席这时的情绪还是平和的。

但是后来变了，非常激烈起来。从我看到和听到的情况和材料来看，有多种因素。

一种因素，小平同志对此也讲，彭老总写信、说话，特别是说话，确有不妥当的地方。当时有人揭发，说他在从北京出发到庐山的火车上讲了这样的话，说：中国问题的严重，困难继续下去，也许只有靠苏联红军帮助我们才能解决了。这种讲法，虽然是气话，但是让毛主席听了这个话不能不反感。

他的信，他的发言，在很多小组会上有同感。因为的确都有这样的问题嘛。确实在几天里，有这样的趋势，同意彭德怀的意见越来越多。而在小组会上，彭德怀又说了些气话，翻老

账，延安的华北会议开了他40天，他耿耿于怀。

恰在这个时候，驻苏使馆发来一个情报，说苏联的报刊、领导人讲话，指责我们的错误，这些说法同彭德怀的说法又大同小异。因此引起一种怀疑：里外互相呼应。

在庐山会议期间，北京留守的只剩下陈毅。一次，见到苏联大使尤金。陈老总说：他们都开会去了，就剩下我一个人。也不知道尤金是出于什么意思，是否开玩笑，竟说：这样你就可以搞政变了。陈毅同志很警惕，马上报告毛主席。社会主义国家的大使，对我们的国家领导人说这样的话，问题尖锐了。

加上会议之前，苏联政府正式通知我们，停止提供原子弹制造的设备。联系起来看，可是不一般呀。

这些因素，造成了对彭德怀的错误批判，造成了这样一个可悲的历史性转折。

这时候，在这种情况下，少奇同志生怕打断纠“左”的进程，提出了庐山会议反右倾的情况要不要向下传达的问题，他要胡乔木去向毛主席说。乔木不敢，没有传话。如果当时传了，不知还会发生什么样的情况！

总起来说，说明一个问题，就是像毛主席在七届二中全会上所说的，过去我们熟悉的事情闲起来了，新的不熟悉的事情逼着我们去学。建国以后，我们进行的土地改革、抗美援朝、三大改造，都还是我们过去熟悉的，得心应手地对付帝国主义，得心应手地进行资产阶级改造，得心应手地处理和反击资产阶级右派的进攻。但是到了社会主义建设，毛主席没有经验，少奇同志和周总理也没有经验。没有经验怎么办？就只

有探索。既然是探索，当然就有探索对的地方，也有不对的地方。有的办法比较成熟，有的就不太成熟。

当我们回忆这些历史的时候，可以看到，党中央对赫鲁晓夫、对美帝国主义、对印度的尼赫鲁、对所谓的右派进攻，大家的意见都是一致的。凡是属于旧的范畴，我们熟悉的东西，好像不用讲，大家自然就完全一致。而一遇到新的情况，新的建设形势，又都想搞快一点，就开始出现了这样那样的意见，就不那么一致了。有一致的，也有不一致的；有时候这个问题上毛主席说得对，有时候那个问题上少奇同志和周总理说得对。说起来这是合理的状态，而且是不可避免的。

可贵的是，这些年的建设，经过探索，经过曲折，终究找到了进行经济建设的许多经验。最叫人惋惜的是庐山会议的曲折。如果历史按照庐山会议前期的方针搞下去，不就很好了嘛。可是多种因素汇合在一起，造成那样一个后果，真是让人遗憾！但这绝不是哪个人能改变的。80年代初，我们起草党的第二个若干历史问题决议时，改得最多的就是这一段。到底怎么改，大家的意见不一致。最后小平同志提出，首先要把这些年的成绩写够，在这个前提底下，再来写应该写的问题，写可以让大家接受的教训。所以今天我们回忆少奇同志，写他的历史的时候，这个精神同样适用。

（访谈日期：1998年4月16日。

刘建平、李捷、张素华记录，朱元石整理）

邓力群著：
我为少奇同志说些话

七千人大会到 西楼会议

刘少奇没有心思编他的选集

批判彭德怀的那次庐山会议，我没有去，胡绳去的。在会议进行到批判彭德怀的时候，少奇同志也参加了批判。可是他对胡乔木讲：你给主席说说我的意见，批判，到这个会议为止，不要往下传达了。少奇同志是怕好不容易搞起来的纠“左”工作因此半途而废。

胡乔木前思后想，十分为难，在征求一位领导同志的意见后，没敢给毛主席讲。这样一来，庐山会议批彭的文件一级一级地往下传达，把郑州会议以后一直到庐山会议前期的纠“左”中断了，全国各级大批右倾机会主义，层层批，层层戴帽子。

本来经过九个月的纠“左”，情况正在逐渐好转，但也只是到干部这一层，五级干部会。本应该是干部想通了以后，到群众中去纠，但这时还没开始。

各地“左”的错误也不平衡，有的地区很严重，有的地区

好一点。比如陶铸同志、王任重同志，在“大跃进”初期，他们也是一样的“左”。可是到1959年三四月上海会议以后，他们感觉到不能再这样干下去了，回去在领导机关、在干部中间开始做自我批评。像他们所在的地区，情况就好得多，但原来“大跃进”的那个“左”，也还没有纠正。河南、安徽、甘肃、青海几省一些地方，等到庐山会议的东西下去以后，正好火上加油，就更“左”了。

庐山会议后没有几个月，到1959年11月、12月，河南的问题、安徽的问题开始暴露，但还没有反映到中央，没有反映到毛刘周朱他们的耳朵里。1959年12月，我们几个人正陪同毛主席读书，那时毛主席的心情好像没有什么着急的事情，那些事情还没有反映到他那个层次。到1960年的春天，“信阳事件”暴露了，群众来信，人民来访，上告的越来越多，反映的情况越来越严重。中南海里的秘书室派人下去了解。我的一位老朋友彭大章，是秘书室的负责人之一，他带领人下到信阳进行调查了解，回来跟我讲：老邓，问题真严重啊！说时神色惨然。

后来先念同志也去了。回来讲，他去过的村庄，妇女没有一个不穿白鞋的。

怎么造成这样一种情况的？是高指标、高估产、高征购，严重的浮夸，征了过头粮。还有特别厉害的一条是，没有饭吃了，村子里能够吃的、能够找到的都吃光了，为了保住他那个浮夸，竟不让逃荒，让民兵把着。这里没有饭吃，到别的地方去逃荒，历史上哪朝哪代都是这个办法，解放以后遇到大灾大

荒之年也都是这个办法。不让逃荒，强迫命令，把本来可以活下来的人饿死了。

事情都有一个认识过程。这些骇人听闻的情况反映到毛主席那里，刚开始，简直令人不可想象，我们的党员，我们的农民干部，难道会干出这样的事情来？不可能！唯一可能的是地主、富农进行阶级报复。他们对人民有仇恨哪，对分了他们的地、斗争了他们的那些农民有仇恨嘛。是民主革命不彻底，这些人照样在农村占了统治地位，他们利用这种环境、这种条件，对我们基本群众实行阶级报复，才会造成这样前所未有的严重情况。就是在这样一个认识底下，1960年春中央发了一个文件下去，要在那类地区进行“民主革命补课”。我记得当时甘肃的陇东有一个大案，贵州的一个地方也有一个大案，作为阶级敌人进行阶级报复的典型。少奇同志要钱瑛大姐去调查，也说性质属于阶级敌人报复。

陶铸同志，他当时是中南局的第一书记，亲自到信阳考察，结果才发现，干这些事情的，统统是贫雇农出身的干部。是省委主要领导人向下一级一级压他们，他们本来作风也不好，就这样，上下造势，互相促进，互相支持，造成这样严重的情况。从这时开始感觉到农村情况、农村问题不简单。暴露这种问题的地区也就越来越多。根本问题是“左”。

接着，1960年6月，来了个布加勒斯特会议，赫鲁晓夫粗暴地对我们党搞突然袭击，要我们跟莫斯科“对表”。这次会议是彭真同志、康生去的，事先没有预计到会发生这样的事情。大家很气愤。北戴河会议讨论起草和定稿了一封给赫鲁晓

夫的信，进行了回答。赫鲁晓夫不顾国际信义，立刻撕毁合同，撤退全部在华专家，停止设备供应，进一步向中国施加压力。小平同志告诉苏联人，你们给我们这么大困难，“我们准备吞下去”。这样一来，内忧又加外患，国家进入了困难时期。

在这样一种情况底下，周总理、陈云、李富春、薄一波等，主张对经济战线来一个调整，提出了进行调整的“八字方针”，也就是要把一切不切实际的经济指标退下来。由于农村问题最先暴露，调整农业就成为首先要解决的中心问题。

也是这个时候，毛主席要周总理主持起草一个农村整风整社的文件，后来叫作“农村十二条”。这个文件的下达，是大幅度调整农村政策以战胜严重经济困难的开始。刘少奇在对这个文件草案进行审改时，加了这样的话：“一切干部和群众都必须了解，所有制是生产关系的决定环节，目前我们所规定的以生产队为基础的公社三级所有制，必须在一定的时期内固定下来，绝不容许对它有任何侵犯，特别是从上面来的侵犯。已侵犯了的必须赔偿，否则，就要破坏生产力，破坏群众的生产积极性”等。这说明少奇同志在农村问题是清醒的。

说到这里，就要回过头来说一下，为什么少奇同志老是没有把心思转到编《刘选》上来呢？

1960年毛主席带我们几个人读政治经济学教科书，胡乔木在读书期间主要负责编《毛选》第四卷。读完书以后，过了春节了，那时我已经回到北京，乔木向毛主席汇报第四卷编辑情况，汇报了差不多一个来星期。全部工作报告了毛主席，得到了毛主席的同意、肯定，说：好，可以出版了。还讲，他

的选集就出到第四卷，到新中国成立以前为止。新中国成立以后的，现在不出。又说：过去说过多次了，要出刘少奇的文选，可是一直到现在没有出。现在，《毛泽东选集》第四卷出来了，应该把出刘少奇的文选列上日程。胡乔木回来传达了。

当时正好有一个民主革命补课的问题，一个对苏谈判的问题，一个应付布加勒斯特会议的问题，小平同志忙得不可开交，顾不上搞《刘选》的事。好像到了北戴河会议以后，才在一次书记处会议上正式决定要编辑出版《刘少奇文选》。指定负责人是康生、陈伯达。他们便筹划组织，选定编辑队伍。

这个时候，已经到了要开中共八届九中全会了（1960年底到1961年初）。而且农村严重情况的材料已经反映上来，使毛主席意识到，农村的问题不认真对待不行了，社会主义建设不能那么急，不能务虚名而招实祸。这时“农村十二条”已经下达，收到了好的效果。但是他觉得农村的问题还需要进一步调查，进一步了解。他就此讲，全党要大兴调查研究之风，1961年要成为一个调查年，要进一步了解农村情况。提出每个省市自治区的第一书记要亲自抓两个公社进行周密系统的调查研究。他自己也要亲自去做调查。接着组织了三个组：陈伯达一个组，跟毛主席一起到广州；胡乔木一个组，到湖南；田家英一个组，到浙江、安徽。要求散了会就要下去。

这个事情一来，陈伯达要找人，其中找到了原来康生准备组织参加编辑《刘选》工作的人，一个我，一个许立群。在当时中宣部的教育楼会议室里召集开会。陈伯达讲：“毛主席要我做调查研究，我没有不行呀。”康生讲：“你把这些人都抽走

了，我这个《刘选》的编辑工作怎么办？《刘选》的事，也是你陈伯达的事，你不能不管啊！”陈伯达说：“要管，要管，可是现在我得听毛主席调动，他调我去，不能没有人帮我忙啊。我跟你保证，调查回来，不但他们参加，我也一定参加《刘选》的编辑工作。”这样，邓力群和许立群跟陈伯达调查去了。

我们到了广州以后，得到证明，后来的事实也都证明，光有“十二条”的确还不行，还需要进一步了解，进一步作出新的规定。

我们一到广州，恰好遇上广东省委召开五级干部会议，检查、讨论执行“农村十二条”的情况。大家都说，有了“十二条”，情况大为好转。一致认为，只要认真贯彻“十二条”就行了，农村的问题可以解决了。只有一个公社书记，不以为然。这个人长得不起眼，是个小个子。他大会也好，小会也好，都坚持说：“农村十二条”解决了从上而下刮“共产风”的问题，但是没有解决生产队与生产队之间、生产队内部社员与社员之间的刮“共产风”的问题。在大队内部，几个生产队之间平调嘛；在生产队内部，大家吃大锅饭嘛。他说，这两个问题不解决，农村的好转，不能是真正彻底的好转。

于是，大家同他争论。他说：“既然你们认为你们那个办法好，那我也没有办法，但只要让我这个公社按照我们的情况去解决大队内部、生产队与生产队内部之间刮‘共产风’的问题，生产队内部社员与社员之间刮‘共产风’的问题，我保证解决我这个公社的经济问题呀，政治问题呀，情况可以根本好转。”大家怎么批他、驳他，他都不退却。一个人，孤立啊，

很有一股子反潮流的精神。

我们刚到，听了省委这样一个汇报，找他谈。陈伯达马上把这个公社书记的意见报告了毛主席。毛主席说：这个书记的意见好，我们这次调查要制定的政策，就是要解决大队内部生产队与生产队之间的平均主义，生产队内部社员与社员之间的平均主义。这是一个纲。

这件事传到了胡乔木那里，也传到了田家英那里，都引起了重视。经过一个多月的调查，对毛主席的这个指示的了解更清楚了。这时毛主席又回到广州，他叫胡乔木、田家英都来广州，着手起草“人民公社六十条”，把公社各级组织的职权搞清楚。大家分工负责，各搞一段，然后由乔木统改一遍，陈伯达再统改一遍。这时广州召开“三南会议”（华东、华中、西南三地区）；北京少奇同志召开“三北会议”（华北、东北、西北三地区）。因为有了“人民公社六十条”这个条例出来，毛主席便把“三北会议”的人调到广州，两个会议合起来开，变成中共中央工作会议。毛主席还把他的信发给大家，说：你们看，只有“十二条”还不行。批评了认为有了“十二条”就行了的观点。毛泽东认为，“十二条”解决了一些问题，但是不具体。这样，会上讨论“人民公社六十条”草案，有修改，有补充，有提高。

少奇同志还在这期间主持了几天的会议。他在会上说的有些话是很有道理的。例如他说，调查研究，无非是决定政策，解决问题。首先是提出问题，我们提不出，群众是可以提出的。经过调查，决定了政策，解决了问题，然后还要检查。我

们决定的政策是否正确，是否需要补充，还得到群众中去考验。文件讨论完了以后，毛主席讲：这还只是我们的意见，究竟农民、基层还有什么意见，还应该返回去征求他们的意见。这样三个组都拿了这个草案，原来在哪个地方调查的，就回哪个地方去征求意见。小平同志、彭真同志到北京郊区大兴、顺义调查。周总理也利用陪同外宾外出的机会，在湖北、广西、云南、四川等地向省委、县委负责人进行调查。后来又河北武安县的一个公社做深入调查。少奇同志到了湖南长沙县广福公社天华大队和他老家宁乡县花明楼公社做了几十天的蹲点调查，并把调查情况尽快向毛主席报告。

少奇同志1961年5月中旬回到北京，接着在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上，他明确地说，右倾机会主义已经反了几年，现在是不是要提出反“左”的口号，可以考虑。从全国范围来讲，有些地方天灾是主要原因，但这恐怕不是大多数；在大多数地方我们工作中的缺点错误是主要原因。想要快一点，反而慢了。看来，搞社会主义建设光有好的道德、好的感情、好的干劲不行，还要适应客观规律。饿了两年饭了，铁路还要修几万公里吗？“小洋群”还要搞那么多吗？工厂还要开那么多吗？招待所还要盖那么多吗？害了一点浮肿病，死了一些人，全党、全国人民都有了切身经验，回过头来考虑考虑、总结经验是时候了，再不能继续这样搞下去了！这是少奇同志经过调查，有了切肤之痛的呼声。

我们回去征求农民意见。农民一方面高兴，一方面说还有问题。还有些什么问题？在胡乔木调查的那里，农民说公共食

堂不解散不行。因为条例草案上这时还维持办食堂。农民反映说，每家每户自己烧饭，可以这样吃、那样吃，要节约嘛，今天多吃了一点，明天就少吃一点，劳动多吃一点，不劳动就少吃一点，有杂粮也凑合一点、粗细搭配一点。办公共食堂就是吃一样的东西，大锅饭不能满足不同需要，并且造成严重浪费。我们在广东做了一个生产队七十多户的挨户调查，他们中劳动力强人口少的人家，对草案七分按劳、三分供给，还保留了三分供给制的尾巴有意见。的确，同等的劳动力，同等的贡献，家庭人口少的就少分，家庭人口多的就多分，明显不合理，明显会伤害劳动积极性，会阻碍生产力的发展。我们反映上去，也得到了重视。1961年5月北京的中央工作会议，汇总大家征求来的意见，去掉了草案中保留的两个尾巴，一个食堂，一个三分供给。

但是还有一个大队核算和小队核算的问题没有解决。在广东我跟陈伯达讲过。他说，这个问题按照“三包一奖”可以解决了。实际上没有解决。到了1961年11月，王任重根据湖北的经验，说核算单位留在大队这一级不好，还是下放到生产队为好，立即得到了毛主席的同意，又做第二次条例的修改，把核算单位下放到生产队了。这说明，原来郑州会议就提出的“三级所有，队为基础”以前没有落实，到了这个时候才全面落实。从1961年后，一直到“文化大革命”结束，这一原则没变。

1961年三四月份，我回到北京，正式参加《刘少奇选集》的编辑工作。在我和许立群被抽调去搞农村调查的这一段时间里，康生组织熊复、姚溱、王力、范若愚，还有他们那个理论

组李鑫等几个工作人员，收集、查阅刘少奇的档案。从白区一直查到解放后，约有300万字。当时的方针是按照《毛泽东选集》的下限只选到1949年。他们从中搞出了个选目。康生说，选的不选的，都要让少奇同志认可，好做下一步的工作。

这时少奇同志在湖南。康生带着选目去了长沙。少奇同志听了汇报说，你们先搞着吧，现在我回不去，在这里看过去的文章，心情转不过弯来。

少奇同志后来对我们说，他到湖南农村后，农民对他说，这几年共产党睡觉了嘛！一直等着你们快点醒来，你们就是不醒。现在你们下乡来了，说明你们睡醒了。你们再不醒，我们就要拿起扁担上街了。他听了这些情况，深感责任重大。

少奇同志在家乡了解了很多情况，时间越久，工作越深入，越感到问题的严重性。

康生从湖南回来后，我们按选目分组工作。《论共产党员的修养》是党建组的一个工作重点。这篇文章原来有一节叫“做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的好学生”，苏共二十大后，感觉继续提做斯大林的好学生与国际思潮不合，想了个主意，把恩格斯、斯大林的名字从小标题上去掉。考虑文中原来有斯大林论列宁，没有恩格斯论马克思，就补了恩格斯论马克思。这样，原来的内容保留了并且增加了，但标题变了。少奇同志从湖南回京后，我们就此向他做了汇报，他同意了。同时我们向他说，原来分三章，其中理论修养一章，薄弱一点。他说，你们想办法增加吧，他也想想。

在这次汇报会上，他讲了一个观点。说：解放后，《论共

产党员的修养》出版过一次，到现在二十多年了。二十多年人们还想着这篇文章，包括国外也有人认为这篇文章有可取之处。什么道理呢？我想，马恩列斯解决的是党建路线问题、理论问题，路线问题解决了以后，要提高党员的修养，要解决党员个人利益和党的利益的矛盾问题，这方面我们有新东西，有创造。确实，这方面少奇同志有大贡献，这也是人们记着它的原因。少奇同志的《论共产党员的修养》，可以毫不夸大地说，它曾教育了几代的共产党人，使他们真正从思想上入党，自觉地建立起共产主义的人生观，自觉地去为共产主义事业而奋斗。他们在胜利面前不骄傲、不停步，在挫折面前不气馁、继续前进，成绩面前不居功，缺点错误面前不掩饰。荣辱不惊，喜忧不惊，处变不惊。抛弃私心杂念，不计个人私利，只是想到怎么有利于人民。多少共产党员因此成为打天下和治理国家的英才。中国共产党有这样一批共产党员在，那当然就无往而不胜了。

在我们汇报到《清算党内的孟什维克主义》这篇文章时，少奇同志说：这篇文章写作的时候，是为批评王明的投降主义的。王明的投降主义作为孟什维克主义来批是没有错的。但是，王明在抗战以前的“左”倾教条主义不好说是孟什维克主义的。三次“左”倾路线都不好叫这个名字。这个题目以及文章里的内容是不是改一下，当时有当时的条件，当时有当时的对象，现在看，有不准确的地方，叫“反对假马克思主义”比较合适。后来我们是照他说的改的。

听了汇报，留下一个问题是怎么充实理论修养部分。少奇同志说，他也想想。可是马上他又到东北和内蒙古林区做调查

去了。我们便按照他同意的选目，把工作做到告一段落。他回北京后，他口述，邓力群记录，在理论修养部分增加了二三千字的内容。

1961年八九月，在北戴河小平同志主持起草的《国营工业企业工作条例（草案）》（简称“工业七十条”）提交庐山会议讨论。毛主席看了比较满意，认为在工业管理上总算有个章程了。但是也有人不同意，在会议讨论中，上海有同志就挖苦说这个条例是刚从苏联学习回来的人写的，照搬苏联。这时小平同志已离开庐山去朝鲜访问，彭真在意见不统一的情况下，采取折中办法，条例内容不动，搞了个中央转发“工业七十条”的指示，把不同意见也反映了进去。

小平同志回来，发现“人民公社六十条”贯彻得不很好，“工业七十条”也执行得很差，主要由于分散主义。他认为，有必要开一个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全国县委书记以上的干部都到会，三四千人，议题就叫“反对分散主义，实行集中统一”。对此，有人建议，让大中型企业党委书记也参加会议。小平同志同意。这样就形成了七千人的规模。小平同志同时讲了一个很重要的思想，说群众路线是少奇同志在《论党》里加以阐述和发挥过的，是党的根本路线，但是它的实现形式，大搞群众运动只是一种形式，不是唯一形式。这是小平同志针对“大跃进”所犯的错误的总结出来的很好的意见。他认为，贯彻群众路线要靠经常工作，一点一滴的工作，要深入到群众中去，认真听取群众的各种意见，同群众一起商量各种问题的解决，踏踏实实、深入细致是基本功，只大搞群众运动，流于形式，会出

来各种毛病。真正深入群众，真正同群众一起商量的了，搞错了，群众会同我们一起纠正错误。小平同志的意见报告了毛主席，毛主席认为很重要，说集中统一，就要做到五个统一：统一认识、统一政策、统一计划、统一指挥、统一行动。

要开这么一个大会，就有许多准备工作要做。一个工作就是准备会议文件：第一个文件题目叫“毛泽东论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和两条战线斗争”；第二个文件是“人民公社六十条”；第三个文件是“工业七十条”；等等。在准备这些文件中间，我们工作人员想了个办法，“工业七十条”这个文件只选条例本身。我们还跟小平同志反映，有人说，“七十条”是从苏联留学回来的人搞的。小平同志笑着说：“我倒是从苏联留学回来的，但是，是几十年以前留学回来的，不是刚回来的。”

1961年11月中旬到12月中旬，少奇同志在广东疗养。康生提议趁着少奇在广州，把《刘选》编辑组一起搬到广州去。没想到编辑组一到广州，少奇同志接到中央要在北京召开七千人大会的通知。他一听就说，得回北京。把我们撂在了广州。

少奇同志的这种心态、感情很可贵。他几次讲，作为党和国家领导人，目前这种情况，眼面前的事，他放不下。少奇同志回京了，我们就从11月一直在广州干到第二年春节，又从头到尾对所选的文章修改了一遍。在这种情况下，我们非常希望下一步少奇同志能一篇篇地看，能一篇篇地给我们提意见，我们好按照他的要求再进行加工。

春节后我们回到北京，七千人大会还在开。

七千人大会少奇同志的报告经过多次修改，基本定型后送

给毛主席。毛主席说，好啊，有了个稿子发给大家讨论，大家提意见嘛，少奇同志不要在大会上念稿子了，大家看了就行了。毛主席自己就不习惯念稿子，延安七大，后来的许多全国会议，大都是稿子搞了七八遍，印发大家，然后他在会上讲他自己还想讲的，发挥一下、解释一下正式稿子上没有的东西。他希望少奇同志也这样。

这样在七千人大会上，少奇同志就有了一个书面报告，一个口头讲话。现在回过头来看，书面报告也好，口头报告也好，都从总的方面总结了“大跃进”的经验教训，提出了方针政策。但口头讲话，毕竟没有像书面报告那样是经过磨来磨去的功夫，说得比较开放，语言也自由一些，有感受很深的东西随口而出，难免说了些不好听的话。后来我参加修改他的口头讲话时，在把大家的意见向他汇报中间，他不断插话。我的突出印象是，他情绪很激动。他说：犯了那么大的错误，给人民带来那么大的损失，我们这是第一次总结！只一次不行，以后每年要总结，一直总结到十次八次，才能深刻地接受错误的教训。讲到历史上饿死人的事是要写到史书上去的时候，他情不自禁，愤愤地说：“我当主席时，出了这种事情！”

刘少奇对陈云说：我对你支持到底

七千人大会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尽管没能把发生困难的原因讨论深透，应该说还是开得成功的、有效果的。它发扬了党内已经有那么一些年相当缺少的民主，进行了批评与自我批

1962年1月11日—2月7日，刘少奇在扩大的中共中央工作会议（又称七千人大会）上代表中共中央向大会作书面报告，并发表重要讲话。



1962年1月11日—2月7日，刘少奇在扩大的中共中央工作会议（又称七千人大会）上代表中共中央向大会作书面报告，并发表重要讲话。

评。毛主席说：“凡是中央犯的错误，直接的归我负责，间接的我也有份，因为我是中央主席。”^①

七千人大会上毛主席的讲话，当时我听了不过瘾，觉得一般。但事过几十年之后，感觉他的讲话确实是讲得深刻，经得起时间、实践的考验。在民主问题上他说，列宁讲，无产阶级的武器只有一个，就是按照民主集中制，把自己的队伍组织起来，除此以外，没有别的武器。在社会主义建立以后，这个民主集中制、党内生活怎么适应新的情况，今天还没有解决。并说，没有民主的集中，只能是修正主义的集中，法西斯的集中。他说，党内要允许有公开的反对派，只是不允许秘密的反对派存在。在社会主义建设问题上他说，社会主义建设是个必然王国，人们的认识由必然王国到自由王国是个过程，这个过程还没有完结，我们还没有进到自由王国。必须在总结正反两方面的经验的基础上，加深对社会主义建设规律的认识。他说他在今天以前，只关心和努力从生产关系的变革上来考虑问题，对制度方面、生产关系的政策注意较多，而对生产力和对生产力的发展方面知识较少，做得不够，不如谁谁。在国内，在世界，我们必须坚定地站在人口的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人民大众这一边。在怎样对待犯错误和受挫折的问题上，他讲了孔子的故事、左丘明的故事、司马迁的故事、屈原的故事。

从毛主席的讲话中得到启发，刘少奇在随后的讲话中，也跟着指出原来起草书面报告时，只把分散主义作为主要问题来批评，忽略了民主集中制方面存在的问题，由此建议把第二部

^①《毛泽东文集》第8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296页。

分“关于集中统一”改为“加强民主集中制，加强集中统一”，把毛主席讲的那层意思修改进去。并说，这几年吃了不调查研究的亏，也吃了不讲民主的亏，这是一条大教训。一定要形成一种畅所欲言的空气，党内如此，党外更应该如此。无论如何不能以党代替政府、代替工会，因为党员总是少数。要充分发挥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作用，通过这个制度去实行人民的民主。这样，在少奇同志主持下，对他的书面报告和口头讲话再次作了修改，然后作为中央文件发到全党。

在“人民公社六十条”、“工业七十条”的推动下，各部门分别制定了本行业的条例，如“科技十四条”、“文艺八条”，高教、商业、合作社、手工业等都有了几十条。这是因为毛主席在这过程中已经提出，单有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不够，还要有为总路线所需要的具体工作路线。他在七千人大会上继续说，“有了总路线还不够，还必须在总路线指导之下，在工、农、商、兵、政、党各个方面，有一整套适合情况的具体的方针、政策和办法”。^①对各条战线的各项具体工作路线作出明确肯定，这是七千人大会的积极成果。它对进一步贯彻“八字方针”，扭转国民经济的困难局面，是有利的。

但是，事情有一个充分暴露和逐渐推进的过程。七千人大会后不久，少奇同志听财政部的汇报，得知财政收支不平衡，还有50亿元的赤字。那时年财政收人才多少啊，有这么多赤字，实在是个大问题。引起了少奇同志的严重关注。七千人大会后仅仅两个星期，2月21日至23日，又主持召开了中央政

^①《毛泽东文集》第8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304页。

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因为是在中南海西楼开的，所以后来又称它为“西楼会议”。这个会议可是重要。少奇同志认为七千人大会对困难情况还是没有透底。不要怕多说困难，它可以激发人们向困难作斗争的勇气。

在讨论中，陈云同志对当时的经济形势和克服困难的办法做了一个重要的讲话。少奇同志听后大为赞成，让陈云同志到国务院会议上也去讲讲，国务院的全体部长、主任，凡是参加国务院会议的全体成员都要听一遍。

那天，在国务院全体会议上，李富春、李先念同志先讲，反映不热烈。陈云同志后讲，热烈掌声不断。原本秀才们相约，分散入座，听到好的段落，带头鼓掌。结果超出想象，部长们热烈鼓掌在前，秀才们一直紧跟在后。那几年，人人谈困难，会会说困难，听到陈云同志讲困难，大家的心里踏实了，托底了。怎么克服困难呢？陈云同志讲时没有豪言壮语，没有空洞承诺；而是条条切实，着着牢靠。大家听后共同感到：困难可以缓解，希望就在眼前。比如说到，线袜子容易穿破，孩子多的人家，都感到补袜子是一件伤脑筋的事，以后计划对城市人口每人每年供应一双尼龙袜子。又比如说到，要逐步做到城市每人每月供应三斤大豆，在缺少肉类和蛋品的情况下，用大豆来补充营养。都是很实实在在的。

少奇同志继续在西楼召集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讨论怎么样转发陈云等的讲话，中央要不要搞个文件。有同志说七千人大会对全国的形势作了估计，没过多久，我们对形势又作不同估计，好吗？少奇同志说，这样的事党史上有的是，一次大会

作了估计，过了一段形势变了，又作新的估计，新的决定。他列举了好几个事例，直接作了回答。

陈云同志在谈到对形势的估计时，说：现在粮食已经掉到了1957年前的水平，看来，要恢复到1957年水平，没有六年也得五年，方针是准备慢，争取快。在这个问题上，有同志表示也不同意。对整个形势的提法，少奇同志认为现在是非常时期；陈云同志讲是恢复时期。有同志又说，刚刚提出调整的“八字方针”，现在怎么又搞成一个恢复时期，岂不是后退了？小平同志变通了一下说，对外公开讲调整时期，党内讲恢复时期。

讨论到基建、计划等，是坚持高指标，还是采取低指标时，少奇同志支持陈云说，过去老是高指标，完不成时来回调整，变成一年计划，计划一年。这次搞个低指标好不好？是制定低指标，超额完成了，有利于提高积极性，还是高指标完不成，有利于提高积极性？他认为，低指标超额完成，更有利于调动积极性。

党内有这种不同意见的争论情况，是最好的情况，没有不同意见，鸦雀无声，表面一致，就危险了。少奇同志在这个会议之前、会议过程中、会议之后，都起到了别人没能起的作用，让大家敞开谈自己的意见。会上还讨论了毛主席讲的公开的反对派、秘密的反对派是什么意思，各有各的解释。

西楼会议经过讨论，同意了少奇提出的关于转发陈云、李富春、李先念三个报告的意见，同意根据少奇同志在会上讲的意见起草中央批语。这个批语，照理应该收进《刘少奇选集》，

它代表了少奇同志在西楼会议上的基本观点。

西楼会议还决定，重新成立财经领导小组，李富春任组长。

最后，少奇同志说：好啊，经过讨论，我们都同意转发他们三个人的报告，也同意中央转发的批语。但是，这只是我们这里的讨论，毛主席不在北京，毛主席没有参加会议，明天，我、总理、小平，到武汉，把文件带上送主席审阅，会议情况口头汇报，主席同意，文件就下发，主席不同意，回来再议。少奇同志作为第二把手，在同毛主席的关系上很注意，处理得很好。

第三天少奇同志从武汉回来，给我打电话，说：“主席都同意啦。”高兴得不得了。对此我曾想过，毛主席的同意，是不是勉强的，或者是应付的？我认为不是。因为西楼会议这一套，完全符合1959年庐山会议上，毛主席所肯定的综合平衡、农轻重为序安排计划的说法。

少奇同志回到北京的第二天，对我说，把中央的批语再斟酌一下。批语里大致有这样的话：对陈云同志的意见，在讨论中，中央部门就有不同意见，这次下达以后，你们有不同意见，也可以提出。少奇同志于是考虑，批语里是不是把在中央讨论时持不同意见同志的名字写上？他的目的是为了启发党内民主。但是我讲，写上恐怕不好。少奇同志没有坚持。这样就没有写上，发下去了。

毛主席同意了，文件下达了，我们这些在钓鱼台写东西的工作人员都很高兴，高兴得不能平静。还一起议论，经济工作

最好还是由陈云同志来挂帅；富春同志是个好同志，但是由他担任中央财经小组的组长，远不如陈云。大家七嘴八舌，一致要我向少奇同志去反映，建议由陈云同志出任中央财经小组组长。我对少奇同志一说，少奇同志同意。大家喜出望外。

开始陈云同志表示不愿接受。后来周总理告诉我，少奇同志力劝陈云当组长，并对他说：我对你支持到底。

陈云同志当了组长去上海以前，召开过一次财经小组会议，讲了一次话。他讲：他管计划工作，主要管两条，一个基建，一个人员增加。抓住了这两条，就抓住了关键。这是他上任组长后的第一篇讲话。随后他到上海休息去了。

少奇同志还出了一个主意，要我们把陈云同志这几年对经济工作的讲话、文章，选编一份材料。我把这个意见对陈云同志的秘书说了。秘书给他打电报请示。陈云同志几次三番坚决反对。后来少奇同志说：对他说嘛，不是广为印发，只是印发给中央少数同志、中央财经小组的同志看，作参考。这样，我们就编了一份材料，大约有四五万字，提要一万多字。开始，题目称为《陈云同志论几年来的经济工作》。何均同志提出，已经有了《论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再来一个“论”什么，不好。于是把题目改成《陈云同志几年来对经济工作的意见》。少奇同志写了几句话，4月16日送给毛主席。其中有这样一些话：“最近我要邓力群找陈云同志几年来有关经济工作的一些意见来看，他找来了，并搞了一个摘要。我只看了这个摘要。现特送上，请主席看看。”

有了中央转发陈云等讲话的文件以后，接着又有一系列的

文件、措施出台，搞了《现金管理条例》、《财政收支平衡办法》等。

那几年，不得已多发了五六十亿元人民币。为了回笼这些货币，陈云同志出了一个主意，搞高价点心、高价糖果、高价饭馆、高价衣料、高价茶叶等。与农民的交易，还提了一个以高价对高价、以低价对低价的原则。当时，农民除了征购粮以外，余粮不愿意出卖，要卖就要抬高价格。陈云同志说，他们高价对我们，我们也高价对他们；他们用低价卖给我们征购粮，我们也用低价供应他们生产资料。这几项措施果然见效，把多发的货币全部收回来了。

这个时期采取的一项最重要的措施，是两千多万城市人口下乡。这个问题也是陈云同志多次提的。他为此曾到中南各省进行过调查。在河南，他和省委的同志算了几笔账：根据现有的材料一年全省生产多少粮食？扣除农民的口粮、饲料粮、种子粮，还有多少余粮？这是一笔账。另一笔账，全省的城市人口有多少？按照当时供应标准一年要吃多少粮？这些城市人口一年所需的粮食，同农民能够供应的余粮相比，究竟余粮够不够？计算的结果，差得很远。为了满足城市人口需要的粮食，势必要把农民的口粮和饲料粮挤出来，不挤农民的口粮、饲料粮，城市的人口就要缺粮。农村的农民饿肚子，城市的人患浮肿病，就是这样造成的。这就不能不造成城乡人民的尖锐矛盾。解决这个矛盾的办法只有一个，就是必须减少城市人口，让一部分城市人口回乡务农。这件事关系全局。

好在那个时候，已经有了“农村十二条”、“人民公社六十

条”，经过调整以后，农村情况正在有所恢复，城里人下去，给他一块地种，起码能够糊口，不会饿肚子。

总起来说，西楼会议以后，解决了一个综合平衡问题。原来只是工业一块，农业一块，商业一块，工业是工业的问题，农业是农业的问题，商业是商业的问题。经过西楼会议，把工业和农业的关系、城市和农村的关系、商业财贸和生产建设的关系，开始协调起来。一句话，有了各个部门的具体工作路线，还要有总体的工作路线；有了局部的具体工作路线，还要有全局的具体工作路线。拿现在的话来说，有微观的，还要有宏观的。只有一个一个部门的，困难过不去，经济恢复不可能。有了前面这个基础，再加上综合平衡，才能度过困难，发展经济。少奇同志对西楼会议的贡献，就在这里。这些事情，是少奇同志倡议坚持，得到周总理、陈云、小平、先念等同志全心全意的合作。

陈云同志身体不好，接着到上海休息去了。周总理综合当时讨论的全部意见，向我们讲了一次关于经济工作的全面调整，据此整理出财经领导小组准备提交5月中央工作会议的报告。

当这个报告正式提交5月中央工作会议，召集各大区负责同志来讨论时，有同志还是不赞成城市人口下乡的措施。特别是柯庆施唱高调，表示不同意。多数大区的同志支持这个报告。有人讲，过去的经济工作方面的报告看不下去，这个报告顺畅得很，说到了大多数人的心里。这个报告经毛主席批发全党遵照执行。

1962年8月，周总理主持起草了粮食的购销要统筹兼顾农村和城市的文件，经过多次修改，最后中央书记处讨论通过，作为中央文件下达。邓小平同志对此文件非常满意。他说：我们有一个粮食问题的好文件了。

1962年春，周总理和陈毅同志在广州开知识分子会议，为知识分子“脱帽加冕”，调整党和知识分子的关系。

1962年五六月间，少奇同志还就调整政法工作的问题，找中央政法工作小组谢富治谈了一次话。说：“这些年，我们的专政，专得不妙啊。要总结四年来的政法工作，要我去帮助。”^①经过多次座谈会，公安部座谈会、高等法院座谈会、高等检察院座谈会，起草了一个《关于一九五八年以来政法工作的总结报告》。

“大跃进”中，政法工作一样很“左”。公安部提出了要在几年之内实现十个“无”，无火警、无车祸等。谁违反就法办。把拘捕权下放到生产大队，大队有权拘留人。政法部门很多干部还有一个观念上的糊涂，认为凡是受到刑事惩处的人，都是专政对象。

少奇同志讲：政法部门应该有两个形象：“热烘烘的”和“阴森森的”。在人民群众看来，你们的形象是热烘烘的；在敌人看来，你们的形象是阴森森的。他说，政法部门承担正确处理两类矛盾的任务，不只是解决敌我矛盾，更不能把人民内部矛盾，经过你们一处理，都变成了敌我矛盾。所以这个时期的

^① 参见《刘少奇年谱（一八九八——一九六九）》下卷，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年版，第556页；另，参见《刘少奇选集》下卷，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450—452页。

调整，实际不只是经济调整，是经济、政治、思想三条战线上一起进行的全面调整。

全会讨论阶级斗争问题不传达，全党继续进行经济调整

也就在这时候，新问题跟着来了，中间有一个波折。

政法工作总结完了以后，恰好要开北戴河会议（1962年7月下旬到8月下旬的中央工作会议）。北戴河会议之前，七千人大会之后，毛主席要田家英带一个调查组去农村了解整社整风情况。

田家英首先来到韶山。韶山是毛主席的故乡，老百姓讲话没有什么顾忌，毫不掩饰。调查中，田家英问他们，“六十条”这套办法行不行？少数农民讲行了，多数农民讲退得还不够。田家英他们又到湖北、安徽去调查，都是同样的意见，认为退得不够。怎么办呢？这些地方的农民都讲：“分田到户。”

田家英带着这些意见回到北京，毛主席还在外地没有回来，他先向少奇同志做了汇报。少奇同志同意田家英的意见，认为采取这样的办法解决人民的当前严重困难，也是可以的。少奇同志当时的心情，他曾经流露过：从来没有想到，会在共产党的领导下，由于我们的错误，使我们的人民遭受了如此严重的灾难。田家英处理人民来信，看到有的信中说，他们的眼泪都流干了。刘少奇和田家英他们两人当时的心情是完全相通的，他们都恨不得能有一个立竿见影的办法来为人民排忧解难。少奇同志还叫田家英去征求其他同志意见。

少奇同志叫田家英去外地向毛主席当面汇报。联系后，毛主席回话说，等他回到北京时谈。毛主席回到北京，田家英在中南海游泳池边向毛主席做了汇报。毛主席找刘少奇去，责备少奇同志没有顶住。还说，要是他不在世了，“你怎么办？”

陈云同志从上海回来了，他在上海郊区农村也做了调查，他的意见同田家英的意见不谋而合。陈云同志还说：现在蒋介石叫嚣反攻大陆，我们把田分给农民，有利于动员农民起来保卫自己的土地。

陈云同志要向毛主席提出建议。有人就劝他，不要和主席讲这些，特别不要讲“分田到户”。陈云同志说：“共产党员不隐瞒自己的政治观点。我有意见，向自己的主席讲，有什么不好！”陈云同志向毛主席讲了。毛主席听了，当时脸色不好看。不过，没有责备。后来知道，毛主席在北戴河会议初期曾找陈云同志个别谈话，进行严厉批评。

1962年7月，到了北戴河。少奇同志叫我们起草一个通知，把农民、干部对农村工作的意见集中起来，发到各级党委征求意见，要他们做出赞成或反对的回答。

田家英同志要在这个通知文件里写上“分田到户”的问题。我说：这样做不行吧？铁托宣布解散集体农庄，我们说他修正主义。我们如果分田到户，人家会说我们什么？田家英这个人思想很纯，他说：“我们秘密搞，不宣布，几年后重新恢复集体经营。”我说：“几亿农民的事情，你能秘密得了吗？”

北戴河会议头一天，毛主席讲话，批评了田家英的主张，但说田在组织上没有错误，作为秘书向他反映是可以的。在会

上没点陈云同志的名。对邓子恢，批评得非常尖锐，说邓的意见，实际上是搞单干，所谓经营管理的创造，是骗人的。原来邓子恢同志曾总结安徽“田间管理、包产到户”的经验，多处做报告，毛主席回京后，邓去谈了。毛主席对此批评说：“邓子恢那次同我讲话，一讲就是三个钟头，训了三个钟头。我要说点话都说不上。水泼不进，针插不入！不但观点不能同意，而且组织程序也不对，组织上也是错误的。”

毛泽东在会上讲形势、阶级、矛盾，说有三股风，“黑暗风”、“单干风”、“翻案风”，越到上面越厉害。

少奇同志在会上诚挚地作了自我批评，承认对形势估计，对农村估计，以为有百分之三十的生产队散掉了，实际上真正散掉的也不过百分之十，比实际情况多估计了百分之二十。

会议从北戴河一直开到北京，9月下旬开八届十中全会。少奇同志、周总理、小平同志都批了“单干风”。党的基本路线再次重申，“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成了共同的呼声。

少奇同志真了不起。在当时大家谁都不再提调整工作的情况下，他提出：现在大家都讲阶级斗争了，调整工作还要不要做，调整的方针还执行不执行？在十中全会前的中央工作会议上还说了这样的意见：“鉴于第一次庐山会议的经验，要有个限制，要搞个具体规定，传达的范围、方法、方式要考虑。”在当时的情况下，敢于提出这样问题、提出这种意见，可不简单。

毛主席也真高明，他说：阶级斗争的讨论到全会为止，不往下传达。接受庐山会议的教训，在中央全会讨论就行了。庐

山会议，如果当时只在全会上讨论，不往下传达，就不至于走这段弯路。全党还是继续进行经济调整工作。毛泽东明确说：“要把工作放在第一位，阶级斗争与它平行，不要放在很严重的地位。”会议最后规定，这次会议的精神只传达到行政十七级以上干部，并且提出决不可以因为阶级斗争而妨碍经济工作。

少奇同志的讲话，代表了我们的意见。在场的人很高兴，又替少奇同志担心。毛主席这样一讲话，使到会人员放心了，等于下了一道无声的命令：放下包袱，轻装前进。

西楼会议决定的一系列政策，贯彻执行的效果很好。1962年、1963年，经济逐渐全面恢复；1964年，经济发展开始超额；1965年、1966年，经济得到全面发展。康世恩同志讲：经过这几年调整以后的年份，是建国以后最好的时期。宋平同志也讲：经过调整得到发展，为后来“文革”能够度过困难打下了可靠基础。这个时期，工业增长，农业发展，大庆石油，“两弹一星”，这些重大突破，都展示了西楼会议议定的方针政策所取得的巨大成就。

（访谈日期：1998年3月25日。）

吕小蓟、张飞虹、李捷记录，朱元石整理）

邓力群著：
我为少奇同志说些话

政法部门要正确处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

少奇同志有一次指出，最近几年来的专政工作“专得不妙”，出了不少毛病。政法工作就问题方面来说，主要错误有二：

第一，总的经验教训是混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没有把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清楚地、严格地、细致地区别开来，更多的是把人民内部矛盾看成是敌我矛盾，打击面过宽。

第二，没有严格区分处理两类不同性质矛盾的两种不同的方法，用处理敌我矛盾的方法来处理人民内部矛盾。这个错误更普遍、更严重。

少奇同志批评说，这不是共产党的办法，而是国民党作风。这样继续下去，对我们的事业很不利。用敌对手段处理人民内部问题，甚至党内问题，这样处理的结果，不仅不会解决矛盾，相反会使矛盾更加激化，甚至造成分裂。

今天我就根据少奇同志的这个思想，联系实际，就接触到的一些问题，谈谈一些认识和看法。

关于人民法院、检察院、公安机关的性质和任务问题

少奇同志讲了人民法院、检察院、公安机关的性质和任务。认为这三个机关不光只是处理敌我问题的，它们对敌人是专政机关，对人民来说是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机关。公安局名为公安，就是要管公共安宁。公共是谁？是人民。这三个机关要让敌人怕，不应让人民怕，而要让人民喜欢。它们的重大职责，就应该在严格区分两类不同性质矛盾和两类矛盾的不同处理方法的前提下，帮助人民，教育人民，保护人民。

我认为刘少奇讲得有道理。当时这三个机关中普遍流行的说法是：它们是专政机关，专政队伍，处理的是专政问题，做的是专政工作，管的是专政对象。我听了少奇的讲话，看了毛主席、列宁的一些书后，觉得这些说法是简单化了。这些口头语或书面文字是不确切的，不严格的，理论上是有缺欠的。这实际上也牵涉国家学说问题。

通常说，国家机关是压迫机器，但一仔细推敲，仅仅这么说还觉得有点问题，不完善。其实，这里有个前提，即对敌人来说，是压迫机器、专政机关。但是如果由此简单地把它们说成就是专政机器，那是不全面的，好像说嘴只会吃饭而不会说话一样。它们对人民来说，就不是专政机器。毛泽东在1949年6月《论人民民主专政》中说过，我们将要组成的国家对敌人要实行专政，实行独裁，压迫这些人，只许他们规规矩矩，不许他们乱说乱动。对于人民内部，则实行民主制度。对人民内部的民主方面和对反动派的专政方面，互相结合起来，这就

是人民民主专政。根据当时的情况，帝国主义还存在，国内反动派还存在，国内阶级还存在，毛泽东强调说，我们现在的任务是要强化人民的国家机器，这主要地是指人民的军队、人民的警察和人民的法庭，借以巩固国防和保护人民利益。军队、警察、法庭等项国家机器，是阶级压迫阶级的工具。对于敌对的阶级，它们是压迫的工具，是暴力，并不是什么“仁慈”的东西。我们仅仅施仁政于人民内部，而不施于人民外部的反动派和反动阶级的反动行为。毛泽东在这里还说得很清楚，说人民的国家是保护人民的。有了人民的国家，人民才有可能在全国范围内和全体规模上，用民主的方法，教育自己和改造自己，使自己脱离内外反动派的影响，改造自己从旧社会得来的坏习惯和坏思想。我们在这方面使用的方法，是民主说服的方法，而不是强迫的方法。人民犯了法，也要受处罚，也要坐班房，也有死刑，但这是若干个别的情形，和对于反动阶级当作一个阶级的专政来说，有原则的区别。

列宁在谈到苏维埃法院的两个方面的任务时也说过，它们首先是压迫剥削者，其次是教育劳动者自觉地遵守纪律。后一个任务比前一个任务更重要。

我们于1954年制定的国家宪法及法院组织法也规定了这两方面的任务。

所以，三个机关就是专政机关的流行说法是片面的。这种观念上的不清，会引起工作上的混乱和不良后果。少奇同志说，这几年打击面宽了，是个事实。劳动教养本来是处理人民内部问题的，结果用了同处理敌我问题一样的办法。行政拘留



1954年9月15日，刘少奇在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上作《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草案的报告》

本来是有严格的时限的，结果长期拘留，不依法办事。行政拘留、集训、劳动教养，变成和逮捕一样。有的单位还自己搞拘留、搞劳改，这是非法的，不允许的。此外，有的党政负责人，随便批准捕人，根本不要公安局、检察院这一套。甚至有的公社、工厂、工地也随便捕人。这种破坏法制的行为，必须坚决制止。少奇同志的这些批评是完全正确的。

三个机关有两种性质、两种任务，处理两类矛盾。不能认为它们处理的只是一种矛盾、一种任务。可不可以这样说，只

要敌人存在，阶级斗争没有熄灭，都是这样，只是在不同的时期有不同的重点罢了。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初期，特别是抗美援朝开始以后，三个机关几乎全力对付敌人，处理人民内部矛盾很少，上述片面的错误观念是否由此产生。等到1958年“大跃进”刮起“共产风”，政社合一后农村的专政作用不那么显著了，人民内部矛盾增加了，三个机关为此担忧起自己的前途。他们说是：飞鸟尽，良弓藏。我看这也是不对的。我们应当接受教训，不能突出某一方面时，就否定另一方面，把一个方面绝对化。

要处理两类矛盾，问题自然就复杂。这里首先就有个如何正确使用刀把子的问题。砍不好就要出岔子。砍好了可以砍敌人，砍不好就要伤自己人；该用刀不用刀就错了，不该用刀而用刀也就错了。这就必须注意分清两类矛盾，能否分清，是会不会犯大错误的最关重要的症结。分不清，就会犯大错误；分清之后，犯错误也是小错误。

这几年，三个机关对什么是敌人、什么是人民，总是清楚的。但是，实际工作中却出现了不少毛病，主要表现在三个问题上：

1. 坏分子和人民内部矛盾普通刑事犯罪分子的界限不清。坏分子的概念是：为非作恶，不靠劳动为生的掠夺者、破坏者。不能把人民中犯罪的人当作坏分子；当作专政对象。毛主席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中所说的坏分子，并不是指偶尔犯罪的人民群众，而是指不以劳动为生、杀人越货的惯犯、破坏者。为生活所逼等情况而偶尔犯法者，都不能算坏分子。

2. 反革命分子，特别是新生的反革命分子，要同人民群众中对党的政策不满，因而采取过激行动的人，区别开来。不要随便给人扣上新生反革命分子的帽子。湖南郴县鲤鱼江电厂女工刘桂阳，回家看到本地的公社工作搞得太不像样，提了意见，当地领导又不接受，她就跑到北京来，在国务院接待室贴了“打倒人民公社”的标语，并告诉警卫这是她贴的。后来被捕，以反革命论处。少奇同志发现了，责令平反。并说：“她的行为值得鼓励。这样的公社要打倒，但不要过激。”刘少奇对刘桂阳有表扬，有批评。这个人现在很好。广东某地有个复员军人看到下面刮“五风”，不满意。他不知道这是不是由上面来的，很担忧，准备上山，谁好就同谁合作。这件事后来被当作反革命集团处理，这是不对的。某省委院里发现“打倒×××”的标语，不得了了，就人人对笔迹。少奇同志不以为然，举了个例子说：1941年延安边区开县长会议，雷击打死一个县长，有个人就说：“雷公为什么不打死毛泽东！”公安机关说他是反革命，毛主席批评他们不注意原因。原因是当年征公粮由原来的14万担增加到了20万担，负担过重，群众不满。这是合理的反映。于是，毛主席就号召干部自己动手生产，减轻人民负担，共同抗日。这是马克思主义者的做法。对我们不满意、说些不满的话的人，决不能当作反革命分子处理。

新生的反革命分子，应该是指有这样一些问题的人：

反党反社会主义有组织行动的；

在战争中配合敌人行动的；

组织参加反革命武装暴乱的；

叛国投敌的；

同反革命分子主动联系、勾结的；

出卖国家机密的。

对人民中表现出来的不满、牢骚话，千万要慎重，首先要反躬自省，检查我们的工作、政策是否有问题。

3. 两类矛盾有时纠缠在一起，分不清楚。如有的闹事问题，是由于我们工作不当，引起群众不满，反革命分子从中挑拨而产生的。有的机关没有经过分析，就轻率地当成敌我矛盾处理了。这是不对的。两类矛盾纠缠不清时，尤其要慎重，应先分是非，后分敌我。

关于处理两类矛盾的方法问题

要想正确处理两类矛盾，不但要做到情况明，还要做到方法对。

三个机关在处理矛盾的方法上同其他单位有什么不同的特点，这要有自觉的认识。

《红旗》杂志处理两类矛盾的方法是写文章，根据马列主义原则和实际生活，总结过去的经验，从理论上阐明两类矛盾，而不是捉人；作协、艺术部门是通过创造形象的办法处理两类矛盾，使人们看了作品，明白对正面人物要学习，对有缺点的人要接受其教训，对坏人要惩罚的道理。但它们都不能捕人、杀人。

三个机关处理两类矛盾的方法的特点是用法律制裁手段。如反革命放火、人民犯法，都要受到法律制裁，严重的都要坐

牢，形式上是一样的。因此，有人认为，不管原来是怎样的，一受法律制裁，矛盾就转化了，就变成敌人了，变成专政对象了。把杀、关、管简单地了解为专政手段，监狱不分管分押，在牢狱中把反革命分子和刑事犯同等看待。有的地方甚至发生依靠反革命犯人管理人民中的犯罪分子，造成很坏的后果。

究竟什么是专政呢？怎么样从理论上说清楚，值得研究探讨。总之不能把专政简单地解释为杀、关、管。马列主义经典作家多次讲过，专政，一般说的是一个阶级压迫另一个阶级，是一个阶级为了维持自己的统治，对威胁自己统治的任何敌对行为采取压制的手段。谢觉哉说，没收地主土地，反抗就镇压，是不讲道理的。

由专政概念而来的系统的专政方法是：只许规规矩矩，不许乱说乱动，如乱说乱动就制裁；不给公民权利；剥夺言论自由，必要时剥夺行动自由，加以管制、监督劳动。人民服刑，要教育他们改变立场；反革命服刑，就要强迫他们改变立场。两种立场内涵也不同，单取其一，不能构成人民民主专政的特点。

系统的专政方法，只能运用于敌人，不能运用于人民。人民犯了法，用法律制裁，是教育的辅助手段。在服刑期间，可以保留一些权利。如还可以通信，还可以写东西，还可以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等。不到需要全部剥夺权利时，就不要全部剥夺。这样做的好处，可以使人民的犯法者感到是坐自己的牢，心甘情愿地接受这种应有的惩罚，接受人民内部的必要教育，这对巩固人民民主专政有很大好处。不要使人民坐一次牢就成为敌人，不然，本来他对人民政权没有意见，在坐牢后就产生

了敌对的情绪。对人民内部犯罪分子的管理同对敌人的管理，应有原则的区别，而且服刑期满，不加歧视。

刘少奇指出，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国家也是教育机关。要把人民教育成共产主义者，不光靠学校教育。无产阶级的专政工具，同时也有教育人民、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任务。

他还说，无产阶级法制，就是人民的法制，也就是社会主义的法制。法制不一定是指专政方面的，人民内部也要有法制，国家工作人员和群众也要受公共章程的约束。这就把法制观念进一步地引申了。

三个机关如何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

哪些归它们处理，哪些不归它们处理，以及如何处理，因为人民内部矛盾也有差别，所以也是要具体分析的。一般说来：

1. 凡属思想问题、人民内部争论的问题，只能用说服批评教育的民主方法解决，不能用压服的办法，包括“双百方针”、党内路线的争论在内。
2. 人民内部各阶层、集团之间由于经济利益引起的问题，应在加强思想教育的同时，依靠正确的政策来调整。
3. 党派、政府、军队、机关、团体、工厂、公社、学校的成员，违反了各该方面的纪律，应在进行思想教育的同时，给以纪律处分。党员的最高纪律处分是开除党籍，党委不能做决定叫党员坐牢。对所属成员实行“隔离反省”，就是拘留，理

应申请公安机关并经过人民检察院批准才行，机关、党委都无权采用。党委如果越权行动，这就违反党章规定。

4. 属于人民群众中的纠纷，如小偷小摸、通奸等应由调解委员会解决。

5. 人民群众的轻微违法，由法院处理。

6. 触犯刑律的，只能由三个机关依照国家法律处理，任何其他机关无权判刑。有权执行法律制裁的人，一定按法律处理；无权的不允许进行这一工作。这几年乱了。

以上六类问题，都不能用专政的方法处理。处理这六类问题的总的原则是：从团结愿望出发，经过批评或者斗争，达到在新的基础上的团结。即使对判刑、受到法律制裁的人，也不能离开这个总的原则。

1至4类问题，三个机关不必插手，可以帮助了解情况，进行说服教育，可能时进行调解，但不能滥用执法机关的权威去压服别人，进行干涉。

5至6类是职责内问题，但也应实事求是处理，分清是非，不要乱捕、乱押、乱办，把小问题当大问题处理，以致内部问题激化。

法律制裁的目的是保护公民权利，维护人民民主制度，巩固人民民主专政。少奇同志说，不能使人民对公安机关有一种阴森森的感觉，要使人民有热烘烘的感觉。所以，三个机关要坚持对敌狠、对己和的原则。向反革命、向敌人、向违法乱纪作斗争，是为了保护人民权利、人民生活、人民民主制度，不是为了制裁而制裁。

三个机关要有自己的规章制度

要不要法律？这是肯定的，当然要。

三个机关要有自己的规章制度，工作要有依据。历史上有
人治与法治之争。但是，人治也要靠规章制度做依据。党有党
章，国有国法，国家必须有法律。而且先有法律，后有国家，
国家不消亡，法律也不会消亡。国家消亡后，人民中的共同纪
律还是要有的，叫不叫法律，那是另外一个问题。法律、法令
是国家的重要工具和手段之一。这几年有些人对要不要法律发
生怀疑，这不对。要使工作走上轨道，没有规矩，不能设想。
问题的实质是：对反革命分子的斗争，用法律好，还是不用法
律好？掌握了政权，不用法律作斗争，是最大的傻瓜。要有
“王法”，否则只能使自己被动。

有人认为，依法办事会束缚自己的手脚，因而习惯于无政
府状态。我们说，只要有法律，就对任何人都有约束；在一个
社会里，不受约束的人是没有的，不受约束的事是没有的，没
有绝对的自由。无论什么人都要依法办事。当然，对敌人的约
束，同对自己的自觉约束，性质是不同的。我们的法律只要是
代表人民利益的，对反革命就是严重的约束，对人民就是保护
的。一些约束条款，是为了有效地同敌人作斗争，是约束国家
机关的工作人员多做好事，不做坏事，少犯错误。少数违法乱
纪分子才会感到碍手碍脚。

列宁说，无产阶级专政是不受法律限制的，是指不受资产
阶级旧法律的限制。在革命取得政权以后而还存在着生死斗争

的一个时期里，不等待制定法律，对反革命，有反抗就进行镇压，这是革命的需要；一旦政权稳定，就必须依靠法律，也就必须制定各种法律，做到有法可依，依法办事。

历史上任何一个高明的统治者，他都知道要依靠法律、运用法律，因此他自己也不可能不受法律的约束。“尧置敢谏之鼓，舜立诽谤之木”，这“鼓”和“木”一定意义上也就是法。至高无上，生杀予夺，一个人说了算，只能行于一时，不能维持长久。终究是要造反的，不能安天下。历史上有的皇帝，为了安抚下心，也不是下罪己诏的吗？“禹汤罪己”成为佳话。实际上，任何社会里，任何人，都要受到若干约束的。在封建社会里有什么击鼓鸣冤、拦轿呈供之类，都是表明允许抱正义感的人的存在，以制裁个别对自己统治不利的人。包公、海瑞、况钟，这些人在过去社会里所以被宣扬，也就是这个道理。唐太宗能强制自己听取魏征的谏言，注意约束自己的行动，这说明是他的高明之处。诸葛亮要求将士“勤攻吾之阙”，也是有为之举。封建统治阶级为了少数人的利益都能约束自己，我们为了多数人的利益难道还不能约束自己？国家是压迫的机器，但它还有调节的作用，不使统治阶级和被统治阶级同归于尽的作用，不使统治阶级内部矛盾不受到抑制和得到疏解的作用。依法办事，就不会发生两面“受敌”的事，像有的省委书记所做的那样，结果是敌人反对，人民也反对。

正常的社会，正常的秩序，一切都应该有法律可遵循而不能有例外。所以，要问法律束缚不束缚群众运动，回答也应该是肯定的，群众运动也必须在法律允许的范围内开展。

关于政策与法律的关系问题

政策与法律，有一致和不一致两种情况。这要看政策是否由法律形式固定下来。如以法律形式固定下来了，则一致，必须遵守，对谁都无例外；如果没有用法律形式固定下来，这就要凭觉悟了，不执行这个政策的话，不能说是违法，如果是党员，就只能在党的范围里、党的章程里来论事，或诉诸党纪。对于群众，他不执行，政策再正确，也只能说服教育，并不发生要用纪律和法律处理的问题。

无产阶级专政和党的领导问题

无产阶级专政，不是党专政，不能使党领导变成党专政。我们党是执政党，是代表无产阶级和全体劳动人民来执政，指导和办理国家大事，实现人民的意志和利益，共产党执政是共产党领导意义内的事情。党也要在法律范围内来行事，受法律的约束。如果使党的领导变成党专政，这样做就会出现几种不好的结果：1. 变成领袖专政，像有的省委书记那样；2. 党可以不听群众的呼声；3. 群众不能议论党的工作。这就势必脱离群众，走向反面。

这就是我在听了少奇同志讲话以后的一些体会。

(1962年6月28日)

邓力群著：
我为少奇同志说些话

真理的声音是 窒息不了的

——驳《〈修养〉的要害
是背叛无产阶级专政》^①

^① 本文先在1980年6月25日《人民日报》上发表，1989年收入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的《刘少奇研究论文集》。

1967年5月，为了给林彪、江青一伙从政治上陷害刘少奇同志制造舆论，他们的吹鼓手写了一篇《〈修养〉的要害是背叛无产阶级专政》的文章，在全国各报刊发表。

1980年2月，党的十一届五中全会一致通过了为刘少奇同志平反昭雪的决定，全部推倒了林彪、江青一伙强加给他的“叛徒、内奸、工贼”等莫须有的罪名，恢复了他作为一位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无产阶级革命家、党和国家主要领导人的名誉。接着，《论共产党员的修养》一书再次重新出版，受到广大党员和人民群众的热诚欢迎。

从1967年到1980年，一共经过了13年。在人类历史上，这是很短暂的，就一个人的一生来说，也不是很长的岁月。如果刘少奇同志不是因为遭到林彪、江青一伙的人身迫害而不幸去世，他是能够亲眼看到自己对党、对人民的无限信任和深切的期望得到实现，能够亲眼看到党的历史上的这个最大冤案得到平反昭雪的。

14年前，林彪、江青一伙利用我们党的错误，逐渐窃取党

和国家的一部分重要权力，使中国的天空乌云滚滚。刘少奇同志和许多老一代无产阶级革命家遭到残酷迫害。林彪、江青一伙的破坏活动刚开始，就受到了老一代革命家、广大干部和群众的抵制。千千万万的人们固然相信，林彪、江青一伙的倒行逆施是长不了的，但当时那种苦难的日子到底什么时候能够结束，即使是革命的乐观主义者，也不可能做出准确的估计。

历史前进的步伐这样快，超过很多人的预料。时间不到5年，把《论共产党员的修养》和它的作者打入地狱，标榜自己“念念不忘无产阶级专政”的林彪，倒真正成了无产阶级专政的叛徒和卖国贼。人们开始感到，黑暗即将过去，光明就在前头。但是，反革命势力不甘心自己的失败，继承林彪衣钵的“四人帮”越来越猖狂，拼命阻挡中国历史的前进。他们的挣扎越是变本加厉，越是表明他们的本质的虚弱，表明他们被埋葬的日子不远了。历史经过一段曲折，发展得更快了。党和人民同林彪、“四人帮”这两个阴谋集团之间的革命和反革命的大决战，终于在1976年10月，以他们的彻底失败而宣告结束，党和人民取得了具有决定意义的不可逆转的伟大历史性胜利。事实又一次证明，我们的党是坚强的，我们的社会主义制度是巩固的，任何敌人采用任何手段都绝对无法摧毁我们。战胜敌人，医治创伤，重新大踏步前进，这是社会主义制度和我们党的无产阶级性质所决定的，它具有不可移易的客观必然性。为刘少奇同志彻底平反，进一步加深了我们对于这一历史辩证法的认识，使我们对无产阶级的伟大事业和光明的前途更加充满信心。

《论共产党员的修养》这部著作和它的作者一道受难，遭到恶毒的攻击、谩骂和诬陷。经过10年的内乱，人们从切身的体验中进一步认识到它的价值和意义。它的真理性，在我们党同林彪、“四人帮”的严酷斗争中，继续得到证明。林彪、“四人帮”的反革命阴谋活动本身，也从反面，为说明这本著作对于我们党的建设的重大意义，提供了新的论据。真理的声音是窒息不了的。它随着历史的前进更加昂扬，更加激励千百万共产党员和亿万人民群众为壮丽的共产主义事业而奋斗。

共产党员要用共产主义的思想体系观察客观形势，决定行动方针

《论共产党员的修养》一书的第五节，概括地阐述了科学社会主义学说。这些阐述是扼要的，也是正确的，既讲了共产主义的美好理想，又讲了实现这个理想的途径和所依靠的力量。这些论述，同马克思主义创始人的学说是一致的。

《〈修养〉的要害是背叛无产阶级专政》避而不谈刘少奇同志关于实现共产主义要经过艰难曲折的过程、要依靠无产阶级和人民群众进行革命斗争的论述，仅仅引用表述共产主义社会理想的一段话，紧接着把这种表述攻击为“一连串的牧师式的祈祷和祝愿”。这显然不是论战中的疏忽，不是理论上的无知，而完全是居心险恶的政治陷害。

这篇文章还说，刘少奇关于共产主义社会思想的表述，同法国和英国的空想社会主义是一路货色。事情果真是这样吗？

这样一个涉及共产党人信仰的重大理论问题和实践问题，是不能不予以澄清的。

马克思主义创始人在论述空想社会主义同科学社会主义的区别时，曾经明确指出：空想社会主义的理论，是和不成熟的资本主义生产状况、不成熟的阶级状况相适应的。它看到并且淋漓尽致地揭露了资本主义社会所固有的弊病，但是不能对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进行科学的说明，只能主张简单地把它当作坏东西抛弃掉。它愈是义愤填膺地反对这种生产方式必然产生的对工人阶级的剥削，就愈是不能明白指出这种剥削是从哪里产生和怎样产生。科学社会主义的理论，是资本主义生产状况、资本主义社会固有矛盾的产物，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斗争进一步发展的产物。它揭露了资本主义社会中社会化生产和资本主义占有之间的矛盾，科学地说明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历史联系及其灭亡的必然性。

空想社会主义把消除资本主义社会的弊病，看作是理性的任务，认为解决社会问题的手段，只是从头脑中臆想出来，其使命就是发明一套新的更完善的社会制度。这种新的社会制度一开始就注定要成为空想，它愈是制定得详细周密，就愈是要陷入纯粹的幻想。科学社会主义不再靠想出一个尽可能完善的社会制度，而是研究必然产生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及其相互斗争的那种历史的经济过程，认为解决冲突的手段不应当从头脑中发明出来，而应当通过头脑从生产的现成物质事实中发现出来。

空想社会主义把实现社会主义的希望，完全寄托于个别天

才人物，认为这种人物一旦出现，人类社会就会免除迷误、痛苦和灾难。他们根本看不到无产阶级的任何历史主动性，看不到无产阶级所特有的任何政治运动和革命斗争。科学社会主义通过分析资本主义制度下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两大阶级的对立和斗争及其发展过程，指出只有无产阶级才是真正革命的阶级，社会主义必然要通过无产阶级和它领导的人民群众的革命斗争得以实现。无产阶级是资本主义社会的掘墓人。资产阶级的灭亡和无产阶级的胜利是同样不可避免的。正如列宁指出的，发现无产阶级是现代社会中唯一彻底革命的阶级，是最先进的阶级，这是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第一块主要的“基石”。

只要对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过程和二者之间的根本区别有所了解，只要对事情的观察采取严肃郑重的态度，就可以明白地看到，刘少奇同志关于科学社会主义的论述，在基本原理上，同空想社会主义没有任何相同的地方，同马克思和恩格斯创立的科学社会主义没有任何不同的地方。

林彪、江青和他们的吹鼓手在所谓“要害”问题的文章发表以后，继续对《论共产党员的修养》进行全国规模的、连篇累牍的讨伐。他们政治上的目的，除了像他们所说的，要把刘少奇打翻在地，再踏上一万只脚以外，就是要糟蹋科学社会主义学说，败坏社会主义的声誉，动摇全体共产党员和全国人民对于共产主义的信念。把这样一个最根本的理论是非搞乱了，他们就可以更加放肆地推行自己那套假社会主义、封建的社会主义和法西斯的社会主义。由于我们的国家生产力不发达，有着封建社会的长期历史，小生产者的思想根深蒂固，以平均主

义为主要特征的农业社会主义思想有深厚的土壤和广泛的影响，广大人民群众文化水平不高，全党的理论准备不够，因此林彪、江青一伙的破坏，确实是很大的。在一个时期内，香的被搞臭了，臭的反而香了，以致使相当多的同志，特别是年轻一代中许多人的思想糊涂了，使得肃清流毒至今还是一个严重的任务。

林彪、江青一伙和他们的吹鼓手在围剿《论共产党员的修养》的时候，制造了一个耸人听闻的罪名，就是“背叛无产阶级专政”。事情的真相到底如何呢？

《论共产党员的修养》的主题，是教育共产党员必须牢固地树立共产主义世界观，其中包括用共产主义的思想体系，观察、处理和解决不同时期的革命任务和斗争形式方面的问题，要求共产党员在客观条件和斗争任务发生各种变化的时候，都能够用共产主义的思想体系指导自己的行动。

《论共产党员的修养》一书中没有出现“无产阶级专政”的字样，在引用列宁的两段话时，也确实没有引其中“无产阶级专政”的词句。从当时我党所处的客观环境和斗争任务、斗争策略来说，这本来是无可非议的。

马克思主义创始人，是在分析资本主义条件下的无产阶级革命、分析从资本主义到共产主义的过渡问题的时候，提出无产阶级专政这一论断的。《论共产党员的修养》发表于1939年。当时，我们党处于新民主主义革命和抗日战争阶段。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对象是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目的是建立各革命阶级联合的民主专政。抗日战争阶段，中华民族和

日本帝国主义之间的矛盾已经上升为主要矛盾，国内的阶级矛盾降到次要地位，党的任务是联合除汉奸卖国贼以外的一切爱国的人民、阶级、阶层、政党、团体，组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打败日本帝国主义，建立新民主主义的中国。我们党和中国人民，当时所面临的，根本不是提出和建立无产阶级专政的问题。毛泽东同志的《新民主主义论》，是对争取我国伟大民主革命胜利起了重要指导作用的理论著作。这部比《论共产党员的修养》晚一年发表的著作，明确指出，在中国当时的历史条件下，不可能也不应当走无产阶级专政的社会主义道路，同时严厉地驳斥了这个问题上的“左”倾空谈和恶意宣传。

共产党和它的党员，当然要在运动的现在想到运动的将来，当然要在民主革命中想到社会主义革命的前景。但是，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是两篇文章，只有先做好第一篇文章，才能做好第二篇文章。正如毛泽东指出的，任何共产党人及其同情者，“如果看不起这个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而对它稍许放松，稍许怠工，稍许表现不忠诚、不热情，不准备付出自己的鲜血和生命。而空谈什么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那就是有意无意地、或多或少地背叛了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就不是一个自觉和忠诚的共产主义者”^①。如果像林彪、江青他们要求的那样，在抗日战争时期，也要不顾当时的历史条件和党的具体任务，不顾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而大讲无产阶级专政，那就不可能有抗日战争的胜利，不可能有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全国胜利，不可能在全国实现人民民主专政（实质上就是无产阶级专政），那

^① 《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059—1061页。

才真正是对无产阶级专政的背叛。

林彪、江青一伙的吹鼓手们在他们的文章中说，《论共产党员的修养》的几个版本，根本不谈抗日战争、不谈抗日战争时期的阶级斗争，根本不谈解放战争、不谈解放战争时期的阶级斗争。

事隔多年，重新发表旧作，根据实践的检验，对旧作的内容进行修改、补充，是常有的事情。但是，无论如何总要尊重历史，不能也不应该把著作写作时期没有发生而只是在后来发生的事情，硬塞进去。怎么能违反这样一个常识，不顾历史的真实，让刘少奇同志在1939年的著作中去谈当时尚未到来的解放战争时期的阶级斗争呢？

至于说《论共产党员的修养》根本不谈抗日战争、不谈抗日战争时期的阶级斗争，则完全是捏造。刘少奇同志是通过十几年来对党内生活、党员状况的观察，提出共产党员的修养问题的。这是抗日战争爆发以后大批新党员所必须解决的一个重大问题，是当时党的建设中的一个重大问题。他在谈到入党的动机问题时明确指出，进步的人们因为共产党坚决抗日，能够拯救中华民族，而要求入党，这并没有错。在当时的革命运动即抗日战争中，成为一个积极的战士，是很好的。他同时又指出，一个共产党员的觉悟不应当停止在这样一个水平。他要求这些同志入党以后努力学习，使自己锻炼成为自觉的共产主义者。共产党员应该用共产主义世界观武装自己，应该把胜利地进行抗日战争，作为实现共产主义远大理想的一个必不可少的步骤。在抗日战争时期，阶级斗争是以民族斗争的形式出现

的。这种形式，表现了阶级斗争和民族斗争的一致性。刘少奇同志正是这样把党的建设问题、党员的修养问题，和抗日战争时期的具体斗争密切地结合起来论述的，把民族斗争和阶级斗争密切地结合起来论述的。

在1962年再版的《论共产党员的修养》中，刘少奇同志特意增加了比较长的篇幅，专门论述上面这些问题。他批评了抗日战争爆发以前党内部分同志反对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使无产阶级和它的政党孤立起来的关门主义和宗派主义的倾向，又批评了抗日战争爆发以后党内部分同志反对党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坚持独立自主的政策，使无产阶级成为资产阶级的附庸和尾巴的迁就主义、投降主义的倾向。他指出，这种“左”的错误和右的错误，都是在政治形势发生重大变化的时候，不能坚定地用共产主义思想体系确定革命事业发展的正确道路的显著例证，都是不能正确处理民族斗争和阶级斗争的关系问题的突出表现。

他说，共产党和它的党员必须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在不同的斗争条件下，正确地解决如何革命、如何斗争的问题，才能争得革命的胜利，实现共产主义的最高理想。在进行革命斗争的时候，依靠谁、团结谁、打倒谁的问题；谁是直接的同盟军、谁是间接的同盟军、谁是主要敌人、谁是次要敌人的问题；联合一切可能联合的同盟军，在一定条件下甚至联合次要的敌人，去打倒主要的敌人的问题；在情况发生变化，需要走迂回曲折道路的时候，及时地改变战略和策略，确定对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最有利的方针政策等问题，都必须运用共产主义的

思想体系，运用共产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求得正确的解决。一方面，无产阶级和它的政党在进行斗争的时候，必须同广大劳动人民建立密切的联系，同各革命阶级和革命党派建立革命联盟，领导广大劳动群众和一切同盟者同自己一道前进；必须代表广大劳动人民的利益，代表一切革命者的利益，代表本国各民族人民的利益，也就是说要代表在本国人口中占百分之九十几以上的人民的利益。另一方面，无产阶级和它的政党在进行革命斗争的时候，不但要同地主阶级、资产阶级分清界限，而且要同小资产阶级的革命民主派分清界限，也要同其他劳动群众有所区别；要在革命斗争中始终坚持自己的独立性，不受资产阶级和其他非无产阶级的各种影响；要在革命发展的每个阶段，把局部利益和整体利益结合起来，把当前利益和长远利益结合起来。

毛泽东同志 1941 年在《〈农村调查〉的序言和跋》中说：“中国共产党是在复杂的环境中工作，每个党员，特别是干部，必须锻炼自己成为懂得马克思主义策略的战士，片面地简单地看问题，是无法使革命胜利的。”^①他提醒我们，要严肃地、坚决地保持共产党员的共产主义的纯洁性，同时又要严肃地、坚决地执行党适应当时情况所制定的各项具体政策。既不能因为保持共产党员的共产主义的纯洁性而拒绝执行这些具体政策，其中包括保护抗日战争时期社会经济中有益的资本主义成分，使其有一个适当发展的政策，也不能因为执行这些具体政策，接受由于社会经济中资本主义成分的适当发展而带来的资本主

^① 《毛泽东选集》第 3 卷，人民出版社 1991 年版，第 793 页。

义思想的影响，丧失共产党员的共产主义的纯洁性。

这些论述，和刘少奇同志把当时的国内阶级斗争问题和反对日本侵略者的民族斗争问题密切结合起来的论述，在根本上是一致的。尽管侧重点有所不同，但都是运用马克思主义的辩证法论述抗日战争时期党的战略策略问题、阶级斗争问题，是把无产阶级的原则的坚定性和策略的灵活性结合起来的范例。不正是因为这样做了，中国无产阶级和中国共产党所领导的革命力量，才得到了前所未有的、蓬蓬勃勃的发展吗？才保证了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吗？如果像林彪、江青及其吹鼓手要求的那样，离开抗日战争时期的历史条件，无视当时中国革命的民族民主革命性质，无视当时阶级力量组合的具体情况，把民族斗争和阶级斗争割裂开来，孤立地、抽象地谈阶级斗争，那就势必导致整个民族解放事业的毁灭，势必导致整个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毁灭，那才真正是对马克思主义阶级斗争学说的背叛。

在任何情况下，共产党员都要保持共产主义的坚定信念

《论共产党员的修养》一书要求共产党员在革命发展的不同时期，都积极参加当时的实际斗争，反复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加深对社会发展规律的认识，树立共产主义的坚定信念。

刘少奇同志指出，马克思列宁主义是关于人类社会发 展规律的科学，是无产阶级革命的科学，是工人阶级建设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科学。共产党员必须联系革命实践去学习它、运

用它、掌握它。只有这样，才能够了解周围事变的内部联系，了解各阶级在目前和将来如何行进和向哪里行进；才能够具备确定行动方针的能力，对革命运动的前途充满信心。共产主义的远大理想一定能够实现，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对此已经做了科学的、无可怀疑的说明，国际无产阶级的革命实践也已经提供了事实上的说明。我们有广大的人民群众做依靠，完全有信心在我们这一代完成共产主义事业中的一段大工程，同时也完全相信我们的后代能够完满地完成这个伟大事业的全部工程。

刘少奇同志还要求每个共产党员清醒地认识到，在人类社会走向共产主义的过程中，不可避免地会遇到各种困难。强大的敌人要反对我们。剥削阶级的影响会增加我们在斗争中的负担。由于对客观情况的把握和实践经验的积累需要一个过程，我们自己在确定政策、进行斗争的时候，也会发生各种各样的错误，甚至是严重的错误。这样，在革命的发展过程中，就难免遇到挫折和失败。而对这种挫折和失败，是对共产主义事业丧失信心，发生动摇，还是继续坚信共产主义必然胜利，并且在艰苦的环境中不屈不挠地进行斗争，这是对每一个共产党员的严峻考验。

每个共产党员在入党的时候，都曾经宣誓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终生。把自己的整个生命献给共产主义事业，在任何情况下都绝不能停顿脚步。

革命战争年代，在遭受敌人严重打击的情况下，我们党和它的优秀党员没有被敌人所吓倒、所征服。他们从地下爬起来，揩干净身上的血迹，掩埋好同伴的尸首，踏着先烈的脚

步，高举革命的旗帜，英勇顽强地坚持斗争。取得全国政权以后，在社会主义事业遭到严重破坏的情况下，他们也没有被困难所吓倒、所征服。他们打掉牙齿连血吞，硬着头皮顶住，切实地总结经验教训，严肃地进行自我批评，咬紧牙关，埋头苦干，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正是因为有了我们这样的党、这样的优秀党员，正是因为他们在任何情况下都相信共产主义理想一定要实现，正义的事业一定要胜利，新生的力量是不可战胜的。所以在敌人认为我们就要灭亡的时候，我们却转败为胜了；在常人看来我们陷入无法克服的困难的时候，我们却熬过来了，并且打开了新的局面，重新走上顺利发展的道路。

毛泽东同志说得好：“我们共产党人是以不怕困难著名的。我们在战术上必须重视一切困难。对于每一个具体的困难，我们都要采取认真对待的态度，创造必要的条件，讲究对付的方法，一个一个地、一批一批地将它们克服下去。根据我们几十年的经验，我们遇到的每一个困难，果然都被克服下去了。种种困难，遇到共产党人，它们就只好退却，真是‘高山也要低头，河水也要让路’。”^①

20世纪50年代末和60年代初期，我们国家出现了暂时的经济困难。党中央领导全党和全国人民，坚决执行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方针，进行了艰苦卓绝的努力。为着提高全党同志战胜困难的勇气和信心，克服主观主义等错误思想和不正之风，改进领导方法和工作方法，改善党员和人民群众的关系，应党内很多同志的要求，《论共产党员的修养》经过修订、

^① 《毛泽东文集》第6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392—393页。

补充重新出版。这对于全党同志和全国人民团结一致地渡过难关，把社会主义事业继续推向前进，发挥了积极的作用。

当前，我们的国家已经进入新的历史发展时期。党的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路线、政治路线和组织路线，正在全国贯彻执行。举国上下安定团结，社会主义民主得到发扬，社会主义法制逐步健全，各族人民齐心协力地从事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但是，经济生活、社会生活中还存在许多问题，党的优良传统的作用遭到破坏，官僚主义、特权思想、家长作风在一些人身上有所滋长，以致许多困难还横亘在我们的面前。有些人对共产主义的信念发生动摇的问题，又以新的形式出现了。它集中表现为不同程度地怀疑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

现在二十多岁的青年，在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得到较好发挥的时候，他们还不懂事。在他们开始懂事以后，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正在遭受林彪、“四人帮”的严重破坏。因此，他们中间的一部分人，对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表示怀疑，未能树立起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信念。这是可以理解的。只要共产党员真正发挥模范带头作用，从各方面把工作做好，他们中大多数人的怀疑是会逐步消除的。值得引起重视的是，我们的共产党员中，有一些同志在经历了十年“文革”之后，也对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发生了怀疑，甚至共产主义的信念也有所动摇。

形势好的时候，信心就很足，形势不好的时候，信心就发生动摇；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得到发挥的时候，就相信社会主义制度，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发挥受到挫折、受到破坏的

时候，就对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表示怀疑。如果一个共产党员，特别是担负一定领导职务的党的干部陷入这样一种精神状态，那是很不好的。他应该认真考虑一下，是不是违背了自己入党时的誓言。别的同志也应该以高度负责的态度，帮助他摆脱这种精神状态。共产党员的品格之所以可贵，固然要表现在形势好的时候干劲十足，想干得更好一点；尤其要表现在，遇到困难、遇到挫折，甚至遭到失败的时候，仍然不屈不挠地、坚韧不拔地为党工作，仍然坚信共产主义事业一定胜利。我国的社会主义制度曾经遭到林彪、“四人帮”的破坏，这当然是很痛心的事。作为一个有坚定信念的共产党员，看到这样的破坏，不应当有别的选择，只能下定决心，排除这种破坏，通过我们的奋斗和工作，使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重新发挥出来，而且发挥得更好。

共产党员对共产主义的坚定信念，要在任何艰难困苦的条件下都毫不动摇。而且，在人们中对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发生怀疑的时候，共产党员不仅要始终用共产党员的标准严于律己，而且要有理有据和耐心细致地进行解释、说服、教育工作。尤其是要在那些攻击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议论、思想像恶浪一样袭来的时候，要能够挺身而出，理直气壮地和这种思潮进行斗争，不怕骂，不怕压，不怕讥笑嘲讽。应该相信，真理属于我们，未来属于我们。在历史的进程中，经过切实有效的工作，曾经不同程度地对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发生怀疑的人们，都会心悦诚服地改变不正确的观点。

近来，社会上有一些人说，社会主义不如资本主义，说什

么社会主义什么都不好，资本主义什么都好。事情是不是这样呢？资本主义国家中一切先进的科学技术，一切好的经济管理办法，归根到底，都是那里从事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的人民群众的劳动结晶。我们没有理由拒绝向自己的阶级兄弟和国外友人虚心学习。应该努力地学，有成效地学。科学是人类共同财富，科学无国界，一切先进的科学技术，一切科学的管理方法，我们都没有理由不引进。我们不能闭关锁国，凡事都自己从头做起。经济落后的国家和地区，要赶上经济发达的国家和地区，必须把先进的科学技术“拿来”，只有真正的昏人才执拗地同这条定律作对。但是，任何一个有民族自尊心的人、有正派品格的人，都应该而且能够看到资本主义毕竟还是资本主义，应该而且能够看到它的剥削本质以及由此带来的各种社会弊端。对于资产阶级的腐朽生活方式，应该鄙视，不应该欣赏，应该像防止病菌一样防止它的传染和毒害，不应该把它奉若神明加以皈依。任何一个有国格的中国公民，都不应该向这些丑恶的东西顶礼膜拜。

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揭露资本家的贪婪的本性时说：“作为资本家，他只是人格化的资本。他的灵魂就是资本的灵魂。而资本只有一种生活本能，这就是增殖自身，获取剩余价值，用自己的不变部分即生产资料吮吸尽可能多的剩余劳动。资本是死劳动，它像吸血鬼一样，只有吮吸活劳动才有生命，吮吸的活劳动越多，它的生命就越旺盛”。^①资产阶级使人和人之间除了赤裸裸的利害关系即冷酷无情的“现金交易”之外，再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260页。

也找不到任何别的联系，把一切都淹没在利己主义打算的冰水之中。我们的共产党员，不正是因为看透了资本主义的腐朽本质，为了争取共产主义的美妙将来，才参加共产党的吗？怎么能够因为一段时期内，资本主义的生产发展比我们快一点，那里的生活比我们好一点，就丧失共产党员的自信心和自尊心，而跟在那些怀疑社会主义制度的人的屁股后面走呢？怎么能够丝毫削弱、动摇我们同资本主义制度带来的一切丑恶现象实行彻底决裂的原则立场呢？

社会主义制度和资本主义制度的本质区别是什么呢？社会主义制度比资本主义制度优越的根本点是什么呢？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创始人在他们的著作中，已经对此做出了无可辩驳的论证；我国几亿人民为社会主义事业而斗争的实践，也已经从各方面对此做出了明确的回答。

社会主义生产的目的是最大限度地满足整个社会经常增长的物质和文化生活的需要。资本主义生产的目的是取得利润，至于劳动者的消费，只有在保证资本家阶级取得利润这一任务的限度内，才是它所需要的。邓小平同志今年（1980年）1月16日在《目前的形势和任务》的报告中说：“因为我们这里没有剥削阶级，没有剥削制度，国民总收入完全用之于整个社会，相当一大部分直接分配给人民。他们那里贫富悬殊很大，大多财富是在资本家手上。”^①有个材料说，美国大大小小的企业共有1297.8万多个，其中股票上了证券市场的大公司有4万多家，最大的公司只有1500家左右。小企业有1000

^① 《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259页。

万个左右，占全国厂商的 97%，但生产总值只占全国国民生产总值的 30%。从利润看，1500 家大公司的利润占了全部企业利润的 90%。这个材料证明，邓小平同志的论断是完全正确的。我们社会里有贪污分子，有搞特殊化的人。我们必须同这类现象进行坚决的斗争，不能因为他们人数极少，就忽略这种恶劣现象给社会主义事业带来的严重危害。就我国这两年的情况来说，农村情况明显地越来越好，8 亿农民的生活不同程度地有了改善。将近 1 亿有工资收入的职工，其中 7000 万人由于提高工资级别和得到奖金，收入增加了；一千几百万人实际收入有的增加不多，有的没有增加，有的甚至降低了。党和国家正在研究、制订措施，以便有步骤地、妥善地解决这个问题。这些都是我国社会生活中有目共睹的基本事实。我们的工资水平确实比较低。但是，职工家庭就业人数比较多，去年一年城镇就安排了七八百万人就业，基本生活资料的价格比较便宜。国家提供粮食、副食等物价补贴和房租补贴，还有劳动保护、公费医疗及社会消费和其他集体福利，等等。平均算起来，这笔钱分摊到每个职工身上，接近于他们平均工资的数目。仅粮食、副食补贴一项，每年国家支付接近于 200 亿元，每年每个职工平均约 200 元。所以，计算我国职工的生活水平，不能只看到工资收入多少，还要考虑到这个重要事实。

社会主义制度的主要特征，是生产资料私有制为生产资料公有制所代替，是消灭剥削，是实行按劳分配。这是社会主义制度比资本主义制度优越的根本点。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国家、集体、个人之间也存在矛盾。由于公有制的确立，由于公

有制在整个国民经济中占绝对优势，这些矛盾可以得到妥善解决。全社会的人民具有共同的利益，在共同利益的基础上，我们有共同的理想和信念，共同的道德标准，共同的领导，共同的纪律，共同的行动。这是任何剥削制度所不可能具有的。社会主义制度有一个产生、发展和逐渐完善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出现这样那样的问题，是不可避免的。但是，这些特征和根本点，是社会主义制度下所出现的各种问题，可以经过社会主义制度本身不断地得到解决。这也是任何剥削制度所无可比拟的。

共产党员不仅要在艰难困苦的情况下，坚持共产主义信念。在革命取得巨大胜利、自己的工作取得很大成绩的时候，同样要坚持共产主义信念。因此而自满自足、不求进步，也是共产主义信念不坚定的一种表现。刘少奇同志说，共产党员是不能有任何的自满和骄傲的。即使我们的工作获得了很大的成绩，然而拿它同整个共产主义事业比较起来，又到底有多大？这对于具有共产主义世界观的人说来，是不值得骄傲的。建国前夕，毛泽东同志在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上曾经指出：“夺取全国胜利，这只是万里长征走完了第一步。如果这一步也值得骄傲，那是比较渺小的，更值得骄傲的还在后头。”他又说：“可能有这样一些共产党人，他们是不曾被拿枪的敌人征服过的，他们在这些敌人面前不愧英雄的称号；但是经不起人们用糖衣裹着的炮弹的攻击，他们在糖弹面前要打败仗。”^①事实上，我们党曾经有过由于取得巨大胜利而发生骄傲，使革命事业和建

^① 《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438页。

设事业遭到挫折的教训，也有一些由于取得成绩而发生骄傲，被糖衣裹着的炮弹打中的党员。我们必须清醒地看到，每一项革命和建设成功，只是为共产主义大厦增添了一砖一瓦。每一个共产党员，即使是杰出的共产党员的贡献，也只是尽了自己应尽的义务。增添了一砖一瓦，尽了自己的义务，就忘记了共产主义的远大理想，这也不配称为坚贞不渝的共产主义者。

总之，不论是成功还是失败，不论是顺利还是挫折，每个共产党员都必须始终具有共产主义的坚定信念。只有这样，才能成为真正合格的共产党员，成为终身为共产主义事业而奋斗的战士。作这样一个共产党员，不是很难吗？确实是很难很难的。可是，我们不正是因为想到这是很难很难的，而且清醒地懂得要实现共产主义就必须具有这样的品格，必要的时候还准备牺牲自己的生命，才决心加入共产党的吗？

共产党员要努力培养共产主义的道德品质和高尚人格

《论共产党员的修养》一书，用主要的篇幅论述了共产党员的思想意识修养问题，这实际上也就是在共产主义世界观的指导下培养共产主义道德的问题。

刘少奇同志指出，共产主义道德，不是建筑在保护个人和少数剥削者的利益的基础上，而是建筑在无产阶级和广大劳动人民的利益的基础上，建筑在最后解放全人类、拯救世界脱离资本主义灾难、建设幸福美丽的共产主义世界的利益的基础上，建筑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科学社会主义的理论基础上。无

产阶级解放的利益，人类解放的利益，共产主义的利益，社会发展的利益，就是共产党的利益。党的利益高于一切，是共产党员思想行动的最高原则，也是共产党员在处理人与人之间关系时应该遵守的共产主义道德规范。

刘少奇同志要求共产党员按照上述最高原则和道德规范，正确处理个人同党的关系、党内同志之间的关系、党员和人民群众的关系以及敌我之间的关系。

就党员同党的关系来说，党员个人利益必须无条件地服从党的利益。一个共产党员，在任何时候、任何问题上，都应该首先想到党的整体利益，都要把党的利益摆在前面，把个人利益、个人问题摆在服从的地位，在个人利益同党的利益不一致的时候，能够毫不踌躇、毫不勉强地服从党的利益，在必要的时候甚至牺牲自己的生命也在所不惜。党员除了为党的利益而奋斗这个目的以外，不应该有违反党的利益的个人地位、个人名誉、个人英雄主义以及其他个人打算等目的。共产党员要在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的过程中，提高自己的能力和本领，但是不能离开党的事业的发展，去争取个人的独立发展。党员的个人利益，应该溶化在党和无产阶级的整体利益和目的之中。党员不应该什么都只顾自己，到处向党提出一大堆私人要求，责备党没有抬举和奖励他，而只能不断提高自己的觉悟，不断加深自己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了解，努力前进，勇敢奋斗，对党对革命作出更多的贡献。

就党内同志之间的关系来说，共产党员都是由共产主义的伟大事业联系在一起的亲密战友。共产党员对于自己的同志，

必须怀有忠诚热爱的感情，满腔热情地帮助同志，平等相处，决不为自己的利益而损害同志。要吃苦在前，享受在后，不同别人计较待遇的优劣，而同别人比较革命工作的多少和艰苦奋斗的精神。在危险时要挺身而出，在患难中要同舟共济。要为同志的成绩衷心高兴，决不想方设法把走在自己前面的人拉下来。对同志的缺点和错误诚恳地进行帮助，决不幸灾乐祸，落井下石。不畏惧别人对自己的批评，也能够勇敢地、诚恳地批评别人。不在背后无原则地议论同志，说同志的坏话，也不为别的人不负责任的议论所牵动和刺激。不吹捧任何人，也鄙视别人对自己的奉承、阿谀和献媚。为了党和革命的利益，对待同志最能宽大和“委曲求全”，甚至在必要时能够忍受各种误解和屈辱而毫无“怨恨之心”，能够“以德报怨”，毫无报复之心。决不在党内拨弄是非，不用阴谋伎俩离间同志间的关系。决不蓄意制造党内矛盾，在党内搜索斗争对象，并且滥用组织手段以及党外斗争手段惩罚自己的同志。有坚定的原则立场，不在原则上做任何让步，不允许自己和别人对党的利益有任何损害。

就党员和人民群众的关系来说，共产党员是人民群众利益的最忠诚的代表者，全心全意地为绝大多数人谋利益。在共产党员看来，为任何个人或少数人的利益而牺牲，是最不值得、最不应该的，为阶级、为民族、为人类解放而牺牲，是最值得、最应该的。他们极关心自己阶级和世界全体劳动人民的痛苦和困难的境遇，关心每一个地方劳动者的解放斗争及其胜利和失败，认为不论哪一个地方劳动者解放斗争的胜利和失败，

就是他们自己的胜利和失败；认为对于任何劳动者和被压迫者的解放斗争，采取漠不关心的态度是错误的，采取幸灾乐祸的态度是犯罪的。共产党员对人民具有伟大而忠诚的友爱、热情和同情心，具有伟大的互助精神、牢固的团结精神、真正的平等精神。他们根本反对任何人有任何特权，认为自己不应该有任何特权的思想，认为在人民内部居于特权地位，对于自己来说，是不可思议的，是一种侮辱。共产党员坚信无产阶级和人民群众具有伟大的创造力，能够在前进的道路上击败各种敌人，克服各种障碍，创建自己的新世界。

就敌我之间的关系来说，共产党员在对敌斗争中应该是有勇有谋的战士。他们懂得，一切剥削者和压迫者，把世界上绝大多数人剥削和压迫到不能生存的境地，使得被剥削、被压迫的人民群众，非联合起来反抗这种剥削和压迫就不能生存和发展。剥削阶级的长期统治，在人类社会造成了各种落后、愚昧、自私自利、尔虞我诈、互相损害、互相残杀等现象，也毒害了被剥削阶级的群众和社会中人们的思想。共产党员要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锐利武器，揭露剥削制度和剥削阶级的本质，并且根据劳动人民的切身经验，进行革命宣传，增强群众实现当前斗争纲领的决心，坚定他们为共产主义事业而斗争的信念。他们勇于斗争，善于斗争，不为任何强敌所吓倒，不受剥削阶级思想的影响，始终保持“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革命坚定性和革命气节。

共产党员要在处理和调整上述各种关系中，培养共产主义的高尚人格，而具备了这种高尚人格，也就能够更好地处理上

述各种关系。那么，这种共产主义的高尚人格，主要是指些什么呢？

刘少奇同志告诉我们，共产党员要大公无私，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为了追求真理，维护真理，在必要的时候牺牲自己的一切，杀身成仁，舍生取义；对人民、对同志具有很高的同情心，能够“将心比心”，设身处地为他们着想，襟怀坦白，光明磊落，在党内“事无不可对人言”，不做亏心事；为了党的事业顽强奋斗，勤勤恳恳，艰苦朴素，谦虚谨慎，不居功自傲，不沽名钓誉，不盛气凌人；刻苦学习，自强不息，不断提高自己的理论水平和工作能力；有高度的自尊心、自爱心，既不同人家拉拉扯扯，也不接受人家的吹吹拍拍，既不投机取巧、见风转舵，也不固执己见、刚愎自用；等等。总之，共产党员要在自己身上培育最伟大、最高尚的美德。

《论共产党员的修养》还用专门的章节，列举了在处理个人同党的关系、党内同志之间的关系、党员和人民群众的关系以及敌我关系问题上，违背共产主义道德规范和行为准则的种种表现。这就是怀着各色各样的个人的目的和动机来到党内，又不接受党的教育；在处理问题时，处处表现出浓厚的个人主义和自私自利的思想；自高自大，个人英雄主义、风头主义、小气，计较小事，不识大体；小资产阶级的急性病、动摇性，流氓无产者和某些破产农民的破坏性；少数同志甚至存在浓厚的剥削阶级意识；等等。少奇同志对这些错误的思想和行为，进行了具体的分析和深刻的批判。

《论共产党员的修养》关于共产主义道德规范和行为准则的论述，关于共产党员高尚人格的描绘，以及各种错误思想的举例，不是作者臆造出来的，而是对党内生活和党员表现进行长期观察的结果。书中所说的共产党员应该遵守的道德规范和行为准则、应该具有的高尚人格，是我们党领导的革命斗争和整个共产主义事业所需要的，也是我们党内许多同志多年来身体力行的。光荣牺牲的无数先烈，具备着这样的道德品质。现在还奋斗在各条战线上的许多优秀共产党员，也具备着这样的道德品质。他们是全体共产党员进行共产主义道德修养的楷模。人皆可以为尧舜。这样的楷模，不是可望而不可即的，他们的高尚品德，是应该学习、也完全可以学习到的。事实上，我们有一些同志，原先曾经有过这样那样的毛病，在党的教育下，经过自己的锻炼和修养，也先后成为优秀的共产主义战士。

重新学习《论共产党员的修养》，可以使我们进一步理解、宣传共产主义道德，批评各种违反共产主义道德的表现，有助于形成一种党内的舆论、整个社会的舆论，使大家都知道什么是好党员，什么是不好的党员，使大家学习有榜样，对照有镜子，都来表扬、学习和推广合乎共产主义道德的行为，批评、谴责和抵制各种背离共产主义道德的行为，在党内、在社会中提倡正气，反对邪气。这种党内的舆论、社会的舆论，反映了党和人民对共产党员行为的要求，在客观上是对共产党员的一种约束的力量。无视这种约束，就要受到舆论的谴责。它促使我们党成为一个革命的大熔炉，能够造就越来越多的目标明确、意志坚强、道德高尚的共产党员，也能够使经不起锻炼的

意志薄弱、道德败坏的人们，被排除、淘汰出去。在共产党员中，不仅需要进行党纪国法的教育而且要进一步确立共产主义道德规范和行为准则。我们党主要不是靠对党员进行纪律处分，更不是靠法律制裁，而是靠共产党员道德上的榜样力量，形成了自己的优良作风和优良传统，提高了党在人民群众中的声誉和威望。这是我们力量的源泉之一。这种共产主义道德所产生的无形的、巨大的力量，在我们战胜各种强大敌人和克服各种艰难险阻的斗争中，具有无法估计的作用。

“文化大革命”中，林彪、江青一伙利用自己窃夺的一部分权力，通过自己的宣传活动和所作所为，在道德观上，对真与假、善与恶、美与丑来了一个大颠倒，把党内生活和社会生活中人与人之间的正常关系搞乱了，把党员同党的关系、领导同被领导的关系、党内同志之间的关系、党员同人民群众的关系、人民群众内部的关系统统搞乱了。他们损害党在人民群众中的声誉和威望，丑化共产党员的形象，对我国社会主义事业造成了极其严重的危害。他们宣扬和实行的那一套，完全有悖于共产党员的为人的道德，完全有悖于每一个正直的中国人的为人的道德。肃清这种反动腐朽的道德，恢复和发扬我们党的长期革命实践中所形成的好的党风，是摆在我们面前的一项重要任务。

共产党员要在实践中自觉进行自我修养、自我教育、自我改造

刘少奇同志是唯心主义的毫不留情的批判者。他始终是在

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坚实基础上，论述共产党员的思想意识、道德品质的修养问题的。

他明确指出，中国古代许多人的所谓修养，大多是唯心的、形式的、抽象的、脱离社会实践的东西。他们片面夸大主观的作用，以为只要保持他们抽象的“善良之心”，就可以改变现实，改变社会和改变自己。这当然是虚妄的。他尖锐地批判了旧社会教育和学习中留给我们的最大祸害之一——理论和实际的脱离，有力地鞭挞了剥削阶级及其卫道士们满口仁义道德、实际上男盗女娼的行为，指出他们的目的是升官发财，用所谓“圣贤之道”去压迫被剥削者，用满口仁义道德去欺骗人民。共产党员要学习马列主义，要学习历史上一切优秀遗产，而决不能采取剥削阶级的虚伪态度。他要共产党员高度警惕旧社会的这种遗毒，保持无产阶级革命家的忠诚纯洁，不能欺骗自己，不能欺骗人民，也不能欺骗古人。

刘少奇同志在论述共产主义道德时，引用了一些中国古代关于道德修养方面的语言。他运用无产阶级的立场、观点、方法，对这些概念进行了改造，赋予了新的含义，使它适合于人民革命利益的需要。这绝不是无批判地、无原则地全盘接受，更不是林彪、“四人帮”所诬陷的什么宣扬封建主义的“孔孟之道”，而是具体地表明了对待古代文化遗产的马克思主义态度。

我们是革命的彻底的唯物主义者。我们共产党员的修养，不能脱离革命的实践，不能脱离广大劳动群众的、特别是无产阶级的实际革命运动。共产党员必须经过长期革命斗争的锻

炼，必须在广大群众的革命斗争中，在各种艰难困苦的境遇中，去锻炼自己，总结实践的经验，加强自己的修养，提高自己的思想能力。《论共产党员的修养》的1939年版写道，共产党员要在和反革命进行各方面的斗争中来改造自己，即是求得自己的进步，提高自己的革命品质与技能等。共产党员的修养，是革命的修养。这种修养的目的，唯一的又是为了革命的实践，为了更有效地去指导群众的实际革命运动。1962年这部著作重新发表的时候，第三部分的标题改为《共产党员的修养和群众革命实践》，更加集中地阐述了二者的关系。

《论共产党员的修养》1962年版的第四节，标题为《理论学习和思想意识修养是统一的》。文中指出，共产党员不但要在革命的实践中改造自己，锻炼自己的无产阶级思想意识，而且要在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的过程中改造自己，锻炼自己的无产阶级思想意识。作者一方面批评了党员中认为只要自己家庭出身好、本人成分好、革命坚决、斗争勇敢就用不着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的错误，另一方面又批评了党员中不是用马克思列宁主义原则批判自己思想意识中的旧东西，而是企图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变为达到个人目的的工具，甚至用自己的成见去歪曲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错误。他明确指出，一个共产党员如果不努力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和方法，如果不用马克思列宁主义指导自己的思想和行动，要在一切革命斗争中坚持无产阶级的立场，体现无产阶级的思想意识和道德品质，也是不可能的。

总之，刘少奇同志要求我们坚持理论和实际相结合的原

则，进行自我修养、自我教育、自我改造。我们共产党员的这种修养方法，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修养方法，它和脱离人民群众革命实践、脱离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理论的修养方法，是完全不同的。

《论共产党员的修养》向我们提出一个很有启发性的问题。这就是，许多共产党员在大体一样的环境和条件下，参加革命实践，接受党的教育，学习革命理论，可是结果却大不相同。由于个人主观努力的不同，有的进步很快，有的进步很慢，有的甚至落后了。其中举了一些共产党员参加某种群众革命斗争、参加万里长征的例子，也举了一些共产党员在学校受教育和训练的例子。我们每个人也经常看到很多类似的例子。同样从逆境中走过来的共产党员，由于党性修养的不同，结果也不相同。例如，同样经历了“文化大革命”，甚至同样被打成“走资派”，同样“关牛棚”、被批斗，受到林彪、“四人帮”的迫害，粉碎“四人帮”以后，特别是全党工作着重点转换以后，精神状态却大不一样。很多老共产党员从党的利益出发，认真总结十年“文革”的经验教训，觉得年纪已经五六十岁了，为党工作的时候不多了，决心抓紧有限的岁月，更加振奋革命精神，加倍为党为人民做更多的工作，来弥补由于林彪、“四人帮”的迫害，使自己多年未能工作造成的损失。也有个别老共产党员，精神状态却不是这样。他们也认为自己的有生之年不多了，但他们的革命意志消沉，从个人利益出发，热衷于追求生活享受，不仅要使自己的生活上加好，而且要为子女过优裕生活做“长期打算”，甚至纵容子女为非作歹，为此而不

顾党纪国法，谋取制度规定以外的私利，谋取职务权限以外的特权。

刘少奇同志在《论共产党员的修养》一书中指出，我们的党员由于原来的社会出身不同，所受的社会影响不同，因而就有不同的品质。他们对待革命实践各有不同的态度、立场和认识，所以在革命实践中各有不同的发展方向。当然不是说，所有这些不同，都是由于社会上对抗的阶级之间的斗争而产生的；更不是说，这些不同本身就都是阶级斗争。产生这些不同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复杂的。刘少奇同志是经过反复的观察，做了深入的分析，经过抽象，把最重要、最根本的原因指了出来。

一个共产党员，如果头脑中有了非无产阶级思想而又不去改正，那就不可能在改造客观世界的过程中，如实地反映客观世界的本来面目，就不能有效地抵制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的经常不断的侵蚀，就不能很好地处理个人同集体的关系。相反，如果自觉地进行思想意识、道德品质的锻炼与修养，自觉地清除自己头脑中的非无产阶级思想，那就会在反映客观世界的面目、抵制外界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的侵蚀和处理个人与集体的关系上，采取正确的态度，取得良好的结果。

我们的社会主义，是从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旧中国脱胎而来的。现在存在资本主义思想的影响，封建主义的、小生产的思想及其影响更加根深蒂固。中国资本主义很不发展，发展起来的东西也受封建主义的影响，具有封建性。无产阶级思想同非无产阶级思想的矛盾和斗争，主要是同封建主义思想、小生产

的习惯势力的矛盾和斗争，会在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经常地表现出来。毛泽东同志曾经引用古人“水至清则无鱼，人至察则无徒”的话，来说明社会现象是复杂的，世界上没有纯而又纯的事物；同样，党的队伍、党员的思想也不可能纯而又纯。由于出身、经历、社会环境的不同，由于进行思想意识修养的自觉性不同，党内同志的思想状况，每个同志个人的思想状况，也是不同的。究竟是承认还是不承认我们的共产党员中有不同思想意识、道德品质的差别，每个共产党员的头脑中有无产阶级思想和非无产阶级思想的矛盾呢？不承认是不合乎实际的。采取承认的态度不仅合乎实际，而且完全必要。它给我们党和每个党员提出一个严重的任务，就是必须在改造客观世界的过程中努力改造主观世界。

刘少奇同志说，我们共产党员应该用无产阶级的意识克服各种非无产阶级的意识，用共产主义的世界观克服各种非共产主义的世界观，用党的、革命的、无产阶级和人类解放的一般利益和目的的思想克服个人主义的思想。如果结局不是这样的话，就是后者压倒前者，那么他就会落后，以至失去共产党员的资格。这是一种可怕的危险的结局。

共产党员要避免这种可怕的危险的结局，要在革命斗争中逐步成长起来，都离不开党的教育、同志的帮助、群众的监督。但是，这种教育、帮助和监督能否起作用，起的作用是大还是小，从根本上说还是取决于共产党员自己主观上的努力。要靠经常用自我修养、自我教育、自我改造的方法，来培养自己的共产主义道德品质和高尚人格。要通过这种方法，学

会用共产主义的道德规范和行为准则来区别是与非、好与坏、真与假、善与恶、美与丑，形成自己高尚的内在信念，形成自我克制、自我约束的能力，随时警惕和克服各种错误思想和不良道德行为的影响。用这样的信念，这样的能力，支配自己的言论、行动，自觉调整党内生活和社会生活中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这样，才能使自己真正成为毛泽东同志所说的那种高尚的人、纯粹的人、有道德的人、脱离了低级趣味的人、有益于人民的人。

自我修养、自我教育、自我改造，在我们党的生活中，通常的说法，就是自我批评。一个共产党员，在他为党工作的一生中，是自觉地还是被迫地、是认真地还是敷衍地进行自我批评，对他共产主义道德和高尚人格的培养是关系很大的，对他为党工作有无成绩和成绩大小也是关系很大的。人总要犯错误，不犯错误的人是没有的。犯了错误，真正认识了，就有进步的希望，就是进步的起点；一次又一次地切实改正，人也就一步一步地前进，日益成长起来。

例如，不能否认，每个共产党员的头脑中都程度不同地会存在非无产阶级思想的影响。自觉地检查、克服这种影响，思想意识和道德品质就会一天天有所进步。如果不仅自己不努力克服这种影响，反而用自己的言论、行动扩大这种影响，用自己头脑中的非无产阶级思想意识去影响别人，那就是很不道德的。

比如，人们对客观世界的认识，总要经历一个从不知到知、从少知到多知的过程。如果由于不知或少知在工作中造成

了损失，一个正直的、有道德的共产党员，就应该使用自我批评的方法，诚实地检查原因，深刻地总结教训，改正错误，提高认识。相反，如果由于私欲而歪曲对于事物的观察和对于真理的理解，不进行自我批评，坚持实践已经证明是错误的认识，对于因此给党的事业带来的损失毫不难过，毫不痛心，这显然是违反共产主义道德的。

又如，外界的影响有好有坏，好的不学习，坏的很欣赏。用这种态度来发表意见、进行活动，使别人也跟着自己学坏样子，造成不良的后果，人家提出了批评，还不进行自我批评，当然也是不符合共产主义道德要求的。相反，诚恳地、认真地进行自我批评，主动地承担责任，绝不是什么不光彩的事，而恰恰是共产主义高尚道德的要求。

再如，个人和集体的关系。任何一个共产党员都生活在集体之中，他的一言一行都要和集体发生直接或间接的关系。当个人和集体发生矛盾的时候，首先应该进行自我批评，检查是不是由于自己方面的什么原因而危害了集体的利益，而不应该一味埋怨组织、埋怨群众、埋怨别人。每个共产党员，都必须老老实实接受同志的批评、群众的监督，把集体利益放在第一位，使个人利益服从集体利益。而且要做到，即使没有组织、同志和群众的监督，也能够自觉地维护党的利益。就像刘少奇同志所说的，即使在他个人独立工作、无人监督、有做各种坏事的可能的時候，他也能够“慎独”，不做任何坏事，不降志辱身。他的工作经得起检查，绝不害怕别人去检查。要做到这一点。必须时时、处处、事事都有高度的自我约束力和自我

克制力。“吾日三省吾身”，在这里是完全用得着的。一个没有共产主义的高尚人格和道德品质的人，要做到这一点，根本不可能。

邓小平同志在刘少奇同志追悼会上的悼词，对少奇同志的一生做了全面的、公正的评价：“刘少奇同志言行一致。他在《论共产党员的修养》中对广大党员提出的党性锻炼的要求，自己都以身作则地实践了。”

“文化大革命”期间，刘少奇同志在处境最艰险的时候，对党对人民始终保持高度的信任，说出了“好在历史是由人民写的”这样的至理名言，表明了他的共产主义的坚定信念。

一个共产党员，能够得到党的信任、得到同志和人民的信任，是最大的幸福。由于林彪、江青一伙的政治迫害和欺骗宣传，党组织、党内同志和人民对他曾经有过暂时的误会，为此他曾经忍受最大的痛苦。但是，他直到逝世为止，对党、对同志、对人民从未有过任何的怨言。

他被非法剥夺了一个共产党员、一个公民应该享有的起码权利，遭受到各种污辱、打击以至人身迫害。在这样极端困难的情况下，他还是坚决维护宪法的尊严，严格遵守党的纪律，日夜关心着党和国家的命运，关心着人民的命运。他向中央提出两项要求：（一）广大干部是好的，特别是许多老干部是党的宝贵财富，主要责任由他来承担，尽快把广大干部解放出来，使党少受损失；（二）辞去党内外一切职务，和妻子、儿女回延安或老家去种地，尽早结束“文化大革命”，使国家少受损失。



1980年5月17日，邓小平代表中共中央在刘少奇追悼大会上致悼词

他在《论共产党员的修养》中，要求共产党员能够经得起各种打击，在受到大多数人的反对和指责而暂时孤立，甚至因此而牺牲生命的时候，也能够逆潮流而拥护真理，绝不随波逐流。他默默地死去，把对共产党员的期望，变成了自己忠贞实践的诺言。

同任何一个无产阶级革命家都难免有这样那样的缺点和错误一样，刘少奇同志在工作中也有某些缺点和错误。对于这些缺点和错误，他总是从人民的利益出发，勇于承担责任，勇于纠正。我就直接听到他在党的会议上做过三次自我批评。他严于律己，像古人所说，君子之过，有如“日月之蚀”，能够把自己的错误公之于众。他的品格，受到了全党同志的敬仰。

刘少奇同志是一个纯洁正直、光明磊落、道德高尚的共产党员，是在党内和国内享有崇高威望的卓越的领导人。他虽然离开了我们，但是他不朽的事迹和光辉的形象，将永远铭刻在全党同志和全国各族人民的心中。文如其人，《论共产党员的修养》一书，是一切优秀共产党员在艰苦卓绝的斗争中形成的高尚品格的结晶，也是刘少奇同志自己理想信念、道德风貌的写照。学习刘少奇同志的榜样，学习《论共产党员的修养》，从中汲取培养共产主义世界观、共产主义道德观的营养，这就是我们应该得出的结论。

(1980年6月23日)

邓力群著：
我为少奇同志说些话

逝者和生者的 欣慰

——记《刘少奇选集》
(上卷)的编辑出版^①

^① 本文曾在1982年1月15日《人民日报》上发表。

面前是刚刚出版的《刘少奇选集》(上卷),一页一页地读下去,少奇同志那严肃恳切的神情,略带湖南口音的、缓慢而清晰的话语,与编辑这本书有关的往事,一一涌在了耳边和眼前。

那是1960年《毛泽东选集》第四卷编定以后,毛泽东同志建议编辑出版少奇同志的选集。毛泽东同志曾经多次提出这个问题,少奇同志总是表示,党的领导人中间,除《毛泽东选集》之外,不要再编个人的选集了,可以考虑编辑出版中共中央文集,其中收中央可以公开发表的文件,也收毛泽东同志之外其他领导人的一些讲话、文章,比如恩来等同志的一些讲话、文章。此事延宕多年,终未实现。毛泽东同志再次建议编辑出版少奇同志选集之后,这年冬天,中央书记处采纳这一建议并为此专门作了决定。少奇同志尊重党中央的决定,表示同意了。

第一件工作,是从少奇同志文稿档案大约300万字中,选出一个可用文稿的目录。卷帙浩繁,年代久远,稽考当时背景

已属不易，适应当前情况更费斟酌，但终于有了一个选目，而少奇同志却离京南下，第二次往湖南调查去了。编辑小组几个人专门到长沙向他汇报。他耐心听取编辑小组的意见，提出还可以删去一些什么篇目、增加一些什么篇目，反复表示：现在党、国家和人民正处在困难时期，工作这么紧张，自己的思想和精力不能不集中于研究当前情况和解决当前问题，实在没有心情回过头去看多少年前的文章，不过既然中央已经作了决定，工作照常进行就是了。

1961年五六月间，少奇同志从长沙回到北京，编辑小组同志第二次向他汇报。汇报中说道，现在看来，有些文章中的个别提法需要作必要的修改。比如1943年发表在延安《解放日报》上的《清算党内的孟什维主义思想》一文，提出区别真假马克思主义者，是很重要的，但是又把陈独秀、彭述之和中国的托洛茨基主义，把李立三路线，把内战时期的几次“左”倾错误，统统概括为中国的孟什维主义。孟什维主义用于陈独秀是可以的，用于内战时期的三次“左”倾错误，特别是用于王明，就同1945年六届七中全会通过的《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中王明犯教条主义错误的提法不一致了。少奇同志说，看来的确需要修改，索性题目也改成《区别真假马克思主义》，至于文章的内容，除了上边说到的，恐怕还有些地方需要做相应的修改。编辑小组同志又提出，《论共产党员的修养》中理论修养的部分讲得不够充实，是不是需要做点补充。少奇同志也同意了。他还指出，对做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的好学生这个提法，也要进行恰当的修改。

在谈话中，少奇同志讲到一个很重要的思想：过去公开发表的一些东西，经过这么多年了，现在党内外、国内外人们还记得起、愿意看、能看得下去，觉得对自己还有帮助的，主要是《论共产党员的修养》。为什么呢？想来想去，可能是因为党的建设的问题上，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他们着重是讲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很少从党员应该怎样加强自身的思想意识修养、理论修养和党性锻炼，确立共产主义的理想信念，培养共产主义道德品质，以有效地贯彻执行路线、方针、政策的角度提出问题和分析问题。我们党在毛泽东同志领导下，一贯重视制定各个时期的正确的路线、方针、政策，同时又重视党性修养方面的问题，而且在长期革命斗争中积累了丰富的经验。《论共产党员的修养》就是在根据多年对党内生活的观察、对党员种种表现的观察的基础上做出的总结。

编辑小组遵照少奇同志意见继续工作的期间，他又到东北林区调查了一次。从林区回来，由于旅途劳顿，中央批准他到广东短期休息。编辑小组希望利用他休息的时间，在他的亲自指导下对文稿进行一次系统修改，也得到了他的同意。此时，正值中央要召开扩大的工作会议（即七千人大会），编辑小组来到广东，他却已经匆匆返回北京，把全部精力投入到会议的准备工作中去。这样，编辑小组就在广州花两个月左右的时间，初步完成《刘少奇选集》（上卷）的校正、修改、补充工作。

党内外同志得知中央决定编辑出版少奇同志选集的消息，都很高兴。七千人大会期间，很多同志指出，“大跃进”中有

的党员犯错误，在党和群众关系的问题上出乱子，基本原因之一，就是缺乏党性，放松了思想意识的修养和理论修养。考虑到这种情况，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加强党员的党性锻炼，培养共产主义的道德品质，仍然极其重要。因此建议，如果选集不能很快出版，请少奇同志先把有关党员修养、党性锻炼方面的讲话、文章一篇篇审定，公开发表、出版，配合大会精神的传达和贯彻。少奇同志听到与会同志的强烈反映，同意陆续出版《论共产党员的修养》《论党内斗争》和《论党》。他说，《论共产党员的修养》1939年初次发表的时候，限于当时的条件，没有引证毛泽东同志关于党员修养、党性锻炼方面的意见。而我们党在这方面的经验，首先是由毛泽东同志很好地总结了的。这次，他要编辑小组一定充分引证毛泽东同志的意见。

《论共产党员的修养》的稿子，少奇同志看了多次，对编辑小组做了补充的理论修养部分不大满意，觉得只引用了列宁的话和外国党的经验，没有阐述我们党怎样根据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理，结合中国革命的实际，在毛泽东同志领导下，创造的许多新鲜经验。他自己动笔写了书面要点，把编辑小组的同志找去，由他口授，笔录了一大段话。这段话经过整理，又由他反复修改，写入现在稿子的第四节，就是新版单行本第24页第16行到第28页第4行的四个自然段。少奇同志结合我党斗争的历史和党内一些同志的具体情况，深刻地、循循善诱地阐述了掌握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的极端重要性。他说：“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是我们观察一切现象、处理一切问题的武器，特别是观察一切社会现象、处理一切社会问题

的武器。如果我们不能掌握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武器，我们就不能正确地认识和处理在革命斗争中所遇到的各种问题，就有迷失方向、背离无产阶级革命立场的危险，甚至可能自觉地或者不自觉地成为各种机会主义者，成为资产阶级的俘虏和应声虫。”^①“革命坚决、斗争勇敢，是每一个共产党员必须具备的宝贵品质。共产党员有了这样的品质，还必须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在不同的斗争条件下，正确地解决如何革命、如何斗争的问题，才能争取革命的胜利，实现共产主义的最高理想。”“如果不掌握马克思列宁主义这个武器，如果没有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的高度修养，要在革命斗争的一切重要问题上，站稳无产阶级的正确立场；要在情况复杂和变化剧烈的环境下，在需要走迂回曲折道路的时候，都能够确定对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最有利的方针政策，都能够代表无产阶级革命斗争的整体利益和长远利益，是根本无法做到的。”^②他分析了当时党内对待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左”的或右的两种错误态度，认为都是在政治形势发生重大变化的时候，不能坚定地站在无产阶级立场上辨别革命事业发展的正确道路的显著例证。

少奇同志对全文进行过三次修改，然后交代编辑小组把稿子报送中央书记处审查批准。书记处同志同意后，1962年8月1日，《论共产党员的修养》在《人民日报》《红旗》杂志同时发表。

这年秋天，中央召开了北戴河会议，接着是八届十中全

① 《刘少奇选集》上卷，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116页。

② 《刘少奇选集》上卷，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116—117页。

会。在八届十中全会上，毛泽东同志重新强调阶级斗争，党中央当时接受了毛泽东同志的论断，作为当时党和国家的主要领导人之一，少奇同志也是有责任的。但是有一个历史事实却应该为后人所知道，就是党内一些同志，包括在会上做了自我批评的少奇同志，不隐讳地表示了一种忧虑：现在提出阶级斗争，经济调整怎么办？阶级斗争和经济调整怎样相结合？会不会出现这个情况，大家都去搞阶级斗争，经济调整的工作没人做了？毛泽东同志在十中全会结束时的讲话，考虑和接受了这些意见，表示全会重提阶级斗争，讨论阶级斗争，批评阶级斗争问题上的修正主义观点、右的倾向，可是这个问题在全会上讨论就行了，不要向下传达。要接受1959年的教训。1959年在中央全会上批评彭德怀同志，如果不往下传达，层层反对右倾机会主义，就不会中断纠“左”的过程。所以，这次全会讨论了就行了，回去不要层层向下传达，以免干扰经济调整工作，经济调整工作照原来计划进行。

七千人大会以后，少奇同志和恩来同志、陈云同志、小平同志一直在主持贯彻以调整为中心的八字方针。这一方针的贯彻，使我国国民经济逐步开始好转。到1965年，调整任务基本完成，国民经济出现了欣欣向荣的景象。在此期间，少奇同志曾提出不少切中时弊、具有远见、经受住了实践检验的重要意见。与此同时，少奇同志还参加了农村“四清”的指导。1964年下半年，对农村阶级斗争形势的估计，他比毛泽东同志的估计还要严重。毛泽东同志批评过他，他接受了批评。但是在运动重点是整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这个问题上，他

没有随声附和，表示了明显的保留态度。这在当时是难能可贵的。

《论共产党员的修养》重新发表后，编辑小组同志把其他稿子陆续整理出来请他审阅，他总是说，放下吧，有空一定看。一篇、两篇、三篇，都是如此。接着就是“文化大革命”，选集编辑出版工作非但不可能继续进行下去，反而成为林彪、江青强加的一条罪状了。如果不是粉碎江青反革命集团，没有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没有十一届五中全会为少奇同志平反和重新编辑出版《刘少奇选集》的决定，历史的真相岂不是要继续受到蒙蔽么？

现在编辑出版《刘少奇选集》，情况和过去已经大不相同。对于历史问题的认识比当时更加科学和完善，然而作者却不幸去世。再也不可能亲自对文稿进行修改和审定了。少奇同志历来处事严谨，一丝不苟，倘若在世，一定会充分考虑历史的进程，对已经为实践证明是错误的、不完善的地方进行修改、补充，选集的理论水平、思想水平以及结构、文字，将无疑比现在的本子更好些。这次重编，为节约篇幅，去掉了内容大部分重复的几篇，考虑到《论党》已经出版单行本，只节选了其中三个部分；增选了一些电报，特别是抗日战争胜利后的重要电报；凡少奇同志生前发表过或已有手稿的，均保持原貌，只做少量文句和史实的校正。这样，像《清算党内的孟什维主义思想》一文，只在题解中说明孟什维主义系泛指“左”右倾机会主义，题目和行文就不再改动了。

在党中央的领导下，由于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同志的勤奋

扎实的工作，这本书还是集中了少奇同志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前最好的讲话、文章，确切地反映了他对党、对毛泽东思想的主要贡献。尤其是在党的建设、白区工作、工人运动等问题上，他的理论和实践都有很多创见。《刘少奇选集》（上卷）记录了建国前党和人民英勇斗争的历史，总结了党的丰富斗争经验。今天看来尽管个别地方有些不足，但是，总的说来，无损于作者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终生的光辉业绩。它对我们党和国家的工作，仍然具有现实的指导意义。每一个共产党员、每一个革命者、每一个正直的人，都可以从中获得精神的营养。

从1960年开始着手编辑，到1982年正式出版《刘少奇选集》（上卷），经过了22年。其间变故选起，曲曲折折。文稿和它的作者以及参加编辑小组的人，都经历了一次一次的考验。编辑小组的成员中，负责白区工作、国际问题文稿的姚溱同志，负责全书注释工作的王宗一同志，已经在“文化大革命”中被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迫害而死，使我们在事成之日的今天，每一念及，悲痛不能自禁。至于当时在理论上、政治上骗取了少奇同志信任并被委以主持选集编辑工作重任的人，则已经露出了原形，走到党和人民的对立面去了。人们对于少奇同志，对于收进本书的文稿，经历了一个认识、再认识的过程。少奇同志及其在思想上、政治上、理论上的贡献，也经历了一个得到爱戴、尊敬和承认，受污辱和受批判，终于又得到爱戴、尊敬和承认的过程。历史无情，好事多磨，22年的风风雨雨，党和人民取得了粉碎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的胜利，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各方面工作的深刻变化和伟大成果，不也

凝结着少奇同志的心愿，融入了少奇同志的心血吗？这本书终于能够完成编辑工作并正式出版，是对于逝者的安慰；它的留存，又表明少奇同志仍然活在我们心中，这就尤其使生者感到欣慰了。

少奇同志说得好：“我们的党员，不但要在艰苦的、困难的以至失败的革命实践中来锻炼自己，加紧自己的修养，而且要在顺利的、成功的、胜利的革命实践中来锻炼自己，加紧自己的修养。”^①“一个共产党员，在任何时候、任何问题上，都应该首先想到党的整体利益，都要把党的利益摆在前面，把个人问题、个人利益摆在服从的地位。”^②“他也可能有最大的革命勇敢。因为他没有任何私心，所以他无所畏惧。他没有做过‘亏心事’，他的错误缺点能够自己公开，勇敢改正，有如‘日月之食’。他理直气壮，永远不怕真理，勇敢地拥护真理，把真理告诉别人，为真理而战斗。即使他这样做暂时于他不利，为了拥护真理而要受到各种打击，受到大多数人的反对和指责而使他暂时孤立（光荣的孤立），甚至因此而要牺牲自己的生命，他也能够逆潮流而拥护真理，绝不随波逐流。”^③他这样要求和教育党内的同志，自己也身体力行，成为我们学习的表率。即使是功勋卓著，居于领导地位，已经年过花甲，想的仍然是党的当前工作、人民面临的迫切问题，而不是整理个人的文集。他不耻于做恳切的自我批评，随时改正自己的缺点错误，在蒙

①《刘少奇选集》上卷，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101—102页。

②《刘少奇选集》上卷，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130页。

③《刘少奇选集》上卷，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132页。

受历史上罕见的、长期的委屈和遭受到极不公平的待遇的时候，也决不沉迷于个人的恩怨，决不放弃为共产主义奋斗的初衷。他不是专门著书立说、咬文嚼字的马克思主义者，而是战斗的、实践的马克思主义者。他一生忠于党、忠于人民，忠于自己为实践证明是正确的理论。我们有一些同志可以讲、可以写成套的大话和原则，要人家这样做、那样做，但是却不大想自己是不是也准备做，是不是能做得好，不大想若干年后如果有人拿自己的话和自己的行动比较，将何言以对。鲁迅先生曾经批评有的读书人往往只讲空话以自示其不凡，虽有“高论”，能说不能行，一下子就消灭，而问题却依然如故，“我想，大话不宜讲得太早，否则，倘有记性，将来想到时会脸红。”^①少奇同志和这种人相反。他的一生，他的每一言行，都经得起最严格的检查。他无需愧对党和人民，无需愧对自己说的每一句话、写下的每一行字。

高风亮节，长存人间。经过半个多世纪艰难复杂斗争的严峻考验，少奇同志在政治上、理论上的贡献，已经为人们所公认；作为我们党和人民解放事业的卓越领导人之一，他已经在历史上的的确确地站住了。他和他的著作，将永远激励我们奋进。我们要学习少奇同志的文章，尤其要学习他的为人，学习他的共产主义思想、品质，以此表示对他的最珍贵的纪念。

（1982年1月15日）

^①《鲁迅全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56页。